

炎黄春秋

重温邓小平“八·一八”讲话

田纪云：近距离感受胡耀邦

培育出新中国两位总理的名校

温家宝在安徽的一次下乡

历史上真实的和坤

第10期

2004年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

● 国纪云

胡耀邦同志辞世已整整十五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丰功伟绩、他的人民公仆的品质至今仍然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1980年下半年,我有机会到中央党校学习。学校9月1日正式开学,副校长冯文彬讲话时传达了兼校长胡耀邦对来党校学习的同志的几点希望:“好好地读点书,好好地开动机器,想点问题,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总结点经验;好好地准备重新走向工作岗位,为党的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听,四个“好好地”多么实际呀!

11月23日,我以中央党校中青年培训班支部负责人的身份列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取胡耀邦在会议上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直接聆听胡耀邦同志的讲话。他讲话的题目是《要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个讲话精彩而深刻,充分展示了他是一个无畏无私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开头就说(以下引文系作者当时的记录):“多少年来,许多同志劝我少讲话。这些同志都是好心,我很感谢他们。但多讲、大讲也有好处,因为我们党正处在一个转折关头,拨乱反正,必须讲。现在的形势好讲话,把话讲透,对党对国家有好处。大家都敢讲话,我们党的事情就好办一些。站在人民的利益上讲话,会使我们党提前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讲话无非是三种话,拍板的话,打通思想的话,再就是乱放炮的话。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王震同志就放过炮,要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呀,等等,这种炮就放得好。”他说:“今天我只讲一个问题,即怎样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

者,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毛主席经常讲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还在讲这个问题。当然他老人家也违反了唯物主义的原则。”

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一是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上级的指示,他说:“什么是上级?我们往往把个人的东西都当作上级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意见是非常精辟的,但是一般情况下,集体的智慧,经过集体讨论的东西总是超过个人的东西。因此,任何时候把上级某一个人的意见当作上级指示,都是不对的。”上级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的决定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犯错误。说‘我们党犯了错误’,这个说法不对,是某些领导人犯了错误。搞个人迷信,危害之深,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今后再也不能搞了。资产阶级搞个人权威,不搞个人迷信。什么洞察一切呀,了如指掌呀,传达上级指示一个字都不能少,错了一个字都是罪状。这样创造性积极性也就没有了。这是封建思想的残余。”

第二、如何用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他说:“这个也不容易。毛主席说‘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党,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他自己就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推进的作用还是阻挡的作用?主导历史的是人民群众,还是个人?个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推动历史前进。毛主席粉碎刘、邓司令部为什么这么多年粉碎不了呢,为什么后来把‘四人帮’一下子就粉碎了呢?因为他们早就成了孤家寡人了,腐朽透顶了,因之粉碎他们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哪一个人。当然,中央一些同志顺

应了历史潮流,减少了损失,是有功的,但与人民的力量不能颠倒。……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今后不要说某某人到我们这里来,对我们是极大鼓舞、极大鞭策这类话,这些话听起来酸溜溜的,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相信。”

第三、如何用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对待国家大事。他强调要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要宣传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宣传它的先进企业管理经验,但不能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四、如何用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对待群众?他说:“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模糊这个认识。”我们一定不要同群众隔离,要更有成效地向群众做工作。”

第五、要用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对待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这一点不能动摇。”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社会主义可能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党蜕化变质,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真地改善党的领导。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坚决废除终身制,这是防止蜕变的重要措施。”



1986年5月作者(左二)与胡耀邦同志(左一)在甘肃定西考察工作

胡耀邦的讲话,多么精彩,多么深刻啊!至今也不过时。

1981年1月24日,在党校为一部分学员举行的毕业典礼上,胡耀邦又亲自到会讲话。讲话通篇闪烁着无畏无私、光明磊落的思想光辉。

他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形势?关于国际形势,他说,人们最担心的是里根上台后中美会怎样?我认为,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要搞霸权嘛!但它又需要我们,在反霸问题上可以搞点统一战线。苏联打进来也不可能。160多年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把我们灭亡,包括日本鬼子,它想把我们的东北三省拿去变成它的殖民地,它也没有把握把全中国并吞掉。因为中国太大了,几年、几十年把中国吞并,不可能。苏联连个阿富汗都对付不了,还能对付中国!当然也不能放松警惕。

关于国内形势,他说,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政治形势一年比一年稳定。有的同志说:“你们中央安定不安定呢?”我说,中央现在比过去安定。现在搞民主,搞群言堂,不是一言堂,不打棍子了。相互之间有意见,这是难免的,过去有,今后还会有。两种办法,一是民主集中制,群言堂;一是一言堂,法西斯,乱上纲。两种办法,哪种办法能安定?第二种办法不行,连毛主席那么大本事都安定不了嘛!现在不可能有哪个人能强加于人。大家都承认小平同志经验比我们多一些,比我们高明一些,但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他能强加于我们吗?有人给我们划派,说胡耀邦是邓小平的门徒。完全是胡说八道。我1930年参加革命,1944年才认识小平同志。现在中央所以稳定,就是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的事业是靠集体,而不是靠哪一个人。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重大历史问题。他说,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成堆成山,难以一下子解决,不能丢下当前工作。但,第一要解决,第二要采取慎重的方针。他举例说到如何对待毛主席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对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同志怎么办,我们党的生活究竟怎么搞等。在讲到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他主张宜粗不宜细,从

宽处理。关于党内生活,他说,几十年来党内生活不正常,动不动就是党内斗争,路线斗争,你死我活。他主张:1、以后少用“党内斗争”这个词,用批评、自我批评;2、工作搞的不好,可以辞职,用辞职的办法;3、犯了严重错误可以调开,不要逼着人家写检讨,检讨了,三年以后还得闹翻案;4、不要轻易讲“路线斗争”,没有准确的含义;5、一概不要上挂下联,包括秘书、司机、老婆、孩子;6、经过考验,确实改了的,可以重新上台。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抓好当前经济工作。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自己。他说,党校的同志都是我们党的骨干,他鼓励大家不要满足于当“万金油”干部,要钻研业务,要学经济,要自己写东西,不要完全靠秘书,要克服和防止不正之风,要“振作精神抓工作,咬紧牙关当模范”。

胡耀邦同志的精彩讲话,学员们听得入神,报以热烈掌声。

第一次与胡耀邦握手

我与胡耀邦同志相识是1981年春。当时我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协助总理、副总理处理一些经济方面的事务,中央指定我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1981年3月,我第一次列席书记处会议时,国务院领导把我向胡耀邦同志介绍说,这就是从四川调来的田纪云同志。我走到胡耀邦的座位前与他握了手。这是我与胡耀邦的第一次握手。在其后的会议中,胡耀邦经常要我宣读文件,有时也问我一些经济方面的数字或情况,我总是尽力作准确回答。在我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之后,与胡耀邦同志的接触就更多了,经常参加由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另外,我还是由胡耀邦同志主持的人事安排小组成员之一,也经常参与人事安排问题的研究。在多年的接触中,我对胡耀邦不仅有着较深刻的了解,而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给我留下的四点深刻印象

胡耀邦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

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和公仆。对于胡耀邦的功过评价,在胡耀邦去世后中央所作的悼词中作了最全面、最准确的概括。我认为这些评价是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在这里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在我与胡耀邦同志的接触中,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一是胡耀邦同志的民主作风,二是胡耀邦同志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三是胡耀邦同志对年轻干部的热情关怀培养,四是胡耀邦同志对邓小平思想路线的忠诚。

对于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这是胡耀邦同志身体力行的名言。凡是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耀邦同志全不在乎。记得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向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因与胡耀邦理解不一致争论起来,但事后耀邦同志对我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胡耀邦同志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时刻刻铭记着人民群众的疾苦,在他任总书记期间,一有空就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那些有名的穷山恶水、荒漠边陲、严寒高原、世界屋脊他大都到了。1986年5月,我陪他去甘肃考察工作,他告诉我:全国2000多个县他已去过1500多个,甘肃省地市一级还有两个未到,即甘肃平凉地区和甘南自治州,这一次就是来补这一课的。胡耀邦同志本来心脏就有点毛病,有高原反应。甘肃平凉海拔比较高,到后刚住下我就发现他嘴唇发紫,上楼有些吃力,我劝他少活动,晚上就不要开会了,但他说没关系,适应一下就好了,晚上照常开座谈会,听汇报,还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作为总书记他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是可以想象的,但他还抽空挤时间阅批大量人民来信。在他任职总书记期间批处的人民来信不下数千封,是任何其他领导人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凡经他批处的人民来信,他都指定专人,跟踪了解处理结果,充分表现了他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顺便说一下,耀邦同志生活非常简朴,衣著很随便,粗茶淡饭,不挑食,不嗜酒,吃饭很快,比如四个菜刚上了两个,他就吃完饭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特点,也抓紧时间吃饱,生怕跟不上总书记的节奏。

胡耀邦同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1984年7月30日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说:“前天(即7月28日)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三中全会的问题,我讲三中全会的一个议题是明年(即1985年)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问题。党代会的议题是:1、‘六五’计划与‘七五’计划问题;2、人事安排问题。中委要退一些人,进一些人。现在的中委60岁以下的不到100人。补充中委的条件是:一是对经济工作真正懂行的人,二是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三是优秀的5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于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在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一批老干部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增补一批年轻干部进入中委。在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胡启立、乔石、李鹏和我同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同年12月25日,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了调整后的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说:“在培养干部方面,我们六年走了三步:选拔、锻炼、进领导核心,下一步如何培养?一要老同志支持,二要个人努力。要给他们压担子,老同志要少管一点事。”他告诫新进领导核心的同志:第一,要努力学会驾驭全局的能力,要多拿点时间想点全局的问题,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要熟悉全局情况,学会支配时间。第二,要发扬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风格:一是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二是身体力行,模范带头。一位领导插话说:“小平同志说过,在位谋行,担子压上了,就干得了。”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今后书记处会议由胡启立主持,由我协助万里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0年代中国领导层的年轻化,一大批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正是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

使我感受特别深的是胡耀邦同志对邓小平及其思想路线的忠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86

年7月在北戴河办公期间,胡耀邦同志主持拟定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文件,几经修改之后,他首先让送呈小平同志审阅,听取小平同志的意见。在小平同志审阅期间,他非常焦急地期待小平同志的指示,几乎每天都打听小平同志看过了没有,有什么表示没有。在小平同志一看完文件通过王瑞林将意见转达胡之后,他立即召集起草小组开会,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对文件一一进行修改。由此,我看出耀邦同志对小平同志的确是忠心耿耿,言听计从。9月22日,我和胡启立、朱厚泽(当时朱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乘坐耀邦同志的专列从北戴河回北京,途中耀邦同志约我、胡启立、朱厚泽聊天,在谈到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时,他说: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即在全国夺取政权之前,确实很伟大,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而且写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像《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都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但是,毛主席在建国之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逐渐与实践、与群众脱离,毛主席很难再写出很系统的、很有深度的文章了,常常是三言两语,大家又都把它作为最高指示,因此工作上导致许多错误决策。相反,小平同志就有所不同,他虽然年过八十,但思想不僵化,适应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指导方针,诸如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改革开放,干部年轻化等等,都是小平同志在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决策。他又说,小平同志不愧为毛泽东事业的伟大继承者,他的思想是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

围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人和思想比较保守的同志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为了说明问题,我将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他于1986年9月15日向邓小平汇报时的谈话摘录于下:

耀邦:某某的修改稿发给了很多人,可能有20到30人。你删掉的他又加上了。某些人放风说,某某的修改稿是你同意的了。有的人可能想挑起争论,旁及其他。

小平:不会,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可采取表决方法解决问题,少数服从多数。某某的修改稿打的是我的牌子,实际是想把我拉向“左”,这个不能听。当然,有些话可以吸收一点,

但总的不能听。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是还要放,而不是收。明年(指1987年党的十三大)人事结构要作大的调整。现在集中力量把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好,其他问题,会后再讲。文件先在会下沟通一下,有了结果再告我。你还可直接找某某谈谈“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想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怪论很多,不要理他,翻不了天。

胡耀邦在传达完邓小平的讲话后说,不能左右怕,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也干不成。

胡耀邦的历史功绩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他任内,在邓小平等老同志的支持下,他以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惊人魄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先后组织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等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大解放。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使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中,包括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等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冤假错案,以及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萧劲光、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老一代革命家平反,并为受到错误批评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老革命恢复名誉。接着,又对解放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其中包括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



作者与胡耀邦同志在耀邦办公室

“右派分子”摘帽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等。一些蒙冤多年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昭雪。随着这些冤案的平反昭雪,数以千万计的因亲属、工作关系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得到解脱。

这样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为古今中外所没有,如果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办不到的!

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不仅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也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胡耀邦是一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人,他不仅主张经济上要搞改革开放,而且主张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主张在文艺战线真正贯彻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给知识分子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敢于讲话,大胆创作。正是在他的提议下,文学家王蒙当上了文化部长。也正是在他主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民主空气比较浓,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创作热情大为提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所改进。

所以,用“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八个字来描述胡耀邦的个人品德、用“丰功伟绩、千古流芳”八个字来描述他的光辉业绩是当之无愧的。

胡耀邦的名字将与世长存!

(责任编辑 杜晋)

重温邓小平“八·一八”讲话

● 张绪文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同年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个讲话,这就是著名的“8·18”讲话。这是一篇具有历史厚重感的文献。认真地阅读它,可以使我们从比较深的层面上,回顾历史,思考现实,展望未来。

值得记取的历史经验

“8·18”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作出的,是在全党广泛而深入地讨论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作出的。

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期盼已久的。那么,如何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回答是:必须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讲话》列举了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诸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指出:“这些弊端的存在,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讲话》还提出:“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

现这三条来检验。”

“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是全国人民记忆犹新的。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回答是:必须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严肃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中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就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说,上述这段话可以称得上一语中的,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二十四年前我们刚刚从那场灾难中走出来的时候读它,有这样的感受;二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现实生活中诸多急待解决的难题读它,同样有这样的感受。对于上述付出了沉重代价总结出来的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有责任感的共产党人应当牢

牢记取,铭刻在心。

从一道难题看制度建设的重要

现实生活中需要破解的难题很多。这里只说作者熟悉的一道难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最简明扼要的概括。这条思想路线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是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它的重要性已被实践所证明,已为全党所公认。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是从倡导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的,邓小平最后一次出来工作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从这里破题的。破掉“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的提出和贯彻执行,才有中国近二十多年的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这也是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公认的。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少同志不只一次地反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的确是一道需要继续破解的难度很大的课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难以贯彻执行,有诸多的原因。首先,实事求是的本意是探索事物的内部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可是,主体反映客体,特别是反映规律,是十分艰难的。规律是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不是凭直观就能把握的。因此,要研究并谙熟“求是”的规律,也就是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第二,主体自身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头,难以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是公之于世的,但绝不是随便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出于什么动机,都可以实行得了的。这里,既有一个善不善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也有一个敢不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无私方能无畏,无所畏惧的人,才能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提高主体素质,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至关重要。除了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体制的弊端恐怕是更为根本的。体制不好,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人,一定时期是

要吃苦头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不是因为敢讲真话而吃了苦头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本人也曾经因为坚持实事求是而一度被撤掉几个重要的职务。我们党是奋斗了几十年的成熟的党,毛泽东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伟大的领袖,然而,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尽管党内有那么多同志思想不通,但在当时全党都不能纠正他的错误,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我们党一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做起来直至今日又普遍感到如此之艰难,这就不能单纯归咎于某个人的品德和过失,而要从更深的层面即从体制上找原因。就拿用人体制来说,如果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中存在着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的痕迹,那么,许多不正之风都是难以纠正的。诸如: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围着领导转,不去深入群众;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甚至买官卖官,等等。由此可见,没有好的制度保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难以落到实处,实事求是的思想教育也显得苍白无力。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求真务实尚未形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风尚,党中央及广大党员和干部为此忧心忡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

同志们:

这次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有关问题。

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次变动,包括华国锋^[23]同志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142]同志接替;李先念^[84]、陈云^[83]、徐向前^[108]、王震^[143]同志和我^[84]不兼任副总理,由精力较强的同志担任;王任重^[144]同志因任党内重要职务,也不再兼任副总理。陈永贵^[145]同志请求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中央决定同意。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人选,经过与有关各方协商,也准备建议做一些变动。以上这些变动,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反复研究过的。这次作为中央的正式建议,提交人大会议和政协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政治局讨论通过。

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我们现行的制度仍然存在许多弊端。邓小平二十四年前所作的“8·18”讲话,仍然是我们今天破解“实事求是难”的一把金钥匙。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中国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振兴伟业,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有赖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说过:“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国的改革,就城市和农村而言,农村先行一步;就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而言,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一步。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无可非议的,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基础性的东西。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配置资源的主体,企业和个人只是附属物。在这种体制的基础上,必然形成政治上的权力的高度集中。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我国改革开放首先推出的重头戏,表现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深谋大略和远见卓识。他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理论突破和创新,定会载入史册。经济体制改革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所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法,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优化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必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国际市场相互衔接的市场体系;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是去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展程度的总体判断。这个总体判断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框架搭起来了,子系统



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投票

建立起来了,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按照新体制的轨道和规则运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其二是说,新建立的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企业、市场体系、宏观调控、社会保障等子系统比较稚嫩,整个市场体系的运转尚存在许多问题,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最深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十分艰巨,作为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民主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等,比较滞后。总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都要用系统观点、立足系统整体去观察。由于是经济体制系统整体的变化,虽说是“初步建立”,但谁想回到旧体制,已经根本不可能了。由于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尽管党、政府和人民付出了许多,但仅只十年,也只能是“初步建立”。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确无须担心走回头路了,但倘若不继续前进,不切实地在完善市场经济系统上用力,那么我们就不能建立起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市场经济从“初步建立”到“完善”,是一个大台阶,有的

学者用“改革的中后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说明这一段历程的艰难。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迫切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配套。政治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更为重要的内容，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需要不失时机地推出的又一出重头戏。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调配套地稳步推进，应当是改革发展现阶段所呈现出的特色。作为政治家、战略家、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改革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他就指出：“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6年，他在几次谈话中说到：“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多么中肯而切中要害！须知，这是十八年前讲的话。致力于中国改革并且经历过中国改革历程的人们，今天重温这些话，自然是倍感亲切的。试想，如果不稳步而切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真正解决人民执掌权力的问题，不建立权力的授予、监督、制衡的体制和机制，我们能够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运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吗？我们能够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吗？我们能够遏制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吗？我们能够避免走入“权力资本”的陷阱吗？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

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这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根本转变，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根本转变。邓小平把解决人治还是法治问题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重要内容之一。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权力的运作是否严格依法。在人治国家中，民众必须守法，但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国家中，民众应当守法，而政府必须率先守法。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写进《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中。

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十分艰难的。搞了若干年的计划经济，所谓轻车熟路，一想点子，一出主意，一作决策，自觉不自觉地就是过去那一套，须知习惯势力是非常之可怕的。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封建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国家，没有民主法治的传统，倒有家长制、专制独裁的“基因”，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谈何容易！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不是谁都能够为改革付出代价的，不是谁都能够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当着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改革初期的某些受益者有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但是，改革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会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正是广大人民群众才是我们党领导改革的依靠力量和动力源泉。邓小平多次说过，改革是有风险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出某项重大的改革举措时，对随之而来的风险作出评估，并提出应对的措施。无论什么改革，都要从国情的实际出发；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但是，不把改革适时地向前推进，矛盾积压下来，党和国家将要有更大的风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通过自我完善所进行的变革无疑会减轻社会的阵痛，但它同时要求领导改革的党和从事改革的人们，具有同传统观念、传统体制决裂的勇气和智慧。

（此文原载《学习时报》2004年8月9日第三版，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中西历史比较再谈“秦家店”

● 尹振环

蒙《炎黄春秋》2024年第7期刊出拙文《也谈“秦家店”的由来及其内涵》之后,有友来电话:能不能再用横向比较的办法,谈谈中西政治结构的差异。此话使我一震。细细一想,确实应该进行一些简单的比较。一来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秦家店”,二来,也许还可以由此了解到为什么15、16世纪之前,中国一直独居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第一强国的重要原因。同时也许还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近代积贫致弱、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以及工业化、现代化姗姗来迟的政治痼疾之所在。不过跟西方哪个国家比较呢?当然不能跟美国、拉丁美洲、澳洲诸国比,他们甚至没有经过封建社会,也不能跟印度等南亚国家比,他们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不太长。只能跟欧洲诸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比。自然这种与“秦家店”的比较,只能是大轮廓、笼统、论纲式的比较。

一 政治结构集权与分权上的巨大差异

我国从战国后期到明清,无论是统一的王朝,还是分裂割据的小王朝,都有:

- (1) 庞大而完整的行政系统;
- (2) 庞大的常备兵;
- (3) 统一的法律与较为系统的司法、监察机关;
- (4) 严密的户籍制度与基层组织;
- (5) 严格的赋税、财政、兵役、徭役、戍边制度。

因为这“五有”,政治结构呈集权状,而欧洲

中世纪,多国林立,国中有国。王权微弱,中央权力无足轻重,没有全国的行政系统、税收制度、司法机关和统一的法律,国王手下没有像样的常备兵。因此封建政治结构不发达,呈分权状。这是为什么呢?

1. 领主不同于地主,农奴不同于自耕农和佃农。欧洲全部土地归领主,号称“没有无领主的土地”。欧洲中世纪的农民,基本上是农奴。按照法律,农奴如同领主自留地上的家畜一样,他可以被卖掉,被交换”。领主不仅拥有土地所有权,而且在其领地上握有行政、司法权。那些大封建领主权势尤大,在其领地内设置法庭,征收赋税,建立关卡,铸造货币,活像土皇帝。显然这样形成的政治结构只能是分权的。

中国秦制社会,地主的土地往往不居主要地位。每一个王朝的前期,国家掌握着大量的土地。用授田、占田、均田等形式招募或分给农民耕种,这时自耕农占相当的比例。地主的主要剥削形式是佃农制。佃农可以改佃,地主也可以撤佃。历代通过分封赏赐的军功贵族、事功贵族,只收租税而不治民,地主更是只有土地所有权而没有治民权。土地所有权与政治权力分离。政治权力只能由专职官吏行使,从而需要庞大的行政系统,形成了集权式的结构。

2. 权力来源不同。在欧洲,他们根本不知道郡县制为何物。国王依靠贵族支撑王权,进行统治。贵族的政治权力大都来自世袭,而不是君王任命。君王对其封臣下面的臣属没有直接支配权,所谓“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这就使完整的行政系统无从建立,其政治结构不可能不是分权的。在中国,君主依靠官僚制和郡县

制进行统治，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的政治权力，统统来自君王和上级长官的任命，任免权完全操之于君上；“朝命之，可夕改之”。君上还掌握着他们的生杀予夺大权，因此势必要形成层层对上对君王负责和效忠的集权政治结构。

3.土地与权力占有的稳定性不同。在欧洲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也不能随意遗授，只能由长子继承土地，其他儿子可以得到一次总付的货币遗产。“土地被束捆起来世代相传”（《不列颠百科全书·地产条》）。因而土地占有稳定。由于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联在一起，土地的继承与政治权力的继承相一致，因而土地的稳定就意味着政治权力、封建等级制的稳定。在中国因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变成特殊商品，从而土地占有是不稳定的。同时中国社会一直采取严格的诸子弟平均继承财产的制度，从而加速了土地占有的不稳定性。“百年田地转三家”“千年田、八百主”，就是生动的概括。中国政治权力大多不能世袭，而主要靠科举选官。“主有专己之权，臣无百年之柄”。所以等级及权力占有是不稳定的。因而阶级矛盾及政治斗争要比欧洲复杂尖锐，从而相应的统治机器也必然发达。

4.经历的战争多少大小不同。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自新石器中期以来，充满了极为频繁、巨大、复杂的战争。”如果说这太遥远了，那么，中国进入青铜器时期，尤其是进入铁器时代，随着铁器和牛耕的普及，大量开垦土地的利益刺激，使得春秋战国时期争夺土地与劳动力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战争的频繁，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与年俱进，世界第一，无以匹敌的。因而经过春秋、战国，就大体结束了小国林立的时代。西汉之后，战争固然一度大为减少，但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占有与权力占有的矛盾。土地占有不稳的另一面就是土地兼并；权力占有不稳的另一面就是权力的保持与争夺。土地兼并与权力争夺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内基本矛盾必然激化。或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农民奋而

起义，或异民族乘隙入侵，或者统治者为转移国内视线挑起对外战争，或宫廷政变，或藩镇之乱……种种战争接踵而至。社会陷入大动乱。欧洲由于土地占有比较稳定，同时分权式的政治结构能量有限，因此封建社会战争少得多，战争的规模、战争持续的时间也小得多短得多。我国由秦至清，中小型农民起义以千计，席卷全国的大型农民起义达九次。欧洲农民起义不及中国农民起义十分之一，其著名的几次农民起义也仅相当于我国的小型农民起义。欧洲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不过二、三万军队。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也就难以结束欧洲小国林立，国中又有国的现状。我国历代王朝的覆灭和诞生，大都要经历数百万人的战争。规模巨大的战争本身就需要一个庞大的机构为之服务，需要高度集中权力。同时政治必需干预经济、思想、文化，使之服务于战争，在这种历



但愿这场游戏将很快结束。漫画上的农民背着一位高级教士和一位贵族，它表示赋税的重担完全压在人民肩上。贵族和僧侣不仅不纳税，反而获得恩惠和年金，耗尽国家的财力……于是国家向农民伸手。

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结构只能是集权和无所不能的。

二 意识形态的主宰者各异

在中国,政治结构的主宰者同时是意识形态的主宰者。在欧洲中世纪,意识形态的主宰者是教会。作为精神领袖的教会权力,是与世俗政治权力相分离的。教会按照等级制的原则,建立自己的教阶制度,有一套严密的统治系统。教皇下设大主教、主教等。主教各有辖区,管理本地区内的宗教事务,直至是神学的奴婢,不合神学的思想学说,都将受到惩罚,教会为此成立了宗教法庭。教会不仅对教会土地上的居民拥有行政权、司法权,而且还有权更改国家法庭的判决。同时教会还拥有某种军事力量。因此,教会不仅牢牢把精神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在政治、经济上与世俗政权形成某种分庭抗礼的局面。宗教客观上起到监督、限制、制约王权与世俗政权的功能。

中国则不是这样,一体化、一元化由来已久。起码从西周时起就政教合一,“吏师合一”,“学在官府”,在政权机构中设置了管理意识形态的机构,春秋以降,兴起了私学,渐渐地形成了一个治学为业的知识阶层。由于兼并战争斗智的需要,知识阶层十分活跃,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创造了中国空前绝后文化思想的黄金时代。但秦汉一统后,百家争鸣变成了内法外儒,政治体制是法家的精心设计,外面则用儒术加以装饰,儒家伦理道德成为法定统治思想,法定意识形态。历代帝王及各级政府都把社会教化及控制精神手段、控制思想舆论作为行政的主要内容。同时用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及科举制等,规定知识分子的思路、仕途,并通过他们影响人民的思想。知识分子除了以仕途为归宿、致力于修齐治平之外,别无他途。佛教、道教曾一度在中国取得很大影响力,但他们从来都是服从皇权并依附于世俗政权的,也从来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御用儒学,其中心内容是三纲五常,而尤被视为根本的是忠与孝。竭力倡孝,目的在移孝为忠,化君臣关系为父子关系。这种意识形态极利于家族的联结、小农经济的凝聚及专制政治

的推行。其他思想、其他宗教,以及哲学、法学、教育、史学、文艺,都得维护至上的皇权,必须扶持名教、砥砺气节”。否则丁点讽喻,弄不好也会招来横祸,招致杀身灭族之祸。

三 政治作用于经济结构的能力悬殊

西欧封建政治机构没有干预经济的职能,更谈不上对经济结构进行强有力的调节。中国不同。西周的政治机构中就设有管理生产和土地的部门,同时“工商食官”——官府垄断主要工商业进入战国之后,私营工商业逐渐发展。这本来是社会进步的大好事,但它不利于兼并战争。所以战国时工商业被认为影响耕战妨碍富国强兵,因而受到种种限制,并被公开视为“末业”、“奸伪无益之民”。从此以后,历代都奉行“尊本抑末”的政策,工商业社会地位低下,并常常受到“迁徙”、“算缗”、“籍没”、“重租税”、低价收购、没收富商(也有官绅、异己势力)的财产、田产的打击。在土地方面,从战国至宋,历代王朝前期都掌握大量土地,除了用于军功事功的赐田之外,还用来调节农民土地的所有权,宋以后不再大规模干涉土地所有权,但从宋至清,都承认农民起义后地权分散的现状。此外,历代都拥有数量可观的官手工业及其工人,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重要工程、重要商业,往往由国家实行垄断。所以我国政治机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调节、影响经济结构。这是西方无法想象的。

四 城市在封建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相反

希腊、罗马等古代城邦是欧洲最早的国家形式。城邦的政治制度、公民大会和长老会议,原来乃是一种原始民主制。城邦分别有掌管宗教、军事、行政的首领,而没有中国西周、东周时期集政权、军权、神权于一身的天子与侯王。中国很难说有过希腊、罗马的“城邦”。城邦为了争取生存和发展,有的城邦联合成联盟,但它不是大一统帝国。后来城邦逐渐发展为城市。蛮族入侵,败坏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从此以后,封建的西欧几

乎没有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市。11世纪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发展,才日渐形成工商业城市。但是城市是兴起在封建主的领地上的。所以领主以土地所有权为理由,要求统治城市,并获得赋税。市民为了求得生存发展,和封建主展开激烈斗争。西欧君主为了利用市民阶级的经济力量,制服分裂割据的封建主与教会势力,往往支持市民斗争。这就是西欧许多城市取得自治权、甚至发展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如威尼斯、热那亚)、城市联盟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城市完全没有自治权。但总的来说,西欧城市自治权长期存在。在中国,从战国时起,历代都有不少数万、数十万人口的城市。尽管战争常常将其化为废墟,但屡灭屡生。不过,中国城市的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根本不存在不受大一统政权控制的自治城市。由于工商业受歧视,所以其盈利往往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转化为地产,所谓“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或者千方百计挤入统治阶级的行列,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市民也休想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城市充当了帝国堡垒的作用。这与西欧城市充当资本主义摇篮的作用恰恰相反。因此虽然郑和下西洋之时间早于哥伦布、麦哲伦百多年,其规模其装备也大于和强于他们上百倍,但前者主要目的是扬威海外,招徕贡国。而后者则是发现新大陆,开辟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五 专制皇权无所不及,欧洲君主无法比拟

“秦家店”是中央集权下的君主专制,所以归根结底帝王及其代理人主宰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又由于政治机构可以对经济发号施令,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帝王“权力无边”,如果他愿



火刑场面 1183年维罗纳主教会议命令份巴第的主教们对拒绝改宗的异端分子进行裁判,这便是宗教裁判所的基地。1233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由多明我会修士领导,以对付在朗格多克日益扩大的阿尔比教徒的异端势力。教皇的这个行动逐渐扩展到基督教的其他地区,成为反改革运动的主要工具。

意的话,他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欧洲大封建主仅把国王看作“平等的第壹员”。等级君主制建立后,王权受到等级代议机关的一定限制。欧洲后期的专制君主制,君权也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找不出一个欧洲的封建帝国可以与秦制帝国相比拟。秦始皇“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以自奉”,二千万人口的国家,居然能调用140万劳力为自己修宫、造陵。公元2世纪时,偌大的罗马帝国,中央政府官员不过150人,而明世宗锦衣卫的特务竟达15.6万人。威震全欧的拿破仑,终身两次娶妻,第一位还是比他年长几岁的寡妇。他难以想像中国帝王竟能“后宫万人”,“粉黛三千”。欧洲著名的专制名言是“朕即国家”,比之我国“富有四海,臣妾兆亿”算得了什么?帝王权力越集中,越强化,帝王对整个社会的

影响就越大。但世袭的、终身在位的帝王,其品质、能力、性格、年龄极不相同,碰上昏庸残暴的,就会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曾发生十次以上人口死亡过半的毁灭性灾难,起码有四次是由于帝王暴虐、倒行逆施造成的。在欧洲,这是不可能的。

六 结束语

通过以上粗略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所谓“秦家店”,即教科书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商周时,形成君主专制主义;到了战国,秦,又形成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与以严刑峻法为主的专制主义的治理形式。其特征主要是:

第一,它通过郡县制,实现中央集权;通过“刑九赏一”实行专制主义的治理。

第二,皇帝掌握了大臣、地方官吏、宗室及臣民的“六柄”——生、杀、富、贫、贵、贱,所以中央集权又是受制于君主专制的。

第三,由于“秦家店”能牢牢控制“文武威德”及神权,主宰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教化、意识形态,因而它又是全能主义的。

这样秦制就是一种不同于欧洲封建国家的双层次专制主义全能的国家。这种国家形式,从它诞生时起,就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秦始皇运用秦制,灭六国、一天下、结束小国林立、国中有国的分裂割据状态。这比欧洲各国实现统一要早十几个世纪,比欧洲正在开始实现的统一,更要早两千多年。欧洲的统一是和平的、渐进的、松散的、邦联式的,而不会是中央集权的,更不是君主专制的。同时秦始皇卓有成效地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也要比欧洲开始实行的“同”早两千多年。欧洲的“同”也是渐进的,同中有异,有刚性同,有柔性同,允许不同。秦虽“亡之也忽”,但秦的国家形式并没有随之灭亡,而是被历代有所增益地承袭了下来,于是创造了许多许多辉煌灿烂的篇章、出现令世界震惊的一个个的奇迹,这就是秦制帝国之所以久居16世纪以前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第一强国的重要原因。但是,秦制从一开始成型,就又充分暴露了它的难以避免的缺

陷。始皇三十一年,即统一天下后第六年,“米石千六百”(《史记·秦始皇本纪》),比统一前官定粮价“石粮三十钱”(见《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飚升了五十多倍;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从全国一千万劳力中调动140万劳力为自己修阿房、建骊山,另外还调动一百多万劳动力建驰道、筑长城、击匈奴……可见滥用民力达到何等荒唐的程度,而滥用民力,必然以滥用暴力为保证,终于使秦王朝亡于农民大起义的怒火之中,结果是人口十亡七、八,过了一百多年,同样的历史教训又发生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身上,结果又是“人口减半”,“人复相食”。之后的帝王,也没有完全避免同样的教训的重复。为什么一个超世界各国之前的、无比强大的帝国终于落在欧美之后,一度沦落为任人宰割的地步?为什么工业化、现代化一波三折、障碍重重?为什么中国人民比西方经历更多的大灾难?……这些都是与“天下安危,系于一人”一言(僨)败)事,一人定国(《大学》)的“秦家店”有关的。

(责任编辑 吴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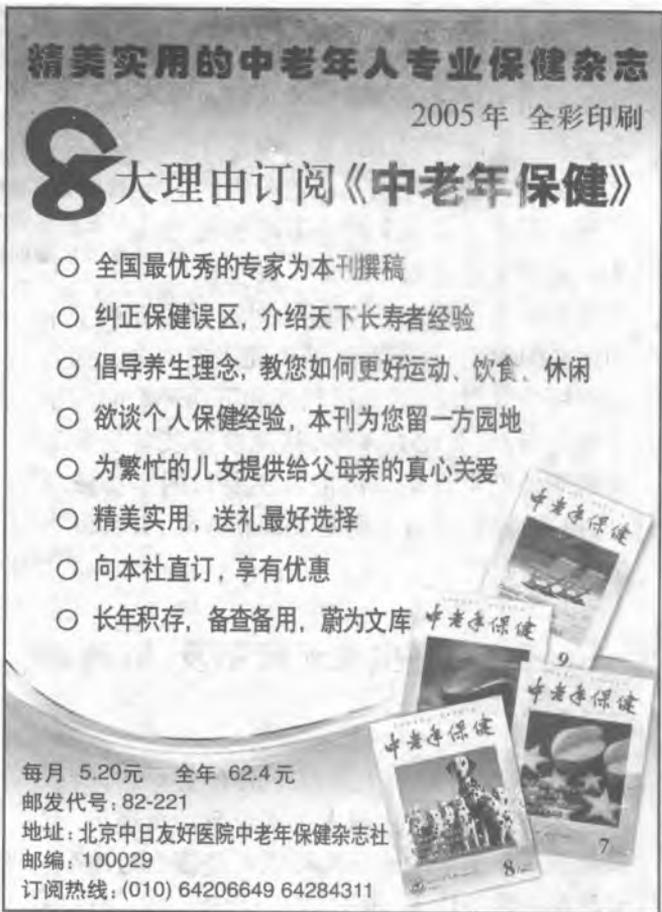
精美实用的中老年人专业保健杂志

2005年 全彩印刷

大理由订阅《中老年保健》

- 全国最优秀的专家为本刊撰稿
- 纠正保健误区,介绍天下长寿者经验
- 倡导养生理念,教您如何更好运动、饮食、休闲
- 欲谈个人保健经验,本刊为您留一方园地
- 为繁忙的儿女提供给母亲的真心关爱
- 精美实用,送礼最好选择
- 向本社直订,享有优惠
- 长年积存,备查备用,蔚为文库

每月 5.20元 全年 62.4元
 邮发代号: 82-221
 地址: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老年保健杂志社
 邮编: 100029
 订阅热线: (010) 64206649 64284311



陈独秀墓的 四次修建

● 张登善

我第一次看见陈独秀在安庆的墓,是在1998年。那时我到安庆市开会,会后,集体到北郊十里埠参观。那个墓实在是简朴、荒凉。在一片小树林里,有一个小小的土丘,立着一块小小的墓碑,碑的正面只有“陈独秀之墓”五个字,背面刻着陈的生卒年月及与原配高夫人合葬等字。这个简单的小碑,有一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惊讶。

在那不到一平方米的碑石上,正面、反面、侧面都密密麻麻地写了上百条题辞,钢笔的、铅笔的、圆珠笔的,字迹不同,纵横交错。

“一代伟人!”“人民怀念你!”“历史将作出评价!”……全是简短而肯定的赞颂之辞。

我在墓前坐了很久,心头不禁涌出几行诗句:

密密麻麻的小树,环绕着你寂寞的坟。

密密麻麻的题字,抚慰着你寂寞的灵魂。

晚上回到招待所,心里还在翻腾。我想起了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为陈胜修墓,并设置了20户人家为之守墓,以纪念其“首义”之功。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急先锋,又是共产党的创建元勋,其“首义”之功还赶不上陈胜吗?他的墓葬规格很低,是1981年党中央决定的,因为他犯过路线错误。但他的路线错得多大,谁认真调查研究过?难道比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三个加在一起还要严重吗?对他的“待遇”,老百姓感到不平,那些墓碑上的题辞,都是一些“不平之鸣”啊。

1999年是陈独秀的120周年诞辰,《百年潮》第11期发表了袁鹰先生的文章《怅望一座墓园》,作者所曾怅望过的,正是我前面写的那座小坟。袁鹰先生为陈独秀说话,立论非常透彻,文字也很动人。读后极为感佩。最后一段关于墓的见识,也极高明。他写道:“……获悉,安庆市已决定重新修葺陈独秀墓地,这真是一条好消息。……对他来说,真正的丰碑不在安庆市长江畔,而在千秋青史中,在亿万人心头,多少云雾烟雨都掩盖不住的”。

这条“重新修葺”的消息,引起我的关注。我特地委托一位家在安庆的亲戚去打听。2000年5月25日,亲戚访问了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的三女儿陈长璞。陈女士说陈独秀在安庆的墓已修建四次。第一次在1947年,陈松年将父灵柩自江津运回安庆,草草安葬。原江津的墓已改为衣冠冢。第二次是1979年陈独秀诞辰100周年之时,安徽省委批文以家属名义对陈墓加以修葺。因为是家属名义,碑上就有了“子松年泣立”的字样,全然一座私家民墓了。1981年陈松年给邓小平写信请示修墓问题。根据邓的指示,1984年安庆市再修陈墓,这是第三次。修出的墓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小土丘。因为碑文交待欠清楚,无事迹、评价,故被讥为“无字碑”。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安庆市对陈独秀墓有提高规格重新修建之意。并于1995年在墓附近设一小型资料室,以补“无字碑”之不足。1998年有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谈及陈独秀故居及坟墓问题,中央决定第四次修墓。1999年举行了有国家、省、市三级专家参加的修墓方案论证会。会后开始了第四次修建。

2001年5月,我去安庆瞻仰了陈独秀的新墓。规格比上次的高多了,全是混凝土浇注的,基底达40米见方。附近还开辟了一个总面积约20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作为资料室,计划五个展室,已开放三个。

我看了很高兴。又不禁有些浮想。

从陈墓迁到安庆起,约五十年间,修了四次,搅得老先生不得安眠了吧。一般人换了大房子都会高兴的,陈独秀呢?此公的性格,热情而倔强,这在他同乡老友朱蕴山的一首诗中有很好的刻画:

掀起江楼百丈潮,当年志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他最大的“憾”,恐怕还是“吾道不行”、“空文自老”吧。而这种“憾”,又岂是换一个墓所能消解的呢。

但我要诚恳地告诉墓中人,不能小看了这座墓。虽说墓并不重要,墓和人也难得做到匹配,“小人睡大墓”,“大人睡小墓”的现象充斥着历史。正如袁鹰所说:“真正的丰碑在千秋青史中,在千万人心头”。但是,他陈独秀墓的改造,乃是民意推进的结果,说明公道自在人心;又是学者们深入“禁区”、“半禁区”(萧克将军语),对陈独秀认真研究、客观评价的结果;也是党的领导人,20余年来,在拨乱反正中逐渐走出历史上对“路线斗争”的理解的一系列误区的结果。所以,陈独秀墓的重修,是有着特定的意义的。它是时代进步的一个物化标志。这总是值得告慰的吧。

(责任编辑 致中)

温家宝在安徽的一次下乡

● 陈桂棣 春 桃

温家宝是中央领导层深入到安徽农村搞调研次数较多的一位,同时,也是让陪同他的地方干部最头疼的一位。为了了解到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他常常不给地方一些领导人留面子,想方设法冲破对他的“封锁”,使得刻意弄虚作假者不知所措。

1996年5月麦收之前,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到安徽检查扶贫工作。一来就约法三章,不搞迎送,不搞陪吃,下去时更不许前呼后拥,一切轻车简从。

他的随行人员也是屈指可数,除秘书田学斌,警卫参谋张振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各来一位局长,还有就是农业部的一位有关领导。

那次他们来了后,就同安徽省的有关领导分乘两辆普普通通的中巴车,直奔大别山革命老区。

在从金寨县通往霍山县的山道上,温家宝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他招呼司机说:“我要方便一下。”司机当即把车停住。

车上的人都以为温家宝真是下去“方便”了,谁知,他跳下车后,快步前行,沿着一条小路就一直往前走了。

坐在另一辆中巴车上的安徽省的领导,这才发现,前面有座不大的村庄,温家宝正向那个村庄走过去,他们不免感到诧异。因为这是在事先安排要视察的计划之外。而且,看上去,还是一处十分贫穷的地方。

大家赶忙下车,快步跟了上去。

温家宝见几个农民扛着树皮走过来,就迎上去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一个妇女见问话人面相慈善,话声和蔼,虽是干部打扮,却没有想到这会是中央下来的干部,因此答得就很随便:“现在青黄不接,山上没东西可卖,供销社正在收购树皮,听说造纸用,就削点树皮去卖,好买点口粮回

来。”

温家宝转身又去打问一位男青年,当得知对方是位民办教师,便仔细了解他的工资情况。民办教师发愁地说:“乡里一个月只补助五十元,连吃粮的钱也不够,说是补助,也只是欠着,赶到要过年了才给,平时就连买粮的钱也没有。”

温家宝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点着头。

他在村子里各处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这才上车。到了霍山县城后,他随使用了一下餐,就要求听县里汇报。

霍山县委书记不知道温家宝在来的路上已经没按“规定”下过车,依然像往常一样地做着汇报,他甚至激动地说道:“这几年,我们霍山县有了很大的发展,既脱帽,又加冕,脱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县的国民生产总值、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农民增收的各种数字,熟练地报了一遍。他还准备把各种成绩的统计数字一一报来,温家宝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忽然问:“你这个县这么好,可以按时发工资吗?”

县委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不欠全县职工一分钱!”

温家宝点到了他下车看过的那个村庄的名字。

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指出:“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村。”

温家宝幽默地笑道:“你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

县委书记这才知道遇上了麻烦,偷偷地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委领导,见省委领导都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不由得急出了一头汗。

温家宝严肃地说:“同志们,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数字,我更看重农民家里的生活水平是否真的提高。你

们都很年轻,我希望你们多到农民群众的家里看看,真正做到脱贫很不容易,何况有些脱贫了还会返贫呢。”

也就是在那一次,温家宝要看龙河口水库淹没区农民的生活状况,舒城县却安排了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村子让他看。他一眼就发现了问题,问:“这儿是淹没区吗?”

县委书记见瞒不过。只得照实说:“不算淹没区,只是边缘地带。”

“我要看淹没区,看最贫困的村子。”

舒城县委书记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因为以往下来检查工作的中央领导或省领导,没谁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安排领导参观“形象工程”,视察“闪光点”,早已成了一条程式化的不变的“规矩”。于是,这位县委书记搪塞道:“那儿路不通。”

“你说的不通,是不是车子开不进去?”温家宝认真地问。

“是。”

“走路要走多远呢?”

县委书记想了想说:“十公里吧。”

温家宝一听,朗声笑道:“不算远,那我们就走去。”说着,做了个挽裤脚赶路的动作。

当时的省委书记卢荣景见温家宝决心已定,马上接过头:“快上车,开到哪儿不能开了,再下车走嘛!”

于是大家陆续上车。

舒城县委书记说“路不通”,只是不希望温家宝看到穷得不像样子的地方。不过,他又是一个实在人,见省委书记表示了态同意去看,也就没再留点小心眼,把自己曾说过路不通还须走上十公里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指挥着司机顺顺当当地将车开进了一个村子里。

省农经委的吴昭仁在和我们讲起这段插曲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无地自容的神色。他说:“我当时一听县委书记说‘到了,下车吧!’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心想,你这个县委书记真要命,说过这村子车开不进去,你至少也要停得远一点,让大家走几步,哪能让车一下子进了村?这让陪同的省领导在中央领导跟前,脸往哪搁?这时就听走在我边上的王昭耀副省长说:‘地上有缝都想钻进去



温家宝在河南农村和群众共度春节

……’搞得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硬着头皮走下车。”

那确实是个很穷的村子,房子不像房子,阴暗潮湿,因为农舍里太黑,大白天走进屋,半天看不见东西。其实,看见跟没看见都不重要,许多农家家徒四壁,半个村子跑下来,没看到谁家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温家宝一连看了几户农家,心情很是沉重。

又一次,温家宝到安徽检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工作。在阜南县,县里安排是看小陈庄,这是一个新建的村,两排楼房十分漂亮地拥路而立,中间的马路也修得很宽,看上去不仅富足,还透出几分气势。但是,温家宝下车后只看了一眼,就拒绝进村去看。

这弄得陪同的领导十分尴尬。

吴昭仁是多次陪同温家宝到安徽各地视察的,彼此已经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说道:“既然来了,进村看看吧!”

“不看,”温家宝不为所动,“要我看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有钱人,盖了几幢新楼房。”

县里领导忙解释:“还有个座谈会……人已到齐了。”

温家宝坚持说:“这个座谈会我不参加。”

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窘迫。

这时,走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温家宝于是上前打问:“搬到这儿来,你们是自愿的吗?”

对方高声答道:“完全是自愿的。”

温家宝若有所思地又问:“住这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哪?”

“ 两万多。”

温家宝朝村里望了望,空无一人,就打量起走过来的这两个“农民”。显然他已从对方回话的口气中悟出了什么,指着其中的一人问:“你在村里具体干什么呀?”

对方说:“支部书记。”

温家宝幽默地笑了:“那我就问问你,为什么要修这么宽的马路,占用这么多的耕地呢?”

支部书记哑口无言。

重新回到阜阳市,市委将温家宝一行安排在国际大酒店,温家宝一听是“国际大酒店”,坚决不住,要求住招待所。

由于温家宝的坚持,最后下榻在作为市委招待所的“颍州宾馆”。晚饭后,温家宝也不愿休息,要求安排两个县委领导汇报有关工作。汇报时,太和县委书记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刚念了个开头,温家宝就示意对方停下来:“你们不要念稿子好吗?”

离开了稿子,这位县委书记竟不知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了,变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狈。

温家宝失望地摇了摇头,说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气,在阜南县的那个村子里,见不到一个群众,不知道你们想让我看什么?去年,我到河南省,一个县委书记也叫我去看一个这样的村子,见不到农民,村里的马路修得比你们这儿看到的还宽,房子也比这儿漂亮,我就问那个县委书记,这样好的村子在你县占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说,百分之二十吧。我说,好,就是占到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更想知道你们县百分之八十农村的情况,你带我去看看好吗?他马上说,路不通,不好去。我说,车子去不成,人总可以走进去吧,那么多的农民可以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呢?你带路,我要进去看看!”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

陪同的安徽同志,当然听得出此番话的意思。借故路不通,不希望他看到自己管辖范围的落后面、贫困状况的,不止是河南省的那位县委书记,他在安徽舒城县就有过同样的遭遇。只给上面展示“政绩”,看“莺歌燕舞”,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中国各地蔓延成灾。

那天晚上,温家宝谈了很多,谈得推心置腹:“阜阳地区我来过几次,通过前后对比,我看有很大发展,农民生活也有很大改善,当然离小康的要求、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一个地区里面也还有很

大的不平衡。可能有很好的村,但也有相当多的一般村,还有很多贫困村。就一个村子来讲,也很不平衡,有富裕户,有大量的一般户,也有比较困难的户。我觉得我们的农民非常知足,就吃几碗白米饭,没什么菜,住的又是那个样子,但是对党,对政府,却没有什么怨言,非常朴实。我感到我们的农民,是非常有觉悟的,越是这样,我们的干部就越应该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怎么帮助农民尽快地富起来,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说:“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我的好多政策上的想法,都是我随便下车了解到的。地方上准备的东西,和要看的方面,往往是一些比较典型、比较成熟的闪光点,不是说这些地方不真实,但常常不具备普遍性。所以,我非常喜欢随便走走看看。我的调查研究很简单,就是开车随便进一个村,有时要谈一个小时,也可以跟农民谈一天。最长的一次是在铁岭,我坐在炕头上和农民谈心,从中知道了好多事情:土地关系、分配关系、干群关系。不坐下来深入地谈,就很难了解到。即使这样,我仍觉得自己对农村的了解恐怕至多只有十分之一,大量的情况还是不了解的。我知道农村的情况并不都是好的,需要我们去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座谈,能畅所欲言,有什么情况就讲什么情况。”

他是从天津市旧城区一个普通的胡同里走出来的,有着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方米房屋里的经历,因此,“平民情结”一直根植在他心中。他非常喜欢深入基层,在全国的两千多个县中,他居然跑了一千八百多个县,这在中央一级的领导中,恐怕是最多的。

那一天,他动了感情说道:“我们党的政策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我还希望去看绝大多数群众。如果农村都这么好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在北京郊区的房山,我看到过许多农民仍在看九英寸的黑白电视,难道你们这里比北京郊区还好吗?共产党人一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关心少数人!”

他特别强调:“我再说一遍,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参观的,请你们不要只让看‘闪光点’!”

坐在会场上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是个绝顶的聪明人,他马上离开会场,慌忙要人给颖上县打招呼,将原安排第二天去颖上参观“全球环境五百佳”的小张庄与八里河的计划取消;并交待,从阜阳宾馆拉过去的那些高档餐具和借去的厨师,统统连夜撤回,不得有误!

(责任编辑 吴 思)

陈云主持的两次调查会

● 苏 星

陈云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方法，长期以来，为全党所称颂。这里，我只根据自己亲自接触的事情，对陈云怎样做调查研究，讲几点亲身体会。

要用 90% 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

陈云常说，做工作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怎样才能做到唯实呢？主要靠调查研究。他告诉我们：“领导机关决定政策，要用 90% 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做决定用不到 10% 的时间就够了。”他不仅这样说，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1962 年 2 月，陈云在西楼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后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困难，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具体办法，并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战略决策。这个讲话，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受到全党的热烈拥护。

陈云的讲话，为什么能够如此深入人心，使大家信服呢？主要是因为它是从实际出发的，符合实际。能做到这一点，则得益于他所作的大量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1961 年，他首先到农村做农业调查。6 月下旬到 7 月上旬，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做调查。调查后，向党中央送了三个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农民私管；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今天看，这些建议已无足轻重，但能在“左”倾思想泛滥时提出这样的建议，还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1961 年秋，陈云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两个座谈会，做工业调查。10 月 14 日至 11 月 3 日，召开煤

炭座谈会；11 月 24 日至 12 月 11 日，召开钢铁座谈会。两个会前后开了 37 天。按原计划还要开一个机械工业座谈会，由于陈云身体不好，1962 年初开了一次会，就停下来了。我当时在《红旗》杂志社工作，领导曾派我列席煤炭和钢铁座谈会，给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在会上，我认真听大家的发言，并做了详细的记录。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学习机会。它不仅使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三年“大跃进”的情况和问题，而且亲身领会到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的调查研究的方法。

煤炭座谈会开始，陈云首先说明了座谈会的性质和开会的方法。他说：根据典型的情况（从 61 个直属矿选了 6 个矿）找出若干问题，专门讨论。可以得出共同的意见，也可以得出不同的意见。共同的意见也不做结论。讨论中分两类问题：一类是厂矿内部的问题，一类是从部、从全国的角度看的问题，即属于全局性的问题。工业和农业不同，必须同时考虑企业内和企业外的问题。讨论方法：先报告，再专题讨论，重点在专题讨论。从 10 月 14 日到 20 日，听了 6 个矿务局的报告，21 日听了煤炭工业部部长的报告。汇报时，陈云每天按时到会，总是聚精会神地听每一位同志的发言，而且把要点记下来。在听汇报过程中，有时也插话，但插话不多。煤炭部部长汇报后，陈云提出了 18 个讨论题目，其中包括：三年来煤炭产量上升的原因，1960 年下降的原因，现在的生产能力有多大？其余都是具体问题，其中包括工人住在农村的家属粮食定量不够的问题。他认为，讨论最怕囫圇吞枣，问题分得细，讨论反而快。

经过讨论，陈云根据大家的意见，把三年煤炭产量上升归纳为四个原因：（一）增加来自老井、新井、卫星井和工程煤；（二）底子好；（三）

干劲大(四)不适当的开采(约6000万吨)。1961年煤炭生产下降的原因:(一)生产指标高了;(二)基本建设摊子大了;(三)因此,材料、设备分配少了,带病运转;(四)生活从1959年开始出问题;(五)管理混乱(技术革命、工具、巷道维修、各种制度)。他指出,采掘跟不上,是指标高逼的,生产指标摆在第一位,别的都同它有关。陈云说:“头几年不管什么原因总是上去了。中央、地方都积极得很。当然,预先看到问题可以改,但是也很难。通过这次座谈会,一要了解问题所在,二看综合水平如何,三是研究十年八年以内的根本性问题。”

钢铁工业座谈会的调查研究方法和煤炭座谈会大体相同。

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提出了重大的调整部署。他主张,把十年(1963-1972年)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同时提出,减少城市人口;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在这一战略部署的指导下,中国经济才慢慢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希望。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告,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无所顾忌 左思右想

调查研究的成败,关键是被调查者敢不敢讲真话。要使被调查者讲真话,首先调查者必须讲真话。

煤炭座谈会一开始,陈云就强调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他说:座谈会要无所顾忌,左思右想,不要怕说右倾。从各种角度考虑问题会周到一些,避免片面性。



1960年11月,陈云视察济南化肥厂

这几句话太重要了。至少是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党内说假话成风。比赛谁的假话说得大。说真话则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受到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讲真话?这个座谈会,如果和过去一样,只讲假话,不讲真话,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陈云同志提出的无所顾忌,左思右想,对与会者是一个思想大解放,大家都敢说真话了,才有可能开好这次座谈会。

在会议过程中,陈云一再强调讲真话。

第一天,陈云在听完阳泉矿务局党委书记的汇报以后说:革命总是有对有错,好事讲不坏,坏事讲不好。见了面只是哈哈,革命会大势已去。胜利了的革命也会大势已去。革命是讲道理的,真理不能说成为谬误,谬误也不能说成为真理。一看就对的人,世界上还没有。在陈云的鼓励下,汇报的同志确实做到了畅所欲言。

在汇报中,党委书记们对煤炭产量下降列举了许多原因。如高指标,追产量,加班加点挤了维修时间;采煤方法不当,吃厚煤层多,吃薄煤层少,大巷失修,工作条件变坏;材料设备供应不足;新工人多,技术水平和思想觉悟低,管理削弱……但最突出的是生活问题。阜新的同志说:由于生活问题解决不了,粮食和副食品不足,工人体力普遍下降。他们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大跃进”带来的。1958年以后,管理制度剩下不到一半,而且自流了;指标过高,规章制度(包括计划平衡、采掘衔接)不能坚持,乱采乱掘;取消计件

工资,使劳动生产率下降了;生活困难,带来职工队伍不稳定;技术人员政策不落实,有功不显,有过难逃;群众对干部说的话失去信任,说“1958年号召什么听什么,1959年怀疑,1960年不敢说也不敢信了”。

汇报以后,一位党委书记说:“过去只能在桌子下面讲的话,现在也搬到桌子上面来了”。陈云说:“共产党员的桌子下面的话,总有一天要搬到桌子上面来”。有人开玩笑,说“除非是和老婆说的话”。有人说:“那也不一定。”

要做事后诸葛亮

有一位党委书记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后说:“我这都是事后诸葛亮”。

陈云对大家说:就是要做事后诸葛亮。他说:没有事后诸葛亮,就没有事前诸葛亮,事后诸葛亮就是总结经验。错误不可避免,要客观,要接受经验教训,肃反的经验最多,没搞过的也会出“左”。土地改革也是一样,去过中央苏区的人,还是可能出“左”。许多事情自己没有经历过,就容易出问题。每个部门都有很多争论,问题是采取正确态度,要客观地看问题,否则,今后还会重犯错误。

当煤炭部谈到“大跃进”期间生产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时,陈云说:“最核心的问题是每年增加多少煤。但每年能增加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10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头三年每年增加2690万吨。过去一个时期建设煤矿靠外国设备。现在要转到完全靠国产设备,争取配套。这样,每年增加2300万吨不容易,增加2000万吨比较充裕。”

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教训,陈云提出,一定要算账。生产和基建所需要的主要设备、一般设备、辅助材料、三类物资到底需要多少?几项材料要分别计算。以后做老实事,材料不够,可以请示综合机关,或者吃老本,或者减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是算账,一是材料和指标要一致。算账很重要,五块钱只能做五块钱的事,不能做八块钱的事。他特别强调,不要怕降低指标,向下是实的,向上是虚的,下马总有个底。东西多出来了,

谁也吃不下去,半年以后可以作结论。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调整到100亿元,半年以后东西多出来了,结果完成138亿元。

陈云很注意引导大家认识错误的性质。他说:“我们在农村推广密植、种双季稻都是好心,但方法不对。我们是好人有缺点。比如电力排灌农民就非常满意。我们究竟是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做坏事是出于本心还是方法不对?完全可以用事实说服农民。”

对于如何纠正错误,陈云认为,纠正只要开始走一步,就松动了。有了十二条(即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才有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不要急了,要一步一步认识。

陈云的话使与会同志在认识上、思想方法上受到很大启发。当时煤炭和钢铁工业虽然正处在困境,两个部门的同志不但没有垂头丧气,通过座谈会,向领导讲了心里话,反而提高了信心。

我讲的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已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1984年,陈云就说:“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50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但我认为,陈云的调查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并未过时。它是不朽的。(责任编辑 吴 思)

本刊启事

一、有关报刊转载我刊的文章,要注明转自《炎黄春秋》某年某期,并寄给我社一份样报(样刊)。

二、寄给我社的稿件,请作者注明真实姓名、详细地址、邮政编码、电话或手机号码。

三、我社来稿很多,对稿件的处理情况不能一一告知作者;作者寄出稿件三个月后未接到我社刊用通知,即可自行处理。我刊不采用的稿件不退稿;需要退稿者,请作者注明并附足邮资。

四、投寄我刊的稿件,内容必须真实,不得虚构。文内重要引语、数据、资料要注明出处。因内容失实和抄袭他人作品引起纠纷和诉讼,由作者承担责任。

五、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所刊文章更贴近读者,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您想看哪种题材、哪方面内容的文章,以便我们约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本刊编辑部

我们怎样安排上级访穷村

● 韩立坚

1989年春,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处处长曹光福和科长顾星,一起到我们滨海调查农村脱贫情况,要求安排到最穷的村调查。当时我任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按对口接待的原则,由我负责陪同他们进行调研。

要求到最穷的村,具体到哪几个乡镇、哪些村呢?我请示有关领导,他们很有顾虑,担心被抓到反面典型。于是决定安排到北坍乡渠东等村调查。这些村在滨海来说,属于中等偏上的村,但对省委研究室的同志却说是“最穷的村”。实地调查的时候,只见一排排居民点整齐划一,户户都住上了新瓦房,每户粮食囤子里都有几千斤粮食,真可谓“大囤满,小囤流”,一片兴旺富裕的景象。再看看田块,横竖成方,沟渠配套,三麦、绿肥布局科学,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到一点“穷”样。看到这些“最穷的村”如此脱贫,曹光福和顾星却一点高兴不起来,反而频频皱眉、摇头,最后终于和我摊牌了。

原来,前几年江苏省委、省政府曾经组织有关部门深入到徐、淮、连、盐地区调查,省委农工部长吴镛同志写了一篇调查报告《一个值得重视的贫困地带》。这篇调查报告确实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重视,省成立了扶贫办公室,协调有关部门在苏北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扶贫工作。随着扶贫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地区上报显赫的脱贫成果,形势越来越喜人,似乎扶贫任务已经结束了,有不少人建议撤销扶贫办公室。但省委、省政府领导为了慎重起见,委托省委研究室的同志到苏北贫困带走访调查一下,看看最穷的乡村现在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状况究竟如何?到底有没有脱贫?省委、省政府将根据调查情况,作出进一步决策。

曹光福苦笑道:“这次从徐州、淮阴到滨海,每到一处我们都要求看最穷的地方,但每次实际看到的都是比较富庶的地方。苏北是不是真的全部脱贫了?这可关系到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啊!”

接着,曹光福再三要求我们安排他们看看真正穷的地方,并表示这次调查,决不影响滨海的政绩,也不会抓反典型、抓辫子。

我感到他们这次调查的严肃性和对省领导决策的影响,立即打电话向县委领导如实汇报并请示办法,他们终于同意我陪同省委研究室的同志到真正贫困的地方调查。

我把省委研究室的同志带到天场乡马套村,他们终于访到了穷村。听说省里有人来调查了,不少农民很快围上来。只见人们不但衣衫褴褛,而且明显营养不良,面露菜色。到各户走走,各家囤子里只有作为烧柴的稻谷壳子,却没有什粮食,有的人家草房四沿墙壁将要崩裂,梁和檩条用树棍顶着,草绳捆着,稍有风雨就要倒塌。再到大田看看,只见田块横七竖八,白花花的盐碱泛冒处,连茅草都不生。这里与北坍比较起来,真正是天壤之别!

离开企求脱贫的乡亲们,曹光福感叹两个(下转 54 页)

培育出新中国两位总理的名校

——纪念天津南开中学建校一百周年

● 申泮文

周恩来和温家宝都是天津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周恩来在 1913—1917 年期间就读于南中,那时南中是 4 年制私立学校。温家宝在 1954—1960 年期间在南中就读,这时南中已经是 6 年制的公立学校了。两位总理在中学学习期间相距 40 余年,不同时代、不同家庭出身、不同成长经历、不同锻炼,但同为国务院总理,同出于同一名校,这里有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这必然性就在于南开中学四所学校(南开系统 4 所中学,即天津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培养人才的作用,不同凡响,历届毕业生中英才辈出,在全国中等学校中人才效益独占鳌头。这符合于国际教育规律,就好像是英国牛津大学多出首相,美国哈佛大学多出专家。

为纪念建校 100 周年,南开中学于今年 5 月 1—8 日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场“百年南开”展览,盛况空前。在观展人题词中,有一名知名校友作了如下题字:

南开百年成功教育的魅力在于:

- (1) 真诚的教育家办教育,不拘一格育人才;
- (2) 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出英才;
- (3) 培养高层次人才立足于国内。

参展的工作人员和许多校友,一致认为这个题词题得好,总结概括了南开办学特色,每一条都涵盖了许多南开故事。据此,作者就以此题字为纲,写一写我所知道的南开故事,也借以表达一位校友的祝贺。

一 真诚的教育家办教育 不拘一格育人才

在南开学校的百年教育中,不拘一格培育人才的故事是很多的,最典范的故事,是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范孙)作为伯乐,善待周恩来,把他培养成材的故事。

严修(1860—1929),字范孙,天津人。满清末年 1883 年进士,官授翰林院编修,补国史馆协修。1894 年清廷委派他出任贵州学政,相当于今日的教育厅长,在任 4 年,尽心于推广新学,选拔人才,不遗余力。当时正是甲午战争之后,内忧外患,国势危殆。严修忧国忧民,认为要强中国,必须创办新教育,培养新人才。后离职回北京,上疏朝廷,建议开办“经济特科”(就是创办现代科技文教的新式学校),1898 年光绪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疏,但却因此得罪了全朝廷的保守派,罢了他全部的兼职,只留下了编修虚职。1898 年末严修辞官回天津,专心致志于兴办新式教育。

从 1901 年开始,严修逐步改革自己开办的家塾课程,并改聘教师,请张伯苓等来做家塾教席。1904 年改家塾为敬业中学堂,后因房舍不敷应用,1906 年在南开洼购地建新校,改称南开中学,聘请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严修聘请张伯苓,并帮助他办教育,也是严修慧眼识人,不拘一格选人才。张伯苓原是海军专科学校毕业的一介士官生,严修把他聘来,委以重任,当新学教师,当校长,带他出国考察,从办中学、办大学直到办

完整的教育体系的学校,让张伯苓在教育实践中成长,终于把张伯苓培养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大教育家。

南开中学在张伯苓的锐意经营下,始终保持优良纯朴的学风,教师授课认真,对学生严格要求,精心培育,赢得社会上很高声誉。同时,校内社团活跃,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兼重体育锻炼。全国各地优秀青年纷纷慕名来津投考。学生人数十年间发展到近千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周恩来于1913年秋考入南开中学。入学后,就显示出他的优良品德和卓越的才能。他学习上孜孜不倦,成绩突出,还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深受同学爱戴,并也得到校董严修的格外赏识。严修称赞周恩来:“此子有宰相之才”。不久就建立了交往关系。1916年春,南开举行全校作文比赛,试卷由严修亲自批阅。结果周恩来取得全校第一名。发给的奖品是一面锦旗,旗上有严修亲笔书写的四个字“含英咀华”。严修得知周恩来



严修

家境困难,即关照学校减免周恩来的学宿费。周恩来是当时南中唯一的免费生。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金质奖章和奖状。不久,在严修和张伯苓等师友的资助下,周恩来赴日本留学。

1917年8月,张伯苓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教育。翌年4月,严修亦去美国考察教育,为创建南开大学做准备。此时严修已年近花甲,赴美旅程途经日本,在东京约见周恩来,数次晤谈,留日南开同学亲治菜肴便餐招待了严修,师生相聚甚欢。在东京逗留8日,登轮离开日本时周恩来码头送行。

严修到美国后,部分时间与张伯苓相伴,晚间听张伯苓讲教育,白天参观访问或随张伯苓到哥大听课。其余时间遍游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各级各类学校,详查其教育体制,访问了许多校长和教师,同时也考察了彼邦与教育有关的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等。旅美为时半载,年底偕张伯苓回国,返途仍经日本,再次晤及周恩来等人,并聚餐合影留念。

严、张返津后,立即投入南开大学的筹建工作,经半年紧张筹备,南开大学于1919年9月正式开办,9月5—6日举行入学考试。此时周恩来已应严修之召,提前回国,参加考试。经合格录取,入文科班学习,成为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南开大学于1919年9月25日举行开学典礼,次日开班上课。但是周恩来并没有从此闭门读书,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五四”运动后天津市人民抵抗反动北洋政府镇压爱国行动的斗争和支援全国人民的抗暴斗争,成为天津市人民群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20年1月末周恩来等四人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投入监狱,历经半年之久。在群众运动正义压力下,反动当局于7月17日被迫释放了周恩来等人,但同时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南开大学开除周恩来的学籍。张伯苓被迫接受了开除命令。

尽管处境不利,但严修对周恩来仍非常关怀,继续培养周恩来。是年,严修捐款7000银元,设立“范孙奖学金”,经征得张伯苓和校董的同意,选定周恩来和李福景二人,派遣出国留学。李福景到英国,周恩来到法国。严修并在严家账上为周设立专门户头,每半年支款一次,托人负责

转寄。后来李福景获得英方学校奖学金，将应得的范孙奖学金退还，严修鉴于周恩来在法国的开支较大，将原奖给周李二人的奖学金一并支付给周恩来一人使用。严修原本希望周恩来来到西方上大学求学上进，周恩来没有去上大学，而是在寻访西方的革命理论、考察工人运动，最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主持中共旅欧支部的活动。

周恩来在法国的活动情况传回国内，便有友人进言严修，说“周恩来这个人已经变了心，参加了共产党，你不要再支持他了。”严修回答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继续汇钱给周恩来给予支持，直至1924年7月周恩来奉中共中央命令回国参加国内革命斗争为止。严范孙在经济上支持了周恩来在法国的整整4年的革命活动。严修与周恩来在意识形态上有矛盾和冲突，例如，严修反对学生运动中所谓的过火行为，这与周恩来的彻底革命意识相悖。又如严、张向达官、贵人、军阀捐款助学，周恩来则坚决反对，并见诸文字和言论。严修则不以为然，说“盗泉虽不可饮，但可濯我足，何利而不为！”面对矛盾冲突，严修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周恩来，而以“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支持周恩来的自主发展。可见严修的宽宏师德。

周恩来到法国留学，不在邓小平、聂荣臻等人的“勤工俭学”之列，过去的历史文献有误载。《严修日记》（原稿存天津档案馆）的记录可以证明，周的旅欧之行，完全是严修资助的。另一项记录是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周恩来告诉我说，当时有朋友提到，我用了严修的钱，却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严引用了中国一句成语“人各有志”。我感激他。”严、周的忘年友谊是中国革命史中的一朵奇葩。

二 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出英才——抗日战争前南开中学的学生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相继沦陷。随后日军铁蹄越过长城，入侵华北。1933年春夏之交，抗日将领冯玉祥、吉鸿昌在察

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奋起抵抗日军的侵略，因南京政府的阻挠破坏而告失败。当年5月南京政府与日军竟然签订了《塘沽协定》，承认冀东、冀北、绥东为“非武装区”，日军可以进驻长城线内，华北门户洞开。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群情激愤，青年学生更是义愤填膺，爱国抗日学生运动逐渐向高潮发展。在全国孕育形成了抗敌救亡和遍地英雄人物脱颖而出的伟大氛围。

1934年10月，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在开幕式上，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学生组织了庞大的拉拉队，数百人整队坐在主席台对面斜坡看台上。用黑色和白色方巾布旗，组编“勿忘国耻”、“勿忘东北”、“收复失地”等大字旗号标语，表达南开师生的抗日情绪，有的同学还现场散发了抗日传单。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日本领事当场提出抗议，大会总指挥张伯苓校长当即予以拒绝，说群众活动无法干预。日本领事遂通过该国政府向南京政府进行交涉，南京政府教育部电令张伯苓对学生们进行约束，避免事态扩大。张伯苓便把拉拉队负责人找来，对学生们说：“你们这件事办得讨厌，讨厌得好，希望你们以后继续这么讨厌。”学生们心领神会，知道张校长是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的，更加坚定了抗日信念。

《塘沽协定》后，南开中学学生中组织的抗日小团体，犹如雨后春笋，但政治属性比较复杂。例如亲共抗日的左翼文艺团体“野烟社”，国文教师张锋伯和社会学教师吴宽带领学生组织的“青年友社”，军事训练教官带领的“学生军事训练队”骨干等。“野烟社”是1936班学生高云屏、张炳元、梁华锴（白文治）等自发组织的文艺团体，组织出版不定期刊物《野烟》，发表追求光明、揭露黑暗、宣传抗日、赞美红军等文艺作品。但此时他们仅是有进步倾向的学生，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联系。只是到了“一二·九”运动时期，他们三人才成为南开中学第一批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除高云屏等的地下党支部外，当时南中还有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民族解放先锋队），其成员有吴祖贻、叶笃成（方实）等。他们一起成为推动南开中学学生抗日运动的骨干力量。

张锋伯和吴宽是两位学生们尊敬的爱国教



校内大院周恩来铜像和胡耀邦题词

师,负责辅导学生会工作,常在课余之暇,组织学生,讨论抗日救国大计,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在中日签订《塘沽协定》之际,张锋伯、吴宽带领学生会起草了“反对塘沽协定宣言”,被天津市和学校当局制止,他们二人被迫辞职。离校前,在熟知的学生中组织了抗日团体“青年友社”,以“反蒋抗日”为纲领,引导青年学生走上抗日救国道路。当时学生们并不知道张锋伯的政治背景,只是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张锋伯以西安市副市长、陕西省民盟主委、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公开亮相时,大家才知道在中学任教时,他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张锋伯原是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幕僚,冯玉祥内战失败下野,隐居泰山读书时,才转入南开中学执教。在1936—1937年的学生抗日运动当中,青年友社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参加青年友社的同学横跨3个年级,记忆起来的有:1935班的李璞、徐文园、张中厚、王大纯、申泮文,1936班的王树勋、申宪文、张开运、么自兴、滕国定、汪绍诚等,1937班的刘东生、涂光炽、刘守悌、杨紫、林观善和低年级的王曾壮、涂光涵等。

抗日战争前,南开中学设有南京政府派来的军事教官,主管各年级学生的军事训练,他们都

是军官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任务除了负责军训之外,当然还有为南京政府作正面形象宣传的责任,鼓励学生投考国民党政府主办的航空军校和中央(黄埔)军校。由于人们头脑中的正统思想,南京政府是中国的政府、蒋介石是政府领袖,还是有人相信的,所以仍有学生向往投笔从戎考军校。这在当时抗日救国大环境下,尽管政治理念不同,但为国捐躯大志却是殊途同归也是正常的。

1935—1937班投考了军事学校有记录的同学是:

中央航空军校,邹道宽、裘志鹏、柳东辉、宋寿椿、王绶昌、刘维权、欧阳寿、徐世友等。

中央军官学校,潘成伟、宁金波、林俊德、王秉立、申质文、段昌义等。

“一二·一八”天津学生大游行 1935年6月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何(应钦)梅(津)协定》,将华北军事、政治、经济主权悉数奉送给日寇。11月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防共自治政府”,随后南京政府委派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危在旦夕。在这紧急关头,北平学生掀起了伟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2月18日南开中学学生800人参加了天津学生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示威大游行。当晚南中学生在校内举行集会讨论进一步开展救亡活动。会上有人提议集体赴南京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经表决多数通过。当晚南中学生370余人赴天津西站卧轨拦截火车,津浦路中断。于是学生改步行去南京请愿,行30余里至杨柳青,学校派人和家长劝阻,用汽车将学生接回学校,宣布提前放寒假以平息运动。返校后有百余学生决定分头秘密赴南京,12月30日有109人到达,几经

交涉,得到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和教育部长王世杰接见,劝阻抚慰有加,又由校友出面劝说,挂了一辆火车厢押解回津。

“五·二八”天津学生大游行 进入 1936 年,天津形势日益恶劣,日军增兵、浪人猖狂走私贩毒,海河浮尸不断(中国工人修日军地下秘密工事后被杀害),风雨欲来。5月28日,南开中学学生在天津学联统一的组织下参加全市大示威游行,控诉日本侵略、走私、贩毒等罪行。在官银号广场前开群众大会,南开中学学生会主席吴祖贻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抨击国民党政府亲日媚外政策。游行后天津保安队 200 余人武装包围了南开中学,禁止人员出入,三天后始解除包围。这次示威游行很成功,群众一致提出“拥护廿九军抗日”、“拥护宋哲元抗日”等口号,对天津市人民和全国人民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次运动中,南中地下党组织成员和青年友社社员都起了骨干作用。

1937 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平津沦陷,南开校园被侵华日军空军炸毁。南开大学奉命西迁长沙,与清华、北大共组长沙临时大学,南开中学西迁重庆。广大学生开始分散,或参军抗战、或参加革命、或西去复课、或观望彷徨。“八一三”上海战兴,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第一战区(上海地区)司令长官,张锋伯随赴战区司令部襄佐战务,南中 36 班学生申宪文、申振民(申健)随同服务。11 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攻袭我军侧背,致使上海前线 30 万大军仓皇后撤,造成重大损失。淞沪沦陷,日军进逼南京,12 月上旬南京失守,12 月 13 日发生南京大屠杀,举世震惊。

第一战区撤销,张锋伯回到家乡陕西,1938 年春初任临潼县县长。他立意把临潼建设成为一座游击县,准备在日军渡(黄)河西犯时,以游击战阻击敌军。张锋伯号召南开中学学生及青年友社同学来临潼效力,共赴国难。前来效力的南开学生有:1935 班的李璞、李廉、王大纯、徐文园、叶笃正;1936 班的申宪文、么自兴、滕国定、王树勋、郑怀之、张开运、郭文昭;1937 班的涂光炽、李明、王松生、殷汝棠、许寿谔等,纷纷争往临潼,呈一时之盛。张锋伯充分发挥同学们的抗日热情和工作能力,在临潼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反霸

运动,动员民众,准备战争,受到临潼贫下中农的拥戴。经半年的工作,在临潼秘密组织起拥有 3000 条枪的农民武装。但好景不长,张锋伯的农村改革和秘密武装活动,受忌于在临潼的国民党驻军,1938 年 8 月驻军宋希濂部逮捕张锋伯并将其投入监狱。同学们部分分散到陕西各县市去做中学教师,大部分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转去延安,到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了革命,有的人入了党后,又被派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习和做党的工作。散留在陕西各地的同学也陆续来到昆明,入西南联大学习。所有以上这些同学都学有所成,后来为新中国的政治建设(王树勋、郑怀之、殷汝棠、王松声、许寿谔)、经济建设(徐文园)或科技建设(叶笃正、王大纯、涂光炽、李璞)做出了重大贡献。张锋伯被捕后,经营救,三个月后无罪释放,回到西安,以西安著名士绅身份为掩护,继续为党做革命工作。

大批南开中学校友为国捐躯成为光荣烈士,其中有 1936 届毕业生吴祖贻、张炳元、田文苑、岳



张伯苓

岱四位同志。1987年5月3日,1936班校友在天津南开中学校园内建立了四烈士纪念碑,碑名由革命元老薄一波同志题字。

在国民政府空军中的南开校友为国捐躯的烈士,有记录可查的共有7位:

张锡祐,南开中学1932班学生,为张伯苓校长的四公子,投考航空军校为第三期学员,抗日战争开始,于1937年8月14日准备参加上海之战前,不幸在江西上空失事殉职。

沈崇海,南开中学1931班毕业生,考入航校,为第三期学员。1937年8月19日参加上海空战,俯冲直撞敌舰,人、机、敌舰同归于尽。

刘承祐,南开中学1932班学生,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学员,1936年3月16日因飞行事故殉职。

柳东辉,南开中学1935班同学,考入中央航校为第六期学员,1942年3月17日在四川涪陵上空因飞机故障,失事殉职。

刘维权,南开中学1935班同学,为航空学校第六期学员,1937年8月14日我机5架在浙江曹娥上空与日机20架空战,击落敌机四架,刘维权坐机被击伤,身负重伤,迫降海宁,经医治无效,光荣殉职。

陆家琪,南开中学1935班同学,中央空军学校第六期学员,1944年10月4日驾机飞临日占区,为地面炮火击中光荣殉职。

陈康,天津南开中学1937班转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九期学习,任上校大队长,战功彪炳,荣获多种嘉奖。1944年10月1日对日作战时不幸阵亡,追赠空军少将。

三 培养高层次人才立足于国内

南开中学在一百年期间,师生成长为各类科技院士(包括少数外国院士)者多达60余人,占全国中等学校的榜首。

在1904~1934期间,南开中学毕业生后来成长为院士的有:

旧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

梅贻琦 陶孟和 吴大猷 钱思亮 殷宏章

新中国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江泽涵 张文佑 殷宏章 罗沛霖 吴阶平

陈新民 黄家驷 李文采 罗常培 范文澜
何其芳 何炳棣

1934年,南开中学建校30周年,欣逢张伯苓校长60岁寿诞,校友们为两庆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捐资建设了范孙楼(包括校友楼)和奖学金基金。这次庆祝的实际意义远非寻常:南开中学三十而立,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优秀办学方针和传统,从此给南开教育开辟了优秀人才辈出的时代。

到了1935年毕业班、1936年毕业班和1937年毕业班,南开中学的人才工程发生了重大转机,从此开始了一个连续多年毕业生中成批量地成长出未来的院士的历史时期。

1935、1936、1937三个毕业班都是人才大班。以1935班为例,毕业生151人,后来成长出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美国工程院院士、二十多位大学教授、四十多位高科技人员以及著名的中国现代诗人和文学家、许多抗日英雄、新中国国家干部等等。36班和37班人才茂盛情况大体与此类似。

1937年秋,天津市南开校园被侵华日军所毁,举校南迁,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到昆明联合组成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开中学主任喻传鉴率领办学骨干管理班子和精英教师队伍入川,并入张伯苓校长于1936年提前建设的重庆南渝中学,组成战时办学体系。1938年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继承了南开优良的教育传统。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女子中学(后为第二南开中学)在天津复校,重庆南开中学在渝续办,与抗日战争期间按南开体系承办的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为南开体系四所姊妹学校,教育风范辉映于祖国南北。这四所中学都成为新中国的国家或省市重点学校。

南开中学的津校和渝校在建国后,虽然都经过体制改编的周折,津校并且是从废墟上重建,经历多重困难,但经形势的转变和教职工的共同努力,南开的教育传统终于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南开校友数尽风流,许多校友院士执掌着我国科技事业牛耳,例如周光召曾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朱亚光曾是中国工程院院长(下转64页)

蒋介石对军事失败的检讨

● 张开森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逃离成都,乘飞机直抵台湾。

在孤岛上重新营造窝巢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开始检讨起自己在大陆的失败特别是军事失败的原因。

对军事战略的检讨

首先,蒋介石认识到自己在发动内战之初所实行的“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他说:“我们在进攻中虽然占领了许多城市,却要处处设防,尤其是交通要点和后方基地更须置重兵据守,每处至少布置了一团以上兵力,我们的兵力就这样被四处分散,并且都成了不能机动使用的‘呆兵’。而共军则能随时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们正面积活动,伺机突袭,将我各个击破。”在此之前,蒋介石还曾说过:“国军处处设防,备多力分,形成处处薄弱之虞。共匪乘此弱点,乃以‘大吃小’之战法,集中其全力攻击我薄弱之一点,于是屡被其各个击破,此所以逐渐造成今日严重之局势。”

但是,蒋介石的“反省忏悔”,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尽管承认自己犯了战略错误,蒋介石却将导致自己战略失误的原因归咎于马歇尔的调处。他说:战争爆发之初,“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

蒋介石在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

中称:“从军事方面检讨,首先要知道打仗是求胜利的,而俄帝的诈术,乃使他的敌人不能打仗,却又使他不能求得胜利。”抗战胜利后,“我们克敌军事是无往不利的,国军处于这样优势,本可一鼓作气,勇往直前,而军事调解处的3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挠,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使之功亏一篑。而敌人受了致命打击之后,不仅还有喘息的机会,反而使之能从容整补,养成其坐大反噬,卒使我们遭到这样最后的崩溃。”所以“我们军事失败,可以说仍然是失败在外交上的”。

对军事制度的检讨

军队内部的腐败,是国民党在大陆战败另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对此感受得非常深切:“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他认识到这跟各项军事制度——诸如教育、人事、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建立有着重要关系。

蒋介石指出:“我们军队里面,功过不分,是非不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军队里面没有监察制度。”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实行党代表制与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因为所有部队长官都受过党的训练,又因为军队职权宜求统一,故采取一元制度,即以各部队长为建军的骨干。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以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整个部队即失其重心”,如此,“我们军队怎么能不失败,不崩溃呢?”

蒋介石痛陈：“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学识”，是我们军事最近4年来失败的最大原因，也是我们中国最近4年来，党务、政治、军事彻底崩溃的最大原因”。蒋批评国民党军队各级军官“学得太少，又不注意补充”；“大多数出身于农村社会及资产阶级子弟，偏于保守型的多”，一向安于“养尊处优的环境”。蒋总结说：“大家虽然生在现在科学时代，而大家的精神、学术、生活、行动，都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对于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蒋介石分析说：“我们一般军官和美国人相处，受了美国人的教育，对于美国军人的长处一点没学到，则专门模仿美国人的生活及缺点，诸如“滥肆吸烟、酗酒、打牌、嫖妓”，殊不知这只是美国军人生活的一面”，而对于工作业务之活泼认真，乃是对国效忠精义之所在”。真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

针对国民党军队存在的上述弊端，蒋介石发誓“要彻底改革过来”。他认为“振作军队的精神，转移部队的风气，根本着手之点，还是要着重于建立制度”，特别要“确立一种健全的监察制度”。“要确立军队的监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现在的政工制度”。因政工人员多为主管推荐，“今后军队的政工人员应由党部连选，透过政府予以委任，决不能听由部队主管擅自任用，并且对部队负起监督的责任，来挽救今天一般军官腐败贪婪，无法无天，自由行动的流弊。”

对军队纪纲的检讨

蒋介石认为，军队纪纲的败坏导致国民党军队丧失了战斗力。1950年3月19日，蒋介石在题为《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之说明》的讲演中检讨道：“就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看来，以军队纪纲的败坏是最为严重”。“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一般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的手续，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职守，自由行动……即此一点，就足以知道我们军队的纪律扫地。”蒋介石还沉痛地说：“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但在北伐后，“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如再不彻底觉悟，那这种军队非自取灭亡不可”。

在《军队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演说中，蒋介石还一口气列举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八大缺点：1、“本位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平时相处则互相摩擦，互相攻讦，在战场上则不能协同一致，互相合作。”2、“包办主义”。“一切事情，不论自己是否可以胜任，先就包揽下来，不许大家过问，其结果使得彼此争权夺利，而业务则废弛拖沓。”3、“消极被动，推诿责任”。4、“在办事的时候，不能分别轻重缓急，不经过研究考虑，大而无当，粗制滥造。”5、“含糊笼统，不求正确。”6、“因循守旧，得过且过。”7、“迟疑犹豫，徘徊却顾。”8、“主观自大，固步自封。”

蒋介石指出：“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间，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他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任呢？而且，一般的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何尝还有一点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

在军民关系方面，蒋介石承认“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他指出：“我们军队每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为了重整军队的纪纲，蒋介石提出必须要“官兵一体”、“生活一致”。蒋要求各级首脑与士兵同甘共苦。在军民关系方面，蒋还提出了“军民合一”的口号。

经过上述检讨反省，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他的军队已成了“六无”之军，即“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军人们也已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蒋介石最终得出结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责任编辑 吴思）

文革中人民日报社的几次突发事件

● 季音

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已经结束近30年。“往事依稀浑似梦”，那些疯狂的日日夜夜，仿佛已是很遥远的事。但我这个亲历了这场浩劫的过来人，却不能把它忘却，当我提笔写这篇回忆文字的时候，往事不觉又一幕幕活生生地再现在我眼前。

这里，我写的是自己亲历的几个片断。

—

“文革”的正式发难应当从何时算起？这有多种说法。有的说应当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算起。有的说应当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5·16通知》之日算起。但我的亲身感受是，文革风暴，是从《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天起，才铺天盖地刮起来的。那是1966年6月1日。

作为中国第一大报的《人民日报》，在社论发表前夕，已经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连我们这些一般工作人员，也都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5月31日下午，一大溜小汽车驶进报社大门，来者全穿着军装，还带来了10多个解放军战士。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瞧着这群神秘的来客，预感到灾难即将降临。

果然，过了不多会儿，广播喇叭响了：“全社人员立即到五楼会议室参加大会。任何人不得请假。”我匆匆赶到五楼，会议室里已坐满了人，主席台上几乎全是穿军装的人，坐在中心的是个其貌不扬的小矮个子，人们一眼就认出，他是当时正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操着一口难懂的福建话宣布：“党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负责领导报社的全部工作。”他眨着小眼睛，神秘地向会场扫了一眼：“我在你们报社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

我头脑嗡地一下，简直被打蒙了。政变？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机关报里搞政变？这是怎么回事？莫非真要改朝换代了吗？

全场鸦雀无声，连一点轻微的咳嗽声都没有，压抑的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

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在一版以通栏大标题和从未用过的大五号字刊出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由陈伯达口授的杀气腾腾的社论，实质上宣告全国“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报社很快就乱开来了。不少革命热情高涨的人响应伟大领袖“造反有理”的号召，纷纷揭竿而起，成立这样那样的“战斗队”，最大的造反组织叫“遵义红旗”。顾名思义，是代表正确路线的，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久，就由他们牵头召开了名曰批斗走资派的斗争大会，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文革”中报社

的第一次大型批斗会,也是一次大打出手的武斗会。

那天,编辑部大楼里突然人声喧哗,口号声与“当当”的敲打搪瓷脸盆声此起彼落,一队队造反派战士押着一个个“牛鬼蛇神”从楼道上走过来,向五楼会议室走去。队伍里有个报社的副总编辑,手拎一个破脸盆,一边敲,一边大声喊:“我是走资派!我是走资派!”这显然是押着他的造反派逼着他如此表演的。

我只在门缝里张望了一下,就赶紧退回到办公桌边,我知道在这种场合躲得越远越好。

离我办公室不远是文艺部,已经决定调出的原文艺部主任陈笑雨听到楼道上的喧哗声,就走出办公室探看究竟。

“走!你也不是个好东西!”几个造反派一拥而上,抓住正在门口探望的陈笑雨,把他推进了正在游楼的“牛鬼蛇神”行列,一起押到五楼会议室。

这次批斗会是一次十分残酷的打人会,造反勇士们对被斗对象一个个拳打脚踢,毫不留情。平时身体很棒的国际部“摘帽右派”胡骑,被一个耳光打倒在地,从此他的这只耳朵被打聋了。陈笑雨这个平时斯斯文文的知识分子,也被打得很凶,满脸血痕,再也站立不住。

就在当天傍晚,饱受凌辱的陈笑雨投河自尽。这是“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社第一个自杀者。我与陈笑雨战争年代曾经在苏北淮阴的《新华

日报》(华中版)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待人热情、很有才华的同志,不幸成了“文革”的殉葬者之一。

批斗会上凶残的打人场面,使报社广大有良心的人深深受到震撼,一致谴责这种暴行。

可是那年头,把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是伟大领袖的教导,敢于打人正是造反精神强的表现。打人事件依然不断出现。被押在报社印刷厂车间劳动的报社总编辑吴冷西,一天发现自己放在桌上的手表被人偷走了,他开始时不敢吭声,后来只是对边上的人低声问了几句,一个造反派闻声过来,迎头给了吴冷西一个耳光,打得吴踉跄几步,几乎跌倒。

从那以后,大小批斗会没完没了地召开着。报社里一个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为了表现自己“最革命”,他们不满足于只在社内批斗走资派,又想出了一个新招,决定把批斗对象扩大到社外。一天,报社的广播喇叭发出通知,要全社人员立即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批斗会。我走进五楼会场,才知道今天是批斗彭德怀和胡乔木,不觉吃了一惊。会场上有许多人的脸上都露出惊愕和不安。两个被斗者是被先后押上台的。彭德怀身材魁梧,依然不失军人风度,只是多年来的无情折磨,使他显得苍老而憔悴。

批斗纯粹是老一套,造反派勇士大声吼道:“彭德怀,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必须老实交待!”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

“我从来不反对毛主席！”彭老总的声音洪亮，沉着，与其说是回答，不如说是对造反小丑的呵斥。

乏味的批斗就在这一问一答中进行。我相信会场上大多数人的心都向着彭老总。

接着批斗胡乔木。他本来个子不高，是个文弱书生，在造反派的推推搡搡下，几乎栽倒在台上。胡乔木是长期领导《人民日报》，深受全社员工爱戴的领导人，今天竟然被押到报社来，当众凌辱他，这使许多同志都心如刀绞。从胡乔木被押上台，我不忍看那场面，就低下头去，直到会议基本结束。

造反派想从批斗彭德怀、胡乔木中捞一根稻草，结果只是使他们在社内更加声名狼藉。

此时，报社内部两个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打开激烈的派仗，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所有楼道。我什么战斗队都不参加，当起了逍遥派，每天以读大字报混日子。

二

乱哄哄的日子过得快。到1968年，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据说是革命队伍内部混进了各类坏人，必须一个不漏地揪出来，真正来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人民日报社搞了一场小小“政变”的陈伯达，决定亲临阶级斗争第一线。他选定新成立的文革部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试点。

一天下午，我所在的文革部领导小组通知，今天下班后全部工作人员不准回家，晚上有重要活动。

大约到了八九点钟，领导小组负责人陪着陈伯达和姚文元走进文革部办公室。我们立即列队站立，等候这两位“文革”大红人的训话。

他们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开始对文革部人员进行审问式的对话。姚文元拿着一厚本文革部工作人员花名册，站在陈伯达身边，为他一个个点名，陈伯达就循着次序，挨个儿地向队列里的人询问，盘查他们的家庭成分，本人政治面貌，何时参加革命，过去犯过什么错误等，询问得异常详细。还不时提出些怪问题，要对方当场回答，谁回答得稍有迟缓，他更紧追不舍，接连发问，仿

佛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一个潜藏的反革命分子。

这情景，不免使大家感到紧张不安，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盘问在一个又一个地进行，果然意想不到的怪事接连发生。当轮到文革部编辑白夜时，陈伯达灵机一动，发问：“你为什么叫白夜这个怪名字？”

白夜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陈伯达翻了翻花名册，发出一声阴笑：“原来是地主家庭出身，怪不得叫这个怪名字，还不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剥削贫下中农！”

盘问轮到另一个编辑赵近宇。这位年龄较大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前曾在《益世报》等旧报纸工作过。陈伯达问到这里顿时来了精神。

“你在反动的《益世报》工作过吗？”

“是的。”赵近宇有点紧张。

“你家里是不是藏着电台？”

一向胆小的赵近宇一听，吓得面色发白，连忙解释：“没有这事，没有这事。”

陈伯达叮嘱站在边上的造反派头头，要他们认真查一查这件事。

当盘问到另一个女同志时，形势就更紧张了。这位女同志的父亲在敌伪时期曾经当过伪警察局长，她早就与反动父亲划清了界限，并如实地向组织上作了交待。这时，陈伯达与姚文元低声交谈了几句，转身严厉地问：

“你父亲当过警察局长？”

“是的。”

“哎哟，那可是个大官呀！”陈伯达装出一副鬼脸，忽然蹦出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他可不要把我抓起来哟！”

陈伯达的怪论一出，我们禁不住都笑了起来。姚文元在旁顿时沉下了脸大声训斥：“这是严肃的无产阶级政治，有什么好笑的！”

陈伯达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他的查问只进行了一半多一些，大概是认为自己已经做了示范，就宣布暂时停止，随即离开了文革部办公室。我不觉松了一口气。

不久，“清理阶级队伍”在全报社展开了。采取的是“自报公议，人人过关”的形式，每个人在会上详尽交待自己的历史，听候公众评审。这就又一次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凡是有这样那样历史

问题,或者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个个被拉出来,坐到被告席上,听候群众审查。

本来已经紊乱不堪的报社内部,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

三

清理阶级队伍真是“战果辉煌”,一个个新的阶级敌人被揪了出来,大部分押送进了不久前设立在图书馆地下室的“牛棚”。造反派选定了这个密不透风的地下室作为“牛棚”,是很高明的,这里只有一条楼道通到地面,要想从这里逃出去可不容易。被关进“牛棚”的所谓牛鬼蛇神,完全失去了自由,他们只能是早请示,晚汇报,像宗教信仰徒那样背诵“最高指示”,余下就是交待自己的罪行。但就这样看守严密的囚室,还是有人逃了出来,走上了自杀之路。她,就是群工部的一个普通干部赵湖。

人,在被逼得走投无路,处于绝望的时候,他们往往选择了最后的一个解脱办法,这就是自杀。

随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日趋激烈,自杀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

陈笑雨是报社第一个自杀的(邓拓已调出报社,不算在内)。第二个自杀的就是赵湖这个不幸的妈妈。赵湖在敌伪统治时期曾经有过一段一般历史问题,过去早已查得一清二楚。这次造反派却翻出旧账,狠狠批斗她,要她老实交待。赵湖为人老实巴交,不善言辞,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提出一个又一个不近情理的难题,要她回答,可怜她说的是一口浓重的山西土话,怎么说人们也听不懂,于是会场上一片“赵湖必须低头认罪”的斥责声,夹杂着阵阵嘲笑声,急得在台上的赵湖不知如何是好。我坐在会场上,心想,这哪里是什么批斗会,分明是残酷而下贱的对不幸者的戏弄。不久,赵湖被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

一天早晨,我正在二楼办公室打扫卫生,忽听外边走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朝外一看,原来是赵湖正气喘吁吁地奔过来,显然是从“牛棚”逃出来的。

“赵湖怎么跑出来啦!她要干什么?”我惊异地想。走到门外,赵湖已经飞跑上了三楼,不一会

儿。传来一声沉闷的震响,这个有着几个孩子的母亲,跳楼自杀了。

报社第三个自杀者是和我在同一办公室的刘晓晞,一个在1957年的“扩大化”灾难里被错打成右派的老干部。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去延安途中,曾经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具体情节我已记不清楚了。大概他一度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后来他设法逃了出来,依然义无反顾地投奔延安。这段历史过去早已查清,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可是这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造反派不分青红皂白,硬说他是国民党派遭到延安的特务。刘晓晞为人老实厚道,完全不是那帮胡搅蛮缠的造反派的对手,凭他怎么解释,也洗不清劈头盖脸地向他泼来的污水。在小组会上,他被造反派追问得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那绝望的神情,我在旁看了不禁心酸。

一天下午,办公室的广播喇叭响了:“明天下午两点,在五楼会议室召开批斗右派分子刘晓晞大会。”

刘晓晞听了,脸上登时白得像张纸,两眼发直。我看他的脸色不对,估计他肯定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便走过去安慰他说:“老刘,你不要紧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总是可以说清楚的,你要想得开,别胡思乱想。”我和刘晓晞是同命运的人,有共同语言,平时我们两人最谈得拢。我以为我的劝说也许能起些作用。

刘晓晞听了我的话,没有吱声,仍然两眼呆滞。

当天晚上,他回到家里默默地喝了一瓶“敌敌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人民日报社在“文革”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走上了自杀之路?我查不到确切数字,有的说七八个,有的说还要多些。

人,本来是生活的主人,他们理应受到尊重,受到呵护,受到关爱。俗话说,人命关天,难道还有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么?可是,在“文革”那个彻底颠倒是非的疯狂年代,人的生命被视为草芥,死几个人如同踩死几只蚂蚁。

尽管社内不断出现死人事件,可是祸国殃民的“文革”依然在照常进行。直到1976年“四人帮”覆灭,人民日报社才迎来了新生。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大跃进时期的青年突击队

● 柴成岳

1958年大跃进初期，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发动了规模浩大的“水利化”运动。兴师动众，全县四万多名修渠大军中有近5000名各族男女青年组成的100多个青年突击队，在各主要“水利化”工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他们的劳动成果，除少部分在以后水利建设中作为现成工程基础使用外，大部分只作为大跃进的遗迹存在下来。

（一）

1958年3月间，正值互助县大部分地区开始春耕大生产的时候，中共互助县委发出“苦战四十天”，实现“水利化”的号召，提出要使全县112万亩耕地除21万亩脑山地不需要浇水外，80万亩山旱地要变成水浇地，加上原来的10万亩水地，全县16万人，每人平均水地由原来的6分4厘增加到5亩6分4厘。从根本上改变互助县的干旱面貌”。同时发出“苦干硬干30天，九峡河水搬上山，倒引五峰泉水上西山，全县水利化，幸福万万年”的战斗口号。还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警诫口号：“无暮气，水源广；有朝气，渠就成。”县上成立了“水利化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县委书记亲任总指挥。各大干渠建立了指挥所，分别由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和省里下来的处长等（都担任副总指挥）分兵把守。

于是紧急在全县春耕第一线调出占总劳动力40%的四万多男女劳动力，按军事化的组织和行动要求，由各乡镇和农业社干部带队，三两天时间匆忙到指定地点安营扎寨，迅速在全互助土族自治县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水利化”运动。

互助土族自治县按自然条件分称三类地区：一是北部大石山麓一带，高寒潮湿、无霜期短，俗称脑山地区。现在又有个新叫法称九峡地区；二是县城南部有水浇地的四条小川道，俗称川水地区；三便是互助县的主体部

分，典型的黄土高原，俗称浅山。这里山体破碎、沟壑纵横，常年干旱。“40天实现水利化”、“80万亩山旱地变成水浇地”，指的主要就是这一地区。

在这水源多在石山峡、渠道多数分布在黄土山的地方兴修水利，艰苦程度相当大。先就十多条干渠来说，从石山峡起步，一路都有工程很艰巨的地段。有的要经过石山砂坡，有的要挖通阴湾冻土；再说每条干渠都要跨越多少不等的山垭沟壑。全县计有较大的山垭沟壑44处之多。那时候没有钢筋水泥，不把这些山垭沟壑填起来，就无法连接土干渠，也不能够撑起木渡槽。而这些山垭沟壑的挖填，土、石方量都很大。可当时挖砂填土和装运土石的工具，只有当地农业生产中使用的铍、镐和枝条编的背篓。夯土压坝只有农民打土墙用的石蛋础子。

在工程如此艰巨、工具如此古旧的情况下，全县四万多男女劳动力在30多天时间里，花费127万多个艰苦劳动日，在海拔2540公尺至2940公尺高的16条大山上修成7条大干渠、9条小干渠、90多条分支渠，填平44个山垭与沟壑，架起全长6600米的木渡槽和倒洪管。

就这样，虽说那个“水利化”没有“化”出一亩水浇地，可是全长有2720余公里的盘山渠一时出现在土族之乡的山山岭岭，呈现在当时世人面前。

（二）

当着全县“水利化”跃进洪流汹涌兴起，全县各级共青团组织紧跟党的跃进步伐，很快在全县参加“水利化”的23000多名男女青年中组织起有近5000名青年参加的180多个青年突击队和青年爆破组。这些突击队和爆破组，面对非常艰巨的工程，他们都勇敢地承担攻坚任务。36个日日夜夜，他们在各干渠工地都表现勇敢顽强。

南门峡干渠石方段是该干渠的关键工程。其中有30余公尺长的一段渠线全是石头坡。还有一节石方段所在的地名叫“贼路沟”，当地人说这地方能“滑倒雀儿、摔死蛇”，可见其有多么的陡峭。像这样的工程任务，就是干渠指挥所交给双树等乡500名青年组成的10个青年突击队限期完成的。

红崖子沟东旱滩干渠需要凿通一孔长48.7公尺、高4公尺、宽4.5公尺的涵洞。这项工程先由小寨农业社第七生产队承揽。开工六天后，当从两头洞口往深处打时，越往里加着石砂的土越硬。干渠指挥所发现打这个洞难度大、费工多，要不及时调换人马，会影响全干渠的完工进程，于是将这个洞的挖凿任务转交给青年突击队。10名突击队员接手后，克服洞内石坚土硬、空气稀薄、油灯不亮等困难，顽强苦干16个昼夜，终于把洞开通。巴洪乡一个有18名土族和汉族青年组成的突击队，从“水利化”开始一直在石山砂坡执行攻坚任务。他们曾置生死于度外，系身于数十公尺高的悬崖上破劈坚石，六天时间打通了这条干渠上一段艰险地段。该干渠负责人誉称巴洪青年突击队是本干渠的开路先锋。

中国农民能吃苦，古今中外人共识。1958年互助县的水利化”给全县农民增添了许多苦。广大青年在“水利化”上更是集中地经受了“几十天”“苦”的磨练。不产棉花的青海农民就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穿一件棉布衣服都是不容易的。当时的“水利化”工地上赤脚裸背进行劳动的人随处可见。那时候人们宁愿使自己的皮肉受点苦，也不肯拿能穿的衣服衬背篓。一次在席茨沟填坝工地上有记者前来采访《青海日报》总编乔迁在注意查看青年突击队劳动情况时，发现有个突击队员肩头被运土的背篓压伤。乔迁于是把那个突击队全体队员叫到一起逐一查看，结果全队30名队员尽管都用破旧衣服衬护着自己的皮肤，可他们中多一半人的脊背或肩头不是被压肿，就是被磨伤。

五峰干渠龙口门段尽是砗板石，平峰等农业社三个青年突击队120名小伙子从“水利化”开始一直在那里开挖。他们以自己骨肉之躯和无情的砗板石作对的30天时间里，不但每天都是汗垢满面，而且部分人因被石块砸伤，流过血。

那时候的水利工地填坝运土都用条编背篓靠脊背。西干渠填坝工地上参加运土的纳家农业社青年突击队队长、共青团员沈占全嫌人背效率低，回家做出个单轮小推车，到工地把装土的背篓架在上面推着跑，结果运土效率比背背篓运土高一两倍不说，人还轻松多了。

于是纳家这个青年突击队带动全工地运土全用单轴小车上背篓推，加快了整个运土填坝进度。县水利化指挥部知道后，同团县委联合在这个工地召开现场会，向全县推广了沈占全等青年积极改革工具、加快填坝进度的经验，从而对全县“水利化”工程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时间已过去40多年，至今令人不能忘记的是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我们那时的青年总不忘谨守先公后私、孝敬老人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仓家沟青年突击队队长、团支部书记刘凤琴，是父母的独生女儿，她在五峰干渠工地和别的突击队长一样，接受任务从不选轻避重。凡交给他们突击队的攻坚任务都能如期完成。可有时晚上召集突击队长开会，在工地上找不到她。不久人们发现：每天收工后就是天晚，甚至雨夜，刘凤琴和土族姑娘王万芬相伴回家，早晨天刚亮大家上工前她俩已在工地上。后来才知道：原来刘凤琴父母年老，母亲患病。她从担任青年突击队队长后，整天带领队员突击干活，照顾父母的事自己悄悄装在心里，只能天晚，收了工才有王万芬主动给她做伴，翻山越沟夜行五六华里路回家照顾老人并抓一下家务活。还有个藏族女青年叫高占秀，是白多崑青年突击队队员。她也因为公婆年老、丈夫在外、且有吃奶小孩在家，白天不迟到早退到工地劳动，晚上不顾山高路远，回家照顾公婆和小孩。30多天“水利化”运动中，一直未误一天工，也未欠一次照顾老人和孩子的爱心。

(三)

笔者当时是青年团的一名基层干部，在互助县的“水利化”运动中一直为青年突击队摇旗呐喊。那时候作为新中国青年，自己思想单纯，一心向上，整天思考的主要是如何带领广大青年发挥好党的助手作用。后来互助县那个“水利化”运动搞罢，那个“水利化总指挥部”完成历史使命，眼看在全县刚修成的所有干渠都无水流的情况下，一个“放水典礼”便宣告“水利化”成功，那么大的谎言有人竟敢如此郑重地讲，我的思想这才出了问题，并且牛犊不怕虎似的亮出思想问题。这就在1959年不可避免地成为反右倾运动的批判对象。从此，我再没有和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群体在一起劳动、唱歌、说笑和编咏歌谣。和他们在一起时的兄弟情谊以及热烈情景，有时还在脑子里出现，一出现，我便沉浸在沉思之中。

(责任编辑 吴思)

《开国大典》采写回顾

● 李 普

《开国大典》那条新闻是我采写的。新闻界有朋友要我讲讲这条新闻采写的过程。建国50周年的时候媒体有人访问过我，问到那时候我紧张不紧张，我就从这儿讲起吧。主要讲过去没想到的，现在认识有所提高。

当然紧张，紧张到前一晚怕睡不好觉，怕第二天没精神，所以第一次吃了安眠药。现在是每晚必吃，起码三四十年了。那是第一次，果然睡好了，第二天精神很好。

除了紧张的一面，过去没想到同时还有骄傲的一面，觉得这次采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见的大场面多了。比如我采访过抗战时期蒋介石检阅青年军，我离蒋介石站的地方只有几公尺。那天我没碰见别的记者，大概那些同行早知道那件事没有报道的价值。不过，我们党对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很注意，我是应当去看看的。哪怕没有什么可写，可以说是忠于职守吧。

这里说到我对采访开国大典有骄傲的一面，主要表现是我因此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一个老记者不应当发生这样的失误。怕睡不好觉固然也可以算是一种准备，更重要的是还应当尽一切努力设想和准备可能发生的一切，这才是实质性的准备，很要紧。后来我才知道，大典之前，对大检阅和大游行至少预演了一次，也可能是两次，现在记不清了。我却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层，完全没往这方面想。如果我去看了预演，采访和写作当然会有所不同，起码会轻松得多。

现在回想，何以我没有想到有预演的可能，并且根本没有往那方面想呢？这个问题不简单，这是由于那时候我还完全没有进入“角色”。这

意思是说，到了解放区，特别是到了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我这个记者属于领导党的一方，这同在国民党统治区采访大不相同。开国大典之前预演一番，只有共产党才做得到，而且我们党历来重视大检阅大游行这类的事，岂有不预演之理。我偏偏没往这方面想，还是习惯那老一套，像在重庆当《新华日报》记者那样，临时采访、临时写稿子，岂不是完全没有进入角色？

有没有这种政治敏感，这是对一个记者最重要的检验。老记者应当知道，不仅我们党特别重视大检阅大游行，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党都如此，因为这是培养领袖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培养个人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领袖高高在上，万千群众远远在下面仰望着高呼万岁，领袖也就越发显得伟大威风而且带着几分神秘感、越发叫人觉得高深莫测、与常人不同。同时，平常比较冷静的人，在群情激动之下也会热血沸腾。季羨林教授在他的《牛棚杂忆》一书中描写了这种情景，他说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又曾多年在德国吃洋面包，“毛主席万岁”他本来是喊不出口的，在国庆大典的游行中他也被弄得如痴如醉而高喊起来，从此就习以为常了。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没这么做，是个大进步。希望今后再也不要出现这一套。

此后两年我还在新华社。每年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都要举行大检阅、大游行，都是我的事。每次大同小异，用不着看预演，而且每次预先写好稿子，第二天到现场采访，不过是核对一下罢了。

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开头我是站在

毛泽东后排听他宣读“公告”，听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然后向他索了那份“公告”。公告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字，那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临时加上去的。毛泽东指着那张字条叮嘱我：照此发表，注意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然后我就在城楼上四处走，注意现场情况的发展，寻找现场感觉，同时为当天那条新闻打腹稿。

80岁以后我越发明白了，严格说来我算不得个好记者。讲写作，可以说还够格；但是那次采访很差劲。这一点也是过去没想到的。那次采访我注意了用眼睛看，搜索现场感，这是对的，我早已习惯这样做。但是我既没有想到看预演，在现场更没有开口提问，这就太差劲了。城楼上的开国元勋，有些我认识，有的很熟悉。在重庆，外宾来访，人家刚到，就有记者问人家有什么感想，这很可笑。可是这时对那些开国元勋，哪怕是这样很幼稚的提问，人家也是有得说的，至少我还可以同他们谈谈天。我没有开口，只是走来走去。大摄影记者侯波为我拍了好几个不同位置的镜头，那时候我还不认得她。当然，我忙于用眼睛看，专注于现场的情景，同时全力打腹稿，也是个原因。

由于采访差劲，写稿的时候就出现了困难，这是一定的，不可避免的。具体情形记不清了。只记得胡乔木审稿的时候一再叹气，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他修改以后还不放心，要我再送给彭真看看。这时候木已成舟，彭真也没有办法。大概他也增删了几个字，只好通过。附带说一句，这种审稿，他们都是同我商量着一起改的。

去年在电话上同好友苏仲湘谈天，他说他的一位朋友，一位语法和修辞专家，对我那篇《开国大典》有所批评。我认为那位朋友说得很很有道理。但是记不确切，昨天再问仲湘，他便把那位朋友的书给了我。作者黄鸿森，书名《报刊纠错例说》，是仲湘写的序。这本书的每一篇，都从实例出发展开议论，涉及许多学科的学问，足见作者功力深厚，绝非单纯咬文嚼字者可比。作者很谦虚。书中《文章评改篇》这一部分中有一篇《白圭之玷——重读〈开国大典〉》，写得很客气，文中说了许多赞美的话。说那时他正在华东新闻学院学习，这条新闻把开启一个时

代的庄严盛大的庆典，用生动的新闻笔法，浓缩在800字之中描绘出来，写得层次井然，气氛热烈，受到我们这些学新闻的同学们的普遍赞扬。”他还注意到当晚游行队伍全部走出会场已经九点多钟，这条稿子第二天就要见报，还要翻译成外文对外发稿，写作时间之仓促可想而知。

他说了这么多好话，同时提了四点意见，并且说明那是他同一位当日的同窗重读这条新闻“共同作出的挑剔”。那些意见，我心悦诚服，首先在这里表示感谢。

一、毛泽东的职务。新闻开头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不对，那是后来的事。当时他的职务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二、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出现，不宜放在状语位置。新闻说：“当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似可改为：“毛泽东主席登上主席台，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如果能写上他登上主席台的时间，更好。

三、“各委员”的“各”，省去为好。

四、两个词语商榷。新闻说“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这句话有两个问题：一是，动词宾语搭配不很妥贴。“开动”一般用于需要较强功率驱动的对象，至于“电钮”；“按下”就可以了。二是，按下电钮，国旗升起，没有必要加个“使”字。“使”既然可有可无，多一字不如少一字。

所有上述这些，我想现在大概也还是有点儿用处的吧。政治敏感第一，思想要宽广，眼界要开阔，否则还在说糊涂话，茫然不知自己已经被远远地抛在时代后面。新闻界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可见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是其中学问很大，很不容易做到。同时，新闻必然准确、必须完全符合事实，不可弄错，当然更不许想像，不许虚构。新闻写作要力求简洁，这也是为读者着想，珍惜人家的时间。其实也是为自己着想，文章长了没人看。所以写新闻要有寸土必争的劲头，要惜墨如金。

（2004年7月21日定稿）

抗战前期的外交战场

——《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随想

● 陈 敏

抗战有两个意义上的抗战，一个是金戈铁马的疆场格斗，一个是使节穿梭的外交搏杀。如果说前一个抗战发端于七七事变，那么后一个抗战则要早得多，至少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已逐次展开。而在后一个抗战逐次展开的最初阶段，最重要的战场竟然不是中美日三角外交，也不是中苏日三角外交，而是中德日外交。这鲜为人知的一幕，今天终于被留德外交官陈仁霞博士的处女作完全揭开。

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并不古板，其波澜壮阔，其跌宕起伏，其险状丛生，扣人心弦。国民政府面临日军铁蹄的节节进逼，忍辱含垢，但刚强不屈，在极端自私而冷漠的国际关系中苦苦挣扎，为中华民族博取生存空间。

一部抗战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求生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自救史。这是我从陈著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国际关系最大的特征是弱肉强食，根本就没有任何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交换。正因为如此，虽然就道义角度而言，中国是受侵略的一方，理应受到广泛的国际援助。但相对来说对中国还算比较友善的美国，也认为中国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现代化是不大可能的，由日本人统治中国对美国最有利——同时也对中国有利。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就断言，中日争端的解决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有害，最好让日本在一个美国没有重大利益的地区，陷入一场非决定性的斗争；允许“我们远东政策的原则及和平理想”蒙受进一步小损害”。于是，美国以“借刀杀人”为其远东政策的指导思想，一方面怂恿日本与苏联和中国为敌，镇压远东的大、小布尔什维克，一方面避免日美冲突。这就注定了美国对日本侵华仅停留于

空洞的道义谴责，而不可能实际干预。对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求援，美国置若罔闻。甚至当1937年12月12日，侵华日军制造一起极端挑衅性的事件：“故意在南京江面击沉美国‘帕内号’”，导致美方七十多人死亡，美国仍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平静处之，一如既往地对本提供贷款和出售战略物资。

美国如是，苏联更无道义可言。苏联最大的噩梦，是遭受德日两国夹击。那么如何化解来自东方即来自日本的压力呢？苏联的主要对策，便是挑动中日冲突，并使中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挽救苏联。炸死张作霖的柳条沟事件现在被证实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从这个逻辑来看是完全合理的。中日战争之全面爆发，在苏联当然是如愿以偿。为了让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援助，但这种援助是有限度的，那就是这种援助必须以不得罪日本为前提，必须以不把苏联卷入中日战争为前提。所以，无论国民政府如何再三恳求，苏联坚决拒绝对日出兵。在有限度地援助中国的同时，苏联暗中与日本一直勾勾搭搭，直至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共四个条款，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显然是对日本侵华的默许和纵容。苏日《共同宣言》更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以中国的神圣领土为相互馈赠的供品，苏联实现了确保东线安全的初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

衷，并从此断绝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这对正处于抗战以来最艰苦岁月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令人寒心的叛卖之举。

美苏如此，其他重要国家也不仗义。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之劫，国际社会却保持着可耻的沉默。中国不得不在恐怖的孤独中迎战强敌，外交上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一个危局接着一个危局，欺骗连着欺骗，叛卖连着叛卖。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抗日战争，再败再战，百折不回，艰苦卓绝，最终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标，日本这头卤莽的野牛最终如中国期望的那样撞上了美国的脑门，迫使美国拔剑自卫，日本从此陷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中国终于告别孤军奋战，最终以弱克强，与盟国携手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

一个国家应该始终将实际的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的大词之上，应该始终由务实的专业的政治家而不是由意识形态化的专家来治理，外交上尤其如此。这是我从陈著得出的第二个结论。

在抗战前夜和抗战的最初阶段，德国在中日冲突中竭力保持中立，这一点是从前甚少披露的。德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注定了德国根本不可能站到受害的正义的中国一方，而是要最终与同样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日本携手挑战文明世界，最终与中国为敌。但发展到这一步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德国并不是自始至终都与日本沆瀣一气，在中日冲突的早期，德国还保

持着相对清醒的头脑。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认识到，中国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尽管还不是很强大，但不容忽视。德国需要同中国保持密切联系，使之既可以从中国获得德国从任何别的渠道所无法获得的扩充军备所必需的战略物资，而且可以向中国扩大商品输出以带动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政治上为丛驱雀，即避免把中国逼上绝路而迫使中国与苏联结盟，以此来最终避免中国的布尔什

维克化。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和他们主持下的德国外交部、德国国防部、德国经济部，对日本侵华政策是持异议的甚至是明确反对的。比如1937年7月28日，德国外交部就在给其驻日大使狄克逊的训令中明确指出：“日本欲以中国为基地对抗共产主义以履行防共协定，此举令人无法理解。须知，在第三国领土上对抗共产主义并非防共协定之目标。我们认为，日本的做法实已违反防共协定，因为日本阻碍中国之团结统一，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成长与蔓延，而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德国还几次向中方声明，1936年德日签署的防共协定并没有要求德国担负在中日战争中援助日本的义务。一方面对日本侵华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和他们主持下的德国外交部、德国国防部、德国经济部，坚决抵制建立亲日远东政策的强大呼声，苦心孤诣地维持中德邦交。以至于德国亲日派外交官狄克逊不能不悲哀地承认：“德国对东亚的同情，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对中日两国厚此薄彼。”“就连在外交部，亲华派的人数也压倒了亲日派，而且随着希特勒和纳粹党与日本关系的不断推进，前者的人数越是增加。”

抗战前夜和抗战的最初阶段，“亲华派”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正是因为“亲华派”的努力，1933年，德国的考茨少校和威伯尔中尉可以在后方坐镇指挥张学良的部队与日本关东军作战。而

到1935年,德国在华军事顾问队伍已经达到70人的新高点。德国顾问团几年中为中国训练了30万中央军,成为日后抗战的重要力量。1937年“淞沪战役”日军惨遭失利,其速战速决击败中国军队、以此强迫国民政府订立城下之盟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而在此次战役中痛击日军的主力部队,就是德国顾问训练的中国精锐部队。正是因为“亲华派”的努力,1936年,德国帮助中国制定了《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该计划打算在华南和华中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建立工业基础和为抵御日寇入侵做好充分准备。为了筹措实现该计划的建设资金,中德签署秘密的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方货物信用借款1万万马克。中方将在随后5年中每年购买2000万马克金额的德国军火和机器,在10年内用各种农矿产品归还,每年为1000万马克。中国的军火供应也基本仰赖德国,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军火占中国进口军火总额的80%以上。即便在抗战最初几个月,中国对日作战的军火仍有80%来自德国,以至于日本有人将这场战争称为对德战争。德国的做法当然令日本恼火。日本最终以不惜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说服希特勒下达了停止对华军火供应、撤回在华德国顾问等禁令,但这些禁令仍一度遭到“亲华派”占上风的德国军方和外交部的强烈抵制。迫于军方和外交部的压力,德国国防部长戈林给国防部国防经济处处长托马斯上校发出指令:“仍以目前的方式继续与中国的贸易。”对于日方的抗议,德国外交部政治司长魏茨泽克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不仅日本无权控制或质问德国武器输华,就连德国政府亦无权阻止私人对华军售。”外长牛赖特也表示:“德国武器输往中国,保持适当之限量。中德经济之发展,是基于纯粹商业基础,并非经由德日谈判所能解决。”1937年德国以易货供应方式输入中国的作战物资,价值高达

8000多万马克,比1936年激增3倍多。直到1938年7月美国国务院统计七七事变以来各国输入中国军火的数量,德国仍压倒苏联居第一位,德国当时对中日战争的微妙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德国传统政治精英确实堪称精英,他们具有惊人的判断力,准确地预见未来——不仅准确地预见日本侵华必然导致的远东政治色彩的变化,而且他们一直认为日本过于高估自己的实力,中国未必在中日战争中失败而日本很难在中日战争中取胜。这些方面,他们比日本要高明多倍。相形之下,日本是一个暴发户,得志便猖狂,卤莽而短视。德国传统政治精英跟日本政客不在一个档次上。如果德国外交始终由这批政治精英主导,德国外交就会始终保持清醒,就可以一方面既把日本绑在反苏的战车上,一方面又维持中德邦交,继续从中国捞好处。这对德国的国家利益无疑是最不坏的选择。换句话说,德日同盟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领导权的问题,是德国主导德日同盟,还是日本主导德日同盟。德国的传统政治精英坚持前一者选择,可惜的是,他们的选择并没有能够成为德国政府的最终选择。希特勒和他手下的一批纳粹党棍只有意识形态上的狂热,而并不具备起码的专业能力、务实精神,他们根本无从判断德国的国家利益何在,只基于意识形态的狂热来决定德国外交的方向。1936年以前,希特勒还没有完全树立他在德国的绝对个人权威,还无法一手遮天,因此不能不对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多所包容,德国的传统政治精英因此还能在外交方面发挥重要影响。但从1936年起,希特勒在德国范围内已经是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先征服“满蒙”再征服“支那”的计划

不可战胜的力量，德国传统政治精英也就不再见于希特勒，他们的悲剧和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悲剧便正式上演了。德国传统政治精英被从他们在德国政坛的最后三个领地——外交部、国防部、经济部——逐渐排挤出去。里宾特洛甫之流的纳粹党棍最终彻底把持了德国外交的大权。里宾特洛甫之流一改德国传统政治精英的理性立场，不再对日本有警惕和防范之心，而是将德日同盟的主导权拱手相让，德国完全被日本牵着鼻子走。德国传统政治精英苦心维护的中德友谊至此毁于一旦，德国与中国完全断交，而完全投向了日本的怀抱。德国的这种愚不可及的选择最终被历史证明为政治上的自杀。党派利益至上、意识形态狂热祸国殃民，中德关系的这种变迁，便是一个生动的印证。

抗战外交艰苦备至，抗战胜利来之不易。这是我从陈著得出的第三个结论。近代以降，中国屡战屡败。鸦片战争中，英军数千人横扫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半个世纪过去，中国依旧积贫积弱，八国联军不过万把人而横扫中国如卷席直至火烧圆明园。但从八国联军到七七事变不过三十来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不过九年，中国竟可以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日本全面抗衡，并且是在内部不和、外交上孤立无援的极度危险的境况中与强敌日本抗衡。没有综合国力的根本改观，这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敢于与强敌日本交手并坚持八年之久并最终完胜，这是中国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抗战将士在金戈铁马的疆场上的浴血格斗，现在已经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说法，可以告慰抗战将士的英魂了；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对国民政府的抗战外交的研究局限仍然很大，尤其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及其成就，缺乏应有的估量。事实上，抗战中的疆场格斗和外交搏杀，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如果不是国民政府奋力突围，终于使中国挣脱孤立状态，为中国抗战迎来广泛的国际援助，为中国抗战创造了最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抗战也就很难有军事上的持久，中国抗战可能就要经历更多的曲折，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国民政府抗战外交，在中德日三角关系中表现得非常

突出。在维护民族尊严的前提下，殚精竭虑，最大限度地延长了中德邦交，最大限度地赢得了德国对中国抗战的实际援助，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德日结盟对中国抗战造成的损失。国民政府的这一页，是应该在史册中大书的，是应该受到后人尊重的。

抗战外交中的中德日三角，在抗战前夜和抗战初期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但瞩目的学者并不多，许多关键内幕因此一直无从获知。陈仁霞博士历数年之功，从已经尘封的德国外交档案中翻检出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写就《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一书，以崭新的史料、翔实的细节丰富了抗战大历史，揭开了我们原本暗昧的惊心动魄的中德日三国角力大场景，并使我们从这些惊心动魄的大场景中获取了很多新鲜的教益。在学界人心浮躁之今日，这样扎实的和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陈著当然不可能没有缺陷，如何不受传统语境的制约，而真正做到思想上的独立和客观，窃以为是陈著改进的一个切入点，也是所有历史学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 吴思)

呈决策群参阅 供管理层备读

2005年第16期

人民文摘

人民日报主管

主要栏目：

- 时政评论 财经观察 高层内幕 行业专说
- 新闻背景 纪实之窗 海外传真
- 焦点人物 传奇人生 成功者说 公仆风采
- 历史真相 内幕揭秘 知情者说
- 决策之道 案例剖析 名帅战略 谋略解读
- 名人生活 心理导航 健康概念
- 环球扫描 神州了望 前沿新知 参考信息

主流读者

- 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及机关工作人员
- 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中承担决策、管理职责的中高层人士
- 高级决策、管理者的智囊、助手、参谋等白领人士
- 从事相关教学、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士

国内统一刊号：CN11-4138/D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建国门支行
 邮发代号：2-641 户名：人民日报社计划财务部资金管理处—人民文摘杂志社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帐号：33020022817
 2005年订阅费每期8元 全年96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人民日报人民文摘杂志社
 订阅热线：010-65369535 邮编：100733

也谈胡风“清算”姚雪垠的旧案

● 姜 弘

《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有一篇《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说的是当年路翎批评姚雪垠的旧事,把一两篇批评文章说成是胡风“清算”姚雪垠的“运动”,并把这说成是几年后姚雪垠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原因。这些奇怪的说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作为和当事人直接谈论过这两件事的人,把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说清楚。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路翎为什么批评姚雪垠;二是姚雪垠为什么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前者是文艺问题,后者则与政治有关。

第一个问题是姚雪垠主动向我提起的。1982年秋天,他和我谈到出版旧作的计划,并谈到了当年在重庆挨批评的旧事,说那时胡风很左,宗派主义严重,在文坛上很有势力,他们在《希望》上发表文章,大骂《春暖花开的时候》是市侩主义、色情文学。其实,这些话他早已写进回忆录并公开发表了。接着,他向我透露回忆录里没有写的重要内容,即当年他挨批评的真正原因。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也就是这件事的内幕:当时胡风他们要批茅盾,说茅盾的创作是客观主义的,色情。周总理不同意,出面制止。他们没有办法就骂我出气,因为茅盾和我的关系很好,充分肯定我的创作。这事牵涉到茅盾和总理,我不好说,背了几十年的黑锅。你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以后写文章的时候可以把我说的一些写进去……”

从姚家出来,我就近去看望胡风,谈话间很自然地提到刚才姚雪垠所说的“秘密”“内幕”。胡风一口否定,说根本没有那回事,在文艺问题上周总理从不下命令发指示,总是以商量的口吻提建议。他曾建议胡风把“客观主义”的提法改为“旁观主义”,那是为了避免哲学上的误解,与批评茅盾的事无关;他知道胡风所说的“客观主

义”包括茅盾,却并未阻止对茅盾的批评。事实上有人指名道姓地批评茅盾,而批评者也是路翎。胡风说,那是文学思想上的原则分歧,他发表路翎的文章,是为了坚持文学上的鲁迅道路,坚持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抵制当时正在泛滥的客观主义倾向;把路翎的作品和茅盾的作品对照着研究,就会明白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客观主义。

几天以后,我到团结湖去看路翎,自然免不了要谈到姚雪垠。当时的路翎的思想还有些迟钝,记忆却并不差,他还记得当年重庆的论争,记得他写文章批评四个正走红的作家——茅盾、沙汀、姚雪垠、碧野。他的看法和胡风一样,说那是文艺观点上的分歧,他并不认识这几个人,更没有私人之间的交往,完全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批评他们所代表的那种客观主义倾向。他也承认,那时年轻(22岁)气盛,文字上或有过分尖刻之处,但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是正确的。那种客观主义倾向是抗战期间文学上的一股逆流,也就是所谓的“抗战+恋爱”——标语口号+低级趣味”,姚雪垠的几部小说都有这种倾向。

当然,把茅盾和姚雪垠的作品笼统地称为“色情文学”,是不恰当的。虽然他们在这方面也确实有可议之处。

这本来是一次正常的文艺批评,可是,到了《炎黄春秋》上,路翎的两篇批评和阿垠的一篇杂文,竟变成了胡风有意发动的“清算”、“整肃”姚雪垠的“运动”,而且导致了1949年姚雪垠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后果。

现在就来说第二个问题,即姚雪垠为什么没有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简单说来,就是上海解放前夕,姚雪垠卷进了一个中共地下市委接收上海的活动,后来这个地下市委被取缔了,盛

怒之下的陈毅要处置姚雪垠，是夏衍出面说情，才交由文艺界把他送回了河南。当时具体处理这件事的是章靳以，他在写给河南省委的信里提出了四点意见：一、姚回去不要开欢迎会，二、不要给予特殊待遇，三、不要让他到处做报告，四、让他到生活中、群众中去好好改造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和河南文艺界怎么可能推举他去出席文代会呢？进入80年代以后，姚雪垠多次提到当年在河南所受极左势力的迫害，而且不点名地提到当时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的李蕤。李蕤则不

同意把当年的一切，包括姚雪垠从上海回来所受教育，统统说成是极左。为此，二人在《新文学史料》上打起笔墨官司。《新文学史料》主编楼适夷老人，曾向我了解姚李二人交恶的情况。楼适夷当年曾与章靳以一起参与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对姚雪垠的情况十分清楚，包括他从上海被送回河南的过程。当时，楼老还要我转告姚李二人：不要扯旧账，那样对两人都不好。《史料》也不会再发这种文章。我转达了，此后他们也都没有再提这回事。（责任编辑 徐庆全）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	全套四册	67.20	8.00
之一 我的回忆	孙中山		
之二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之三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之四 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邓小平年谱	中央文献研究室	76.00	8.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5.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5.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历史转折的前奏	程中原 夏杏珍	38.00	6.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人民公社兴亡录	宋海庆	36.00	6.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5.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3.80	5.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5.00
张闻天年谱	张培森	65.00	8.00
第二次宣言	王小平	28.00	5.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5.00
文坛拨乱反正实录	徐庆全	24.00	5.00
再生中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李 艳 熊志勇	44.80	7.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 硕	36.00	6.00
断桅扬帆——蒙冤 25 年的公安局长	丁兆甲	26.0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5.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5.00
25 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5.00
白色花劫——“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	林 希	25.00	5.00
中国人物年鉴 2003	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	168.00	7.00
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	戎向东	29.80	5.00
十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论点	张国华	28.00	5.00
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生春	66.00	8.00
陋室漫笔——不该忘记的人和事	靳树鹏	21.80	5.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陈独秀风雨人生》花落水流，陈独秀离开人世已经60多年了。每到春天紫色的蚕豆花开放之际，人们自然会想起因误食此花而病发的陈独秀，想到了当年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老头子”的风雨人生。本书以30万字的篇幅，描述了这位中共领袖的曲折人生道路，并追述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大背景。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是一套视角独特的丛书。在刚过去的20世纪，那些让人记忆的历史太多太多，但本丛书让亲历者来讲述，就多了一份真实和一份况味。在这里你可以与徐铸成、于光远、蔡元培、陈独秀、朱德、杨振宁、林语堂、蒋梦麟等名家相遇，体味历史，重温记忆。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年~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是争取一个怎么样的抗战结果的争论，因而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对立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表现形态。本书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代初期，拨乱反正的决策揭开了回春的历程。被称为“政治的晴雨表”的文学艺术界，其从复苏趋向繁荣的历程，不仅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伴随，并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作者披露了意识形态领域重大事件的内幕，及新时期文坛从队伍建设到方针调整等诸方面的来龙去脉。作者致力于收藏未曾刊布的文坛名家书札和档案材料，及对诸多文坛老前辈的采访，因而使本书材料鲜为人知、丰富可信。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读 郭述申同志 遗嘱

● 吴培根

郭述申同志度过了 70 多年的革命生涯,在进入 90 高龄后与世长辞了。他在 83 岁生日向亲属宣布的《我的遗嘱》,以安详的心态和平实的语言显示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坦荡的胸怀,读来感人至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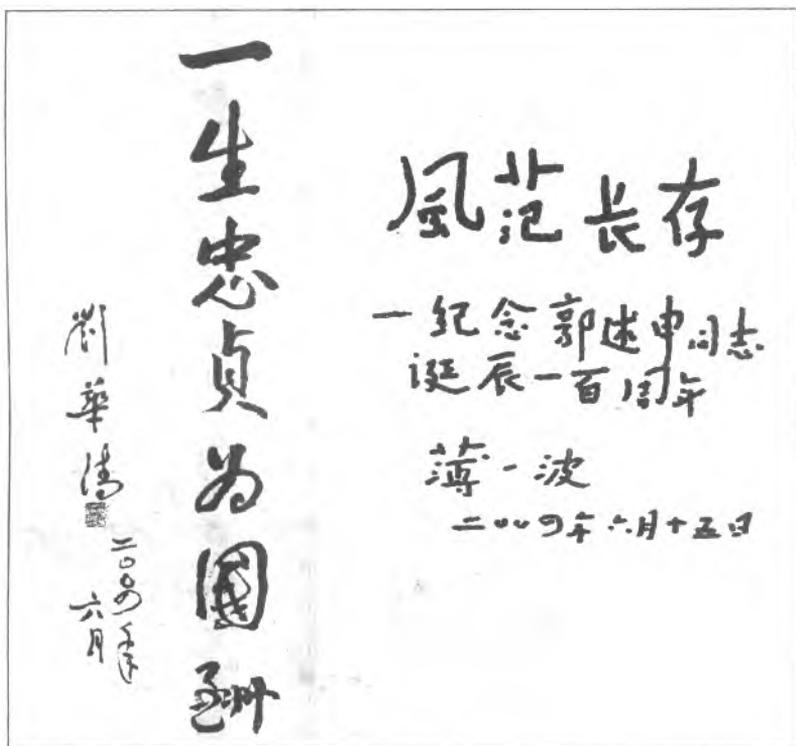
郭老 1994 年 7 月 14 日逝世后,刘华清等同志发表了《德高望重,功垂千古》的悼念文章。但他在遗嘱中说到自己的革命经历时,只是很平淡地说:“在我觉悟到要做一个共产党员,而要求入党(1927 年 6 月)以来,已经整整 60 年了。在这漫长的奋斗生涯中,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误的教训,但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这使我们回忆起他生前言行,不论是平日接受访谈,还是撰写文章,对并肩战斗过的先烈和战友的功绩和品德总是如数家珍,赞不绝口,却避而不谈自己所起的作用。这种崇高的革命情怀使我们的的心灵得到一次净化,也感到郭老说的“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这句话具有“一言九鼎”的分量。这句话看似平常,但能问心无愧地用来作自己革命生涯的总结却并非易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遗嘱接着说:“我也不是完满无缺,没有错误的人,我只是在不断学习的实践中,解剖自己,反思吾身,克服缺点,纠正错误,以期保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些亲切而又朴实的语言却蕴含着深刻的启示:只有“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解剖自己,反思吾身,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才能保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十六大



郭述申(1904—1994),湖北孝感人,1922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第一任中共鄂豫皖边特区书记,领导过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抗战时期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和新四军第五支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辽北和吉江等省的工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建国前夕调任中共旅大区党委副书记,1954 年任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担任中纪委副书记。

报告提出要“建设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大批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领导人才”,郭老的切身经验,对于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关心子女是人之常情。在生命将及终点时想给后代留下一份遗产,也是可以理解的愿望。问题是留下什么样的遗产。有的人千方百计利用尚有的权力、影响,给子女留下优越的位子、豪华的房子、大量的票子,为子女的未来创造条件,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的事并不罕见。郭在遗嘱中说:“我希望我的后代用我的经历(正反两方面的经历)以及我所能存留的言论,作为我贡献给你们的一



份精神遗产。”这就是他留给子女的全部遗产，是名副其实的“精神遗产”。除了平日的身教言教，全都见诸《郭述申文选》（《郭述申纪念文集·下卷》）。遗产的性质和内涵，充分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这份遗产所体现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教育意义都是十分丰厚的，其价值是任何物质遗产所无法比拟的。可以从中受益的也不仅仅是郭老的后人。倘若我们每个人，包括领导干部都能受到启发，尽己之所能尽力给子女留下一份或多或少的精神遗产，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年轻一代的素质，意义该是何等重大。

为人父母，望子成龙，应当说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要求子女成为什么样的“龙”。不少人希望子女得到某种高级职称或成为卓越人物，这比希望子女成为高官或大款的显得高尚，也未可厚非；但与郭老对子女的要求相比就差距太明显了。他在遗嘱中对子女说：“在你们一生中，能做出一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民族的事业，无论成就的大小，只要诚心诚意地坚持下去，就是我们光荣的后代。”这些话初看似很平常，经过仔细体会，我发现这是一种高素质的要求，只有完全与高低贵贱一类的等级观念决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会希望子女成为这样的“龙”。这不禁使

我想起鲁迅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在绝无等级观念和厌弃虚名这点上，郭老和鲁迅的两篇遗嘱可谓后先辉映。

郭老在遗嘱中还特别告诫后代：

“我要求你们（1）不损人利己（2）不贪污枉法（3）不以权谋私，不以势压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以平等友好的精神和积极帮助别人的态度（包括批评）对待周围的人们。”这些话出自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之口，不仅出于对子女从道德上政治上的关心，也体现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可

谓语重心长。郭老对子女谆谆告诫涉及的正是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根据个人见闻和感受，我认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以平等友好的精神和积极帮助别人的态度（包括批评）对待周围的人们”这一点应当引起所有家长的注意。不光是高干子弟，几乎所有家境优裕的子女，很容易产生优越感，一切以我为中心盛气凌人，缺乏平等待人的精神和关心帮助人的态度。说句也许被认为危言耸听的话，这对他们自身和祖国前途都是值得忧虑的事。但愿我们的领导干部和家境富裕的家长都能像郭老注意以平等待人的思想教育子女。

《遗嘱》的第二部分是对后事的交代，一共10条。

第6条是：“以我和许云共同的有限积蓄的一半约五千元，贡献给孝感市人民政府，作为奖励小学教师的基金。”共同的有限积蓄的一半”仅仅是约五千元，这对于两位有数十年革命经历的伴侣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不少职务低得多的干部的积蓄可能比这多得多，其廉洁自律的风范于此可见。据我们所知，郭老直到临终，家中既无空调也无音响，一台电风扇还是修过多次的。孝感市的小学教师如果了解这些情况，对他的义举一定会十分感动。（责任编辑 赵友慈）

鲁迅答“托派”的信出自冯雪峰

● 丁 弘

鲁迅先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几十年间,是作为高中语文教材的。一代又一代知识青年,从这篇文章了解“托派”和鲁迅。我在“文革”中曾拜读此文,一时没有想通,这篇文章不过是用讽刺、挖苦的语言,作出几点表态。其篇章结构和逻辑推理,岂可以作为范文呢!当时这样想显然大错,错在没有“突出政治”。

在突出政治的年代,首选此文是理所当然的。他标志着鲁迅先生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是他鲜明政治态度的证明,特别是他抒发了歌颂党的语言,虽是婉约,但又是明确无误的。

二三十年之后,才知道共产党,曾任左联党团书记、上海文委书记

此文不是鲁迅先生写的。个中的故事发人深思。鲁迅先生是在1936年10月19日病逝的,他到6月份就病重了。《日记》在6月5日中断,可是这个文章注明是6月9日写的。鲁迅先生坚持写的日记都中断了,时已重病在床,四天之后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

这篇文章发表时,说:“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OV是冯雪峰)胡风在1984年有长篇回忆文章《鲁迅先生》。他谈到:“当时鲁迅病重,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也不可能……冯雪峰约我去看鲁迅,他拿着拟好的稿子,念给他听。鲁迅闭着眼睛听他念,没有说什么,只点了点头。冯雪峰回去之后,又拟了一篇《论



冯雪峰(1903—1976),1927年加入中国

代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鲁迅这时身体更弱了,更没有力气说什么了。他点了点头,略显出一点不耐烦的神气……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这是说,文章也不是鲁迅口授的,而是出自冯的笔下。胡风还谈到,叫重病中的鲁迅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表态,显然是不严肃的。一则影响他的健康,再则他未能深思熟虑,叫他负责,说不过去。此后他只是略为表示不满,但也没有郑重否认,因为冯是从中共中央来的人,他代表党,鲁迅未便如此。

胡风所言,并不仅仅是“孤证”。鲁迅夫人许广平对这两篇文章的态度是重要的佐证。此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篇》。其《一集》、《二集》都是鲁迅先生自己选编的。《末篇》是他去世之后,由许广平选编的。对此文许广平的心情有点尴尬,因为不是先生所著,不可堂堂正正的选入,但又毕竟以他的名义发表过。于是退而置于《末篇》的《附集》中。当时以鲁迅先生的名义发表,而不是他写的文章,另外还有,如瞿秋白的文章。这是当时文坛上的现象。许还是收存备考了。

关键在于这文章,不符合鲁迅的一贯思想。鲁迅先生提到托洛茨基,总是怀着敬意和赞许的,他读过很多他的书。就是托氏被斯大林打倒

后,他也没有“成王败寇”的思想。仍然说,他不是武夫,他是有文艺修养的,他的观点从长远看是有价值的。等等。

他对冯雪峰文中所说的“托洛斯基的中国徒孙们”——当时公认指的陈独秀,也一直是肯定和赞扬的。陈在鲁迅的心目中是什么地位?鲁迅有“遵命文学”之说。他明白地说:“我所尊奉的,是那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说白了是尊重陈独秀,当时公认他是“革命的先驱”。那时共产党没有建立。鲁迅先生也从来没有谴责过托派。

曹禺在他的剧本扉页上写着:“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生是一个戏剧。戏剧表现精彩的人生。”如果把这件事看作一个独幕剧,人物有冯雪峰、鲁迅、胡风和许广平。也有精彩之处:鲁迅病重,闭目点头。戏剧性在于它的模糊性和悬念。可以理解为“认同了”,也可以认为是“知道了”。如何理解视主谋者的需要而定。冯说是鲁迅口授,还利用了党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冯的目的达到了。他把鲁迅——“中国的高尔基”推入国际共运反托。他又在病重的情况下,终于深情地歌颂党所领导的队伍。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儿,作为党的代表的冯,在代替鲁迅表态和抒情。胡风对之进行道德评说。政治斗争哪讲这个!如军事斗争的“兵不厌诈”吧。此类事多矣,如“反右”中的“阳谋”,庐山会议前的号召学海瑞。都是“请君入瓮”,纷纷落马。所以冯雪峰之举不足怪。鲁迅先生是讲过《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当然应看对什么人,对鲁迅先生也可以不讲“费厄泼赖”(fairplay)吗?

后来鲁迅不好再说什么。史学家靳树鹏说:“冯和鲁迅、胡风可能没有想到这个文章会造成这样大的影响。”这是善意的揣测。

看来冯雪峰也并不了解“托派”有什么罪和错。当时革命队伍里的同志都知道“托派”是最阴险、最可怕的敌人,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回事。冯用了最刻薄的语言,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又未能据实说明是非。

例如他说:“史太林先生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能

说明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至‘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吗?”这个逻辑,是歌颂成功者,鞭笞失败者,没有讲“是非”。陈独秀晚年的诗中,有“善非恶之敌(好人常斗不过坏人。)”这倒是事实。

冯急匆匆一再这样做,当然是一种需要,是不择手段的个人行为,还是执行革命任务呢?

在这个独幕剧中,鲁迅也是主角,他的处境不妙。他谈不到认同,其一贯的思想是清楚的。

胡风先生负责地做了见证人。许广平对文稿作了恰如其分的处理。这使情况十分清晰地展示出来。

“鲁迅的文章”发表后,立即有巨大的反响,因为他满足了党内斗争的现实需求。在巴黎的《救国报》(中共所办的报纸)居然两次发表这篇文章。来信人原来是陈其昌,刊出时用陈××。一般误认为是陈独秀,认为鲁迅先生居然和陈独秀斗争起来,真是太有戏剧性了。从该报反映的情况看,应和鲁迅先生声讨“托派”之声遍及各地,如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当然还有延安等地,更及于香港、美国、新加坡、巴西等地区和国家。

毛泽东在延安有强烈的反响,他说鲁迅的思想和他是相通的,赞扬鲁迅,居然用了五个“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定、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民族英雄。”还说:“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现代的圣人。”伟大无以复加。用这样的词语赞扬一个人是少见的。这当然是因需要而从总体上说的,但不能否认此文是重要的诱发因素。毛泽东1937年在陕北公学所做的《论鲁迅》的讲话,即抓住这篇文章做重要的发挥。他说:“鲁迅先生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的远,看的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的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为汉奸组织,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经是明显的事情了。(1938年,第十期《七月》杂志)。

此文1981年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时,及收入《毛泽东文集》时,均删去“托派成为汉奸组织……”等词语,算是改正了,因为查无实据!这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多年了。在历史上,党内斗争进行诬陷,后来不得不重新改正,是常有的事情。如

诬陷潘汉年是“特务”，彭德怀是“里通外国”，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等。问题在于没有法制，更没有“诬陷罪”。诬陷者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几千年形成一种民族的潜意识，伟人居法理之上，也无需接受道德评价。因此对待“托派”一样如此。

历史条件如此，也就无须过责冯雪峰利用鲁迅病重，杜撰他的反托言论了。后来反“右派”，他有不幸的遭遇，又是值得同情的。

应该了解，发表这篇文章时，即1936年6至7月间，托洛茨基在哪里？他正在逃亡国外，辗转万里的途中。他一路听到的是一批又一批列宁的战友、那些杰出的政治家被杀害了。他是仅次于列宁的第二把手，“十月革命”时，他的像和列宁的像并列挂出，更是斯大林的政敌，最后逃到南美墨西哥，还是被“契卡”捕杀。鲁迅对他一贯是敬仰的。这时仍婉转地说到他的理论是不朽的，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鲁迅写到：“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有名利关系的文章，当留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还是对的。”说明鲁迅先生没有势利之见，仍然在肯定托氏。鲁迅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这时陈独秀又在哪里？他第五次被捕，正关押在敌人的牢中。“陈案”惊动全国，各地报刊公开连续报道，全国掀起援救的热潮。社会名流蔡元培、胡适、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还有蒋梦麟、周作人、钱玄同……都以不同的形式呼吁公开处理、从宽发落！当时被誉为“国母”的宋庆龄专程从上海到南京，进行斡旋，对蒋介石施加压力。陈的视死如归、陈的浩然正气为国人所称颂。鲁迅当然是知之甚详，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讽刺诬陷陈独秀吗？事实恰恰相反，在陈被捕之后他写到：“这里我必须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写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这是他真正的感情！陈独秀一直是他心目中的旗帜和领路人。如果鲁迅对陈独秀和托洛斯基取“成王败寇”的态度，不讲是非，那鲁迅也就不是鲁迅了。

几十年间，这篇文章，成为鲁迅思想发展史上标志之一，这不仅是文艺界文化界的话题，而且被“拿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波助澜，着实起了“投枪和匕首”的作用。

是否正因为如此，鲁迅讲了这样的话，他说：

“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革命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这才真是鲁迅先生的语言和思想！

前苏联已经为托派平反，这我们可以说中国托派分子大方向没有错。他们向往革命，思想上皈依托洛斯基，应该说他们是一批先觉者。1952年，我们党下令，在12月22日，恰在斯大林的生日这天对约500名中国托派一网打尽，全部投入监狱。三十年后《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516页注释[9]中，删去诬陷之词，人们认为这是在道义上为“托派”平反了。牢狱中的幸存者得到释放，但在法律上，在组织上对平反并未真正落实。以致这些所剩不多的人，至今仍受到损害和压抑。他们的苦情得到人们的同情……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书屋》2004年第9期目录

灯下随笔	今日中国的“群众性民族主义”	王彬彬
	“分子”与人	景凯旋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	王开岭
思史佚篇	马可·波罗与元大都	洪 烛
说长论短	当代女性的命运	周筱涓
	坏女人的经济学	邓艳珍
流年碎影	带血的黎明	狄 马
	在“民主与独裁”中的胡适	范 泓
来稿摘要	资本生活	丁国强
法制经纬	财产权何以如此重要	袁传旭
	——从美国权利法案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说开去	山 谷
其人其事	患得患失吴梅村	何 董
	以董其昌为训	
书屋品茗	被压倒的理性	
	——读《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吴茂华
	《法西斯群众心理学》	雷 颐
	牢记“昨日”	
	席吕塞尔堡的韩加面特	陈璧生
	——读《狱中二十年》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	
	——读《天朝的崩溃》	易中天
	革命哲学与宪政逻辑	
	——读《直面历史》	郭绍敏
专栏集萃	动物笔记（六）	张 翔
来稿摘登	宋朝的“冗官”	陈 坚
	大众传媒与都市情感	王 萌
	侧悦高奇金圣叹	陈曙东
	以前的愚蠢	李明月
封 面	清溪渔隐图（局部·缩小）	（宋）李 唐
封 二	串调的喜剧	黄水玉 文画
封 三	题画小记	季西辰 画 韩 羽 文
封 底	学不厌	李 立（篆刻）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 址：长沙市韶山北路6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 话：0731—5791300 5790951 传真：0731—5790197
E-mail：nlh5314@263.net 或 nlh5314@public.cs.hn.cn

徐铸成划右派问题的争论

● 姚芳藻



徐铸成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令人震惊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揭开了反右运动的序幕。

《文汇报》是这场运动的焦点。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席亲笔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还没有发表，《文汇报》老总徐铸成还陶醉在受毛泽东表扬，被委派为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的无限荣耀之中。

然而，反右斗争的熊熊烈火已向他扑来。9

日夜间和10日上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两次召见《文汇报》党组书记、副总编辑钦本立，命令他把徐铸成批垮搞臭，连具体作战方案都安排好了。10日晚间6时，又召集《文汇报》全体党组成员，到海格大楼市委办公厅举行党组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徐铸成划右事宜。

参加会议的有钦本立、唐海、刘火子、温崇实、周天国、殷克、韩才英，还有几个不是党组成员的人。主持会议的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冰，记录是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负责干部工作的蒋文杰，到会的还有一位陈虞孙是文化局局长。他曾经是解放前《文汇报》的副总主笔，但与现在的《文汇报》没什么关系。他来干什么呢？后来人们才知道，他马上就是《文汇报》的老总，领导《文汇报》的反右运动。这个时候，市委已经决定撤换徐铸成了。

会议内容说是讨论徐铸成是否划右问题，其实只是宣布而已。徐铸成已经被内定为右派，开会讨论不过是走走形式，表示一致通过而已。然而这时却有这么一个不识时务的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徐铸成不是右派！”

讲话的是温崇实。他在行政上担任报社编委会秘书，在《文汇报》同仁中并不起眼。此人于1956年10月刚与钦本立一起调到《文汇报》来，过去与徐铸成毫无关系。

于是，引起一场争论。对温崇实倒也并没有群起而攻之。因为《文汇报》的那些人，思想实在跟不上形势，尤其钦本立和唐海。他们都是《文汇报》副总编辑，大鸣大放期间，徐铸成在苏联访问，应该由他们负责，他们的思想负担极重，又怎能去说服温崇实？他们也不能站在温崇实一

边,因为柯庆施已经找他们谈过话。于是他们只能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争论只是一对一,陈冰对温崇实。旁人虽了解情况,也沉默不语。

陈冰认为把徐铸成划为右派,罪证确凿。第一,他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墙是可以拆掉的》,宣扬他的拆墙经验是调离党员领导干部,毋庸置疑,这是反党大毒草;第二《文汇报》在鸣放期间发表那么多反党文章,他罪责难逃;第三,从历史上看,徐铸成在解放前《文汇报》,表现不佳,本来就是右派。

温崇实却一一加以反驳:第一《文汇报》两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调离,是党组织的决定,徐铸成没有这个权力。徐铸成把这个作为他的拆墙经验,显然是认识上的错误,不能拔高到政治问题上来;第二,温崇实说:“《文汇报》这段时期的确发了很多鸣放文章,但我作为编委会秘书,这些文章都曾送给你们审查过的,你们批下来可发’,我才交给编辑去发。你们批下来‘不发’,我们不会发。《文汇报》发了这么多反党文章,难道是徐铸成的责任?你们没有责任?徐铸成那段时间不在上海,他根本不知道那些稿件,怎么能由他负责呢?”第三,至于徐铸成历史上的问题,温崇实有发言权。因为当时他是地下党领导人姚溱联系《文汇报》的信使,对《文汇报》人事方面、宣传方面,以及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举了许多实例说:“徐铸成是有错,但当时地下党忽左忽右,也有错,怎能说徐铸成当时就是右派呢?”

双方就在这几个问题上论来论去,争论不休。温崇实遭到猛烈攻击,但他始终坚持己见,据理力争。就因为他一个人反对,徐铸成划右的事情得不到一致通过。这时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走了进来,他刚坐下,陈冰就想出了解决的办法。陈冰说:“好吧,我们举手表决吧。”

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温崇实当然非输不可。他硬是不服气,犟头倔脑地说:“我保留我自己的意见。”

石西民向大家扫视了一遍,看个个保持沉默,他看看表,已是半夜一时,会

整整开了7个小时。他站起来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开会。”立即宣布:“散会吧。”

虽然徐铸成划右的事没有通过,但他还是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资从9级降到14级。清除出他一手创办的《文汇报》。温崇实呢,包庇右派,罪莫大焉,当然非处分不可。对他的处分是:降级降薪,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自此,他被撵到资料室,当一名普通资料员。至于降级降薪,幸被石西民一笔勾销,才未遭受到经济压迫之苦。

23年后,右派分子改正的中央55号文件下达,温崇实又为徐铸成改正问题而奔走。他去找石西民,石西民说:“你忘了我那天不是说散会吗?我们没有对徐铸成划右问题进行表决,徐铸成右派不是我们定的。”

原来,石西民一声“散会”和对温崇实降级降薪处分的一笔勾销,都是他有意对知识分子的保护啊!

(责任编辑 吴思)

博览群书

兼容并包,促进作者、读者、评论者和出版者的沟通

《博览群书》向以文章视野开阔、富有思想性和文字精警耐读著称,既有助于开阔视野,清晰了解思想界、知识界关注热点与精神脉动,也可透过杂志对新书、好书的深入介绍与评价,了解最新出版趋势,选读将对社会文化思潮产生重要影响的好书。

《博览群书》每期8印张,内文使用60克轻型胶版纸,定价7.50元,全年90元,邮发代号:2-868,全国各地邮电局(所)均可破季订阅。编辑部办理邮购。

地址:北京市珠市口东大街5号 邮编:100062

电话:(010)67078107 67078104(传真)

E-mail:blqs@publica.bj.cninfo.net

blqs@gmw.cn

http://www.gmw.cn

文革中的《伯达文选》

● 王 锐

年前有文章谈及“文革”中曾有红卫兵、造反派编有《江青文选》，并有追随讨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后因故作罢。今年《炎黄春秋》第3期上甘惜分先生在《我见到的陈伯达》一文中谈及对陈伯达的评价，又建议说：“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按照不因人废言的传统，我们是否也可以把陈伯达著作择其精华编成文集，让后人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参考。”又说：“据我所看到的陈伯达著作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大约有几十篇，即使其中个别地方并非都完全正确，也可全文收入，使后人能够从中了解一个真实的陈伯达。”

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正如当年的《江青文选》一样，早在“文革”高潮期的1967年至1969年间，即已有红卫兵及造反组织，编印发行过《陈伯达讲话集》、《伯达文选》之类。笔者收藏至今的一册《伯达文选》，由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工组于1969年7月编印，大16开本，篇幅颇巨，达488页，约有3斤重量，估计有100万字以上。共收录陈伯达从1933年秋至1969年4月，三十多年间的著述、文章、讲话共100余篇。其中已出单行本的诸如《中国的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窃国大盗袁世凯》等名篇，部分编目仅有篇名而无正文。依笔者所见，这大概是辑录陈伯达著述最完整的一个《文选》版本。

也许正因为编者系四川大学这样有学术文化含量的单位，又是以“革委会政工组”这种官方正式机构出头，不比“文革”普通的只知冲冲杀杀以批判揪斗为能事的群众造反组织，这册《伯达文选》不仅内容较厚实，选编态度上也比

较严谨慎重，而且印刷也很美观（封面设计及扉页印刷均不错，另有三幅大照片），在当时“文革”的印刷出版物中，恐怕算是佼佼者了。为显示这种审慎严谨，编者煞费苦心地在正文前，专门附有一页《说明》，全文如下：

为了帮助我校的广大的师生、教员、工人、干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斗私批修，继续革命，我们选编了《伯达文选》，作为内部学习参考资料。

为了力求资料尽量完善《伯达文选》所收的文章，讲话等，虽然基本上是解放后公开发表过的，但也有少数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和解放前发表过的，而且我们无法一一加以订正，这是特别加以说明的。因此，本书只作内部学习参考资料，不得外传。凡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一律不得扩散、引证。“保守党的机密，慎之又慎。”要严格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有关规定。若有违犯，要严加追究。

编者 一九六九年七月

从这个《说明》的前半部分，可以看出是将陈伯达视为类似江青那样的“文化革命旗手”、党内路线斗争的正确路线代表，按照当时流行说法，叫“毛主席司令部”或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种至高无上地位来看待陈伯达的。从一定程度上说，连周恩来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不能享受这种“尊荣”。当时无任何机构组织出头编印《周恩来文选》便是证明。因此才有说明中要帮助人们“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

史”那些非常高屋建瓴又相当针对现实的话。

从内容方面讲,这册《伯达文选》,所有文章、著述、讲话按时间顺序通排,大致可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从1933年到1949年止。第二部分为建国后至1966年6月“文革”爆发前。第三部分为“文革”时期。陈伯达一生著述的“精华”,几乎都在建国前的那部分里。甘惜分先生文章所说的“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几十篇”,大约其多数包括在其中。

《伯达文选》开篇文章,为陈伯达写于1933年的《论中国启蒙思想家谭嗣同》(平心而论,这是陈氏较有学术水准的文稿之一,同类者还有《文选》中的《从名实问题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分野》、《关于知行问题的研究》、《扬子哲学思想》、《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等)最后一篇是1969年4月底或5月初(原稿无具体日期)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稿。此《文选》编于1969年7月,算是包括陈伯达的最新讲话文稿的一个文集。以陈伯达“一贯紧跟”的政治形象,当时身居高位的显赫,编纂者这也算是“跟得紧”的一种表现了。尤引人注目的是《文选》卷首有三页篇幅占上整版的大幅照片。第一幅是毛泽东与林彪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第二幅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4位最高领导身穿军装满面笑容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时的合影照,世称“四巨头”照。在当年(陈伯达倒台前)极为流行和有名。此照片的说明文字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最后一幅照片是陈氏在天安门城楼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发表讲话。照片上,陈伯达处于突出位置,他左边是毛泽东及林彪,毛泽东正呈拍手状,为陈伯达的讲话鼓掌喝彩。照片的说明文字也别有深意:“陈伯达同志向文化革命大军说:毛主席时时刻刻都是和群众在一起的。他的心,永远向着群众。”显然,这幅照片更是突出了陈伯达在“文革”中的显要作用,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的路线紧跟,以及受毛泽东高度信任的政治姿态。

其实,照片中所展示给世人的,在实际上也

确实如此。这册《伯达文选》的“文革”部分中,收有一份题为《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的短文。其实,那是陈伯达的一份大字报原稿,是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紧跟毛泽东将攻击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一次政治表态,当时就很引人注目。

在1966年8月1日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写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将“文革”运动的攻击点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此举极令与会者震惊与困惑。而身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则是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紧跟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于毛泽东大字报的第二天,写下这张《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的大字报。在这份大字报中,陈伯达如毛泽东在大字报中一样,没有点刘少奇、邓小平的名,但是却露骨地攻击刘邓是“镇压群众”,“这样做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而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失败,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同时,还从所谓的理论高度,对毛泽东大字报的观点予以



阐释,并试图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方面,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寻找依据。

无论当时还是事过之后来审视,陈伯达这种“亮相”都是很出彩的。由此,他也获得了相当的报偿。几天之后中央领导机构出人意料地作出大幅改组,此前,仅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一跃而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名列刘少奇、邓小平、朱德、李富春等老资格领导人之前,成了中央第5号人物(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本来陈伯达在毛、林、周之后名列第4位,因江青嫌陈伯达文人出身,怕其压不住刘、邓等人,就将本来名列末位的陶铸提到陈伯达之前的第4位,以镇住刘、邓等。不过,几个月后陶铸因故被罢,陈伯达名正言顺成了中国政坛第4号人物)。两个月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由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与会者(也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主打讲话”(这册《伯达文选》中亦全文收入该讲话)。这个讲话被称为“文革”的“经典讲话”之一。这个《讲话》中,陈伯达创造性地“使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提法”,将所谓“刘邓路线”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文革”开始了一个新的进程。毛泽东对陈伯达这个《讲话》深为赞赏,并于几

天后不仅亲笔批示:“该稿看过,很好。”而且还进一步批示说:“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一本。”毛泽东将陈伯达这篇讲话大量发行到全国每个党支部,甚至红卫兵小队,可见对其赞赏好评到什么程度。反之也可证实,此时陈伯达其人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

从历史事实来看,这册《伯达文选》编印之时,尽管表面上陈伯达仍然以中央“第4号人物”的身份在“无限风光”,其实私下里,他因为与江青的矛盾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已经失势,被排挤到了次要位置。这也是陈伯达下决心改换门庭投靠林彪集团的主要理由。只是当时此事仍为“高层机密”,一般人无从知道罢了。也因此才有《伯达文选》的问世。一年后陈伯达在庐山翻船,这册《伯达文选》不仅成了“禁书”、“毒草”,被收缴,被焚毁,而且编印者均受到严厉无情的政治审查,有些人还因此而身入囹圄大吞苦果。这又是当年试图对陈伯达这个“文革红人”讨好拍马,跟风吹捧的造反先生们始料不及的。如今,这册难得的《伯达文选》不仅成了较为珍贵的“文革藏品”,也成了当年“文革”进程的一份历史见证,可供史家学者们研究之用。

(责任编辑 吴思)

(上接22页)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解放这么多年,我们国家还有这么穷的地方!更没想到在我们江苏,还有这么穷的地方!”他们接着又和我一起到沿苏北灌溉总渠北的几个穷乡跑了一趟,回来迅速与县委领导交换了一下意见,委托县委政策研究室实事求是撰写一份调查报告,迅速送给他们。

按照他们的要求,我很快写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重视的贫困地带》的调查报告。我坚持实话实说,把滨海贫困状况、致贫原因、扶贫建议,如实地反映出来。材料经县委主要领导同志阅后,我立即赶赴南京直送曹光福。省委政策研究室复印后,给副省级以上领导人每人送一份。

这份调查报告以及曹光福、顾星同志的直接汇报,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重视。他们连续三年派省委办公厅的同志到滨海驻点调查,对滨海以及其它贫困地区的情况了解越来越

越透彻,不但没有撤销扶贫办公室,而且成立了有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扶贫领导小组,对苏北重点地区持续开展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使这一区域的经济和社会面貌终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事情过去十多年了。我常想:如果省委研究室同志不是那么执著于实事求是,坚持要揭示真相;如果滨海县不顾全大局,仍然用假情况应付上级,那么,江苏的扶贫很可能十几年前就高奏“凯歌”,苏北老区百万贫困农户也可能无从受惠脱贫了!

我又想,贫困地区的面积那么大,涉及到的人那么多(仅滨海县贫困乡村就有二十多万人口),为什么上级不但听不到如实的汇报,而且调查起来竟会那样困难,甚至无法调查呢?

(责任编辑 吴思)

张澜：

追求民主的“川北圣人”

● 赵锡骅

公开谴责蒋介石独裁

1944年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军汤恩伯、胡宗南部40万守军一触即溃,日军接着经湖北进攻湘桂,全国震动,群情激愤。

10月7日下午,华西坝上,华西协成大学和从沦陷区迁川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5所大学的“时事研究会”、“朝明学社”等12个学术团体,邀请在重庆参加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后回成都的7位国民参政员,到华西坝华大体育馆举行“国是座谈会”。他们是:张澜、李璜、常燕生(华大教授)、刘王立明、吴贻荈(金陵女子文学院院长)、周华池、黄建中。其中张澜、李璜、常燕生、刘王立明4位是代表民盟参加参政会的参政员,黄建中是国民党党员。

那天,我和川大部分同学到华西坝听讲,华大体育馆内近千个座位很快坐满,后来的只有爬上窗台或围立在大门口了。座谈会由燕大学生会主席刘克林(中共地下党员)主持。

同学们提了一百多个问题:民主宪政方面,国民党中央屡次声称结束训政何以至今没有行动。内政方面,物价飞涨,官吏贪污,特务横行。团结抗战方面,国共谈判症结,党派合法,抗战前途,教育问题。军事方面,豫湘桂战役失败的原因,失职将领如何处置,政府对西南战事的布置等共7类。张贴在讲台墙壁上,参政员们到后,先请他们参阅,以便讲话时回答。

最受群众欢迎,一再赢得大家鼓掌的是民盟主席张澜的讲演。我是第一次见到张老先生,但见他体魄比较高,身着旧布长袍,年逾古稀尚挺着腰板。他用生动犀利的四川方言讲道:“你们不是受着种种的干涉和限

制,不让你们谈国是吗?笑声)今天你们提出了这样许许多多的问题,其实根本问题就只有一个,就是民主政治问题。如果实行民主,就不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既有这些问题,就反证今天是不民主。(鼓掌)他指出:“何以政治腐败到这种程度?何以国家到如此境地?都是由于一党专政独裁的结果。(大家鼓掌)……贪污违法不一而足,亦以财政部为第一。(部长孔祥熙)……民意不能代表,舆论不能伸张,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官吏,因此,法令繁多而纷扰,民不聊生,利归中饱。(大鼓掌)军队没有不吃空额的,正如冯玉祥先生在宪政座谈会上所说的,现在的士兵由壮丁变成瘦丁,由瘦丁变成病丁,由病丁变成死丁,幸而不死的,放下枪杆,脱下军装,亦形同乞丐一般。(大鼓掌)所以要实行民主,才能团结全国,集中人才,革新这么多年来腐化的政治,才能挽救国家的危局。”

张澜点名谴责蒋介石的假民主说:“蒋委员长,国民党也在喊民主。他们那儿民主,不是我们这儿民主!”(长时间大鼓掌)

谈到党派问题和民主政治问题,张澜说:“各党派应公开合法存在。国共合作,尤为必要。……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就是组织联合政府。”在这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参政员林伯渠、董必武和民盟及各方面民主力量商量后,由林伯渠于9月15日在会上提出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问题,要求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把当时在民主宪政运动中提出的一般政治要求,集中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主张和总的奋斗目标。参政会后不到一个月,张澜就将这个民主宪政政治运动的具体主张和奋斗目标在成都的公开群众集会上响亮地提出,引起了震动。他接着号召说:“现在正是说话的时候,希望大家起来多说,多吼,那么

联合政府的内容,性质,自然就有了!〔大鼓掌〕

以上这些讲话,当时成都的《新中国日报》作了详细的报道,只是略去了对蒋介石的点名谴责。

在中国出生成长的加拿大籍国际友人、华西大学教授文幼章博士(Dr. James G. Enditt),也来参加听讲。他对张澜的精彩讲话和学生们的强烈反响很感兴趣和激动,会后给加拿大外交部写了一份报告,并将副本交给了《时代》的记者。报告中说张澜“对国民党进行直接的,无畏的,特别有力的攻击”。三番两次地号召学生:“你们必须一而再地大声疾呼,直到你们获得言论自由为止。”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挽救时局……挽救的办法是把民主权利给予人民。”又说张澜“赞同共产党所持的这种反对国民党的立场。”“国民党坚持统一,而共产党人首先要民主,共产党人若不首先取得民主,那么国民党计划中的统一就意味着肉体上消灭共产党。”

1984年,中共成都市委党史工委在所编写的《民主青年协会革命斗争史稿》中写到这次国是座谈会时,也强调指出:“民盟主席张澜在会上发表了激昂的讲演……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的欢迎……国是座谈会的召开……打破了大后方沉寂的局面,动员和鼓舞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对张澜这次讲话的作用和影响,作了很高的评价。

布衣铁骨论国是

张澜,字表方,1872年4月12日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一生清廉公正,浩气凛然,德高望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举国上下都尊称他张表老。

张澜1914年曾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1917年任四川省长,1920年因反对北洋军阀被北洋政府免职。1922年复任南充中学校长,兼任端明女子中学校长。1926年4月6日,就任国立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校长。他一贯提倡思想自由,学术民主。注重师资建设,在南充时聘请共产党人张秀熟、袁尧等作教师,邀请吴玉章到校讲演,传播马克思主义,朱德、罗瑞卿、任白戈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在成都大学时,教师中各种政治派别的人物都有,学生的活动也丰富多彩。三个政治派别的学生组织了三个社团,办了三个刊物,学校拨经费支持,让他们自由发展,互相争鸣。信仰社会主义的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所”,邀请中共特支书记刘愿安到校以“如何救中国”为题作讲演时,张校长亲自参加听讲。讲毕,张校长立即起身,掀髯欢笑,带头鼓掌,连声称赞

“讲得好!”接着全场热烈鼓掌。他还主持招收女学生,开创男女生同校学习的新风。盘据成都的军阀逮捕进步师生时,张校长立即奔走营救。获悉有成大学生六人被杀害后更加震怒,便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在会上厉声谴责反动军阀残杀学生,“任意蹂躏学府尊严”的罪行,当场宣布辞职以表示抗议。各军首脑迫于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表示挽留,张澜感到反动势力的阻碍,在成大已难有所作为,仍婉辞他们的盛情,于1931年1月回到了南充。

1937年,中国对侵华日军开展全面抗战。1938年,国民党政府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张澜被遴选为参政员。但是到了1939年1月,蒋介石便自食其不分党派精诚团结的诺言,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秘密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破坏团结。张澜获悉后,在蒋介石约见时,当面直问说:“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和蒋介石进行了争论。1940年,蒋介石为了排斥四川地方将领,加强嫡系部队对四川的控制,自己兼任了四川省主席。3月28日,他召集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座谈宪政及川政问题时,张澜说:“补充阙者,不能亲从胜。”当面指出蒋介石兼理四川省主席是不妥当的。

1940年,著名爱国经济学教授马寅初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讲演时,痛骂蒋介石的连襟、财政部长孔祥熙“贪污,发国难财”!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是家族英雄”。他们这般贪官污吏,“误国之罪,还在汉奸、奸商之上”。12月8日,蒋介石下令将他逮捕下狱。次年9月17日,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张澜在会上提出《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以励直言而裨国政案》,提案指出:“忠直利国之言,应虚怀采纳,即有不合,亦应大度涵容,不宜辄加严谴,致绝忠谏之路”。提案代表民意,反映民心,惜未被当局采纳。直到1942年8月,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蒋介石方才释放马寅初教授。

在这次参政会上,张澜和民盟几位负责人参照民盟《十大纲领》的内容,概括写成《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战时民意机构;保障人民自由,停止特务机关活动等事项。由张澜领衔签署,董必武、邓颖超等共23位参政员参加联署提出。蒋介石看到这个提案的文本后甚为震怒,拍案大骂道:“张澜把我当成宣统了!”不准讨论此案。张澜在会上直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讨论这个重要提案,与蒋争论了一个多小时之久。会后又写了一封五千多字的长信给蒋介石,重申这个重大提案的必要

性,再度对他拒不讨论此案提出批评,并不再出席会议。此后当局虽然聘请张澜任国民参政会的驻会委员,张澜也不再参加参政会的活动,更不驻会。直到1943年9月第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将要召开时,张群奉命再次敦请张澜出席,他方才同意参加。

梁漱溟80年代末向张澜的女儿谈及张澜说:“表老德高望重,敢于斗争,大家都尊敬他。”这的确是当时普遍一致的看法。曾经作过国民参政员的最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邹韬奋在他的《抗战以来》一书中记述国民参政会的章节里写道:“在六七十岁的老前辈中,我们可以看到富有斗争精神,老当益壮的伙伴,例如最令人感动的有张一磨……又例如躯体魁梧,美髯的张澜先生,虽高寿已达古稀,而气概却无殊青年,对于四川积弊,在会场上尤其是口若悬河,气薄云霄。我们看见年青的纯洁英俊,深为国家民族庆幸,看到六七十岁的老前辈这样英勇有为,更不禁为国家民族快慰。”周恩来也对一些民盟上层人士说,张澜不但反蒋坚决,而且西南许多实力派人物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以他们在他们中的威望,很有利于民盟在西南立足。张澜继任民盟主席,可谓众望所归。

与毛泽东三次畅谈

坐落在重庆上清寺西南角嘉陵江畔的“特园”,主人鲜英字特生,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时的护卫营参谋,后任国民政府陆军第10师师长。因不满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危及抗战,愤而辞却一切职务,宣布影息特园,弃政从商。他参加民盟,延请张澜在此长期下榻。从此特园群贤毕至,英才荟萃。特园既是抗日民主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的中心活动场所。同时还是民盟没有挂牌的总部所在地,上层的重要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张澜以主席名义发表的政治主张和重要函件,从此发出。

1945年8月1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澜当天即在特园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呼吁“立即召开党派会议,从事团结商谈”,以寻求“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途径。15日,民盟又在特园向新闻界发表《在抗战胜利



张澜(右二)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

声中的紧急呼吁》,进一步阐明民盟的上述政治主张。

8月28日,毛泽东自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张澜、鲜英等前去机场迎接。

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三天,8月30日,便亲临特园访问。毛泽东刚在客厅坐下,便对张澜说:“表老,我临时时,你的学生,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托我带了一封信给你,并代他向你问候,还给你带了一份礼品,大生产时候织的军毯。”随即挥手示意警卫员将随带信件和礼品送上。张澜收下信件和礼品后说:“请代我向总司令致谢。”然后毛泽东和张澜、鲜英亲切叙谈了半个小时,说明刚到重庆事忙,改日再来畅谈,方才离去。

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里,先后三顾特园。第二次是9月2日,民盟领导成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冷遹、张申府和鲜英在特园盛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席间,毛泽东说:“我们今天聚会于‘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于民主之国。”

9月14日,毛泽东第三次去特园,专访张澜,二人闭门促膝谈心,畅论国是达三小时之久。他告诉张澜国共谈判的情况说,有一部分问题已经取得协议,目前症结仍在军队和解放区两个根本问题上。蒋介石正在驻华美军大力帮助下军运频繁,名为接收敌战区主权,实为抢占地盘,准备发动内战。张澜建议将国共已经取得一致的问题公诸于众,以免蒋介石以后又不承认,并主张用他给国共两党写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毛泽东

表示赞同。他又说,表老在西南声望很高,地方将领和实业界人士多半都听你的。他们有些是你的学生,有些是你的部下,何况你是“川北一圣人”嘛,一生清廉公正,两袖清风,连小小的公馆都没有,他们在心里不能不佩服你。蒋介石总是千方百计想吃掉他们,而你又不厌其烦一再给他们指引爱国为民的光明大道,他们相信你是关心他们,为他们好的。现在内战的危险可能严重存在,如果内战爆发,请表老鼎力做川军将领的工作,希望他们至少保持中立。张澜表示一定尽力去做。

是夜,张澜即刻赶写给国共两党的公开信,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民盟机关报《华西晚报》同时全文发表。

一锤定音:民盟不参加伪国大

国共重庆谈判的成果,是1946年1月10日到31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然而事隔数月,蒋介石国民党在其六届二中全会后,便肆意破坏政协决议,视《停战协定》如废纸,继续发动和扩大内战。7月4日,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中共解放区张家口,蒋介石“得意忘形”(罗隆基语),悍然于当日下午单方面下达了如期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的通知。

周恩来当日便理所当然地宣布,中共拒绝参加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的一党包办的国大。

“于是,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到‘第三方面’是否参加伪国大的问题上来。”在这个关节上,民主同盟是否参加伪国大,在“第三方面”来说,确有举足轻重之势。”

张澜在成都,接到南京民盟总部同仁催请他东下主持总部工作的专函后,于10月11日抱病坐飞机抵达重庆,对前来机场欢迎的民盟中委邓初民等20余人和报社、新闻社记者发表简短谈话说:“民盟一贯之主张,是和平民主。为了要求和平,所以反对内战;为了要求民主,所以反对国民党一党单独召开国大。如国民党召开一党国大,实有徒然把中国造成分裂局面之可能。”下榻“特园”后,又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中国的宪法已经通过两次了,人民不同意还得再来。国民党如不能与共产党合作,也不能与其他的人合作。”并警告说:“如国民党硬要一意孤行下去,这对他是异常不利的。”

中共代表团驻重庆的代表兼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是张澜的老朋友,二老当年在南充办学和搞地方自治时曾有密切的合作。张澜到重庆后,吴玉章数次到特园来访。吴玉章向张表老说明了党中央对时局的决定和态度,分析了一个多月来民盟致力于调解国共关系失败的原因,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其独裁分裂的方针。二位老人在亲切交谈中的共同看法是:坚持或是破坏政协决议,是当前顺应或者违反人民意志的根本分水岭。作为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政党,必须信守自己的签字和诺言,断然拒绝破坏政协决议的任何举动。因此,决不能参加伪国大。

张澜决定暂留重庆,不再东下,以表示他拒绝参加伪国大的决心,并避免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将他的东下歪曲为将参加国大。被誉为和平老人的成都国民参政员邵从恩到重庆准备东下,张澜挽留他说:“要去,等国民党按照政协决议的程序召开国大时,我们一起去。”邵老也留下了。

在南京,国民党正紧锣密鼓地加强对民盟的欺骗拉拢和分化瓦解活动。国民党大员陶希圣、陈立夫、潘公展、彭学沛等轮番游说,甚至宋美龄也出动了。青帮首领杜月笙也来做过说客。他们先着重拉拢黄炎培、罗隆基,都被婉言谢绝了。对张君勱,经过反复拉拒的争夺,国民党终于以委任其弟张公权任财政部长作诱饵,最后奏效了。国民党又放出所谓民盟先参加中共后参加的说法,表面上没有说不要中共参加,也有一点欺骗作用。第三方面的思想陷于混乱之中,民盟内部,也有些人还在犹豫,还想看一看。民盟一些中委乃至第三方面人士李济深等,都急盼张澜早日东下,团结第三方面以应付当前尖锐复杂的局面。李济深说:“表方不来,一切失去了中心。”

面对这种情况,黄炎培、罗隆基自感“镇不住纸”,主张催请张表老早日东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12日一大清早便来蓝家庄民盟总部,到时黄炎培刚刚起床,还在刷牙。周恩来向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建议说:“这样的关键问题,民盟应及时向主席张澜先生请示。”大家当即商定由实际负责秘书长工作的周新民立刻挂长途电话向在重庆的张澜汇报请示。张澜在电话中首先大声重复三遍说:“参加不得呀!……”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和民盟负责人及干部陈新桂等都听见了。张澜接着叮嘱说:“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以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周恩来听

完张澜在电话中给民盟总部一锤定音的明确指示后,这才放下心来,告辞而去。当天下午和晚上,张澜在重庆放心不下,又接连两次打电话给民盟南京总部周新民,再三叮嘱:“民盟无论如何不能提交名单(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民盟绝对不能参加国大!”

民盟总部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张澜主席的指示,一致表示拥护,“无一个对表老指示投反对票的”。(范朴斋)决议公布民盟不参加伪国大的决定,对外发表《严正声明》,对内发出《紧急通告》,其中引述张澜主席的指示,声明“即为本同盟对于国大之最后态度”。

《新华日报》随即在头版头条用大字标题向全国报道《民盟宣布拒绝参加国大》。

张澜得悉后高兴地笑着说:“今天晚上可以睡一觉了。”周恩来高兴地说:“只要民盟不参加国大,国大就臭了!”

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说:“听蒋主席报告的,都是反动分子。”

应邀北上,毛泽东亲临北京饭店诉心曲

1946年12月18日,张澜东下上海。24日主持召开民盟中常会,决议:“有民主社会党党籍之盟员而参加‘国大’者,应予退盟。”张君勱作为民社党负责人提交该党参加伪国大代表名单,亦以参加国大论,给予退盟处分。1947年1月6日至7日,张澜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在会上讲话指出,“伪国大通过的伪宪法是‘企图以法治之名,来保‘党治’之实。’”会议决定,继续为维护政协决议而斗争,并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困难局面,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公布了《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的声明,宣称“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五月学潮及上海工潮”。通令依据《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派遣特务和武装军警扼守张澜在上海永嘉里8号和成银行宿舍住地,强制解散民盟总部。张澜于次日发表声明表示:“我个人对国家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此声明上海各大报都不敢刊登,只有《正言报》和苏联办的《时代日报》全文发表了。

张澜和罗隆基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治病”,

不许离开上海,他们仍然坚持斗争。

张澜早已警告过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对他是非常不利的。人民解放军威逼长江后,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居幕后,争取喘息时间,先派张群回重庆任西南军政长官,妄图稳住西南。并先召四川地方将领邓锡侯、刘文辉到南京面谕,要他们支持张群。

邓锡侯见过蒋介石之后,便溜到上海看望张澜。邓对1948年春蒋撤掉了他的省主席职务,用听话的王陵基接替一事很生气。张澜劝他说:“丢掉省主席不要紧,时局很快要变,你应联络川军,等待时机,迎接解放要紧。”

刘文辉是张澜亲自吸收的民盟秘密盟员,他到南京后,便命随行的杨参谋长秘密径往上海看望张澜,请教川康下一步如何做的问题。张澜对杨说:“毛主席和我商量的是,内战打起来后,四川的力量够,就早起义,若力量不够,就等解放军进川时协同作战。”并嘱他们早回四川。杨回南京向刘文辉汇报后,刘完全接受张表老的吩咐,并遵嘱为民盟提供了一笔盟务活动经费。张澜将此款交给四川人办的和成银行汇往香港,补助民盟香港新总部的开支。刘将吸了多年的鸦片烟也戒掉了,下



1949年9月,张澜、朱德、罗瑞卿摄于颐和园

定决心准备起义。

张群要回四川任职时，也于1月24日先到上海看望张澜，张澜叮嘱他说：“你回去应该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嘛！首先应该释放政治犯，关起民盟那么多人，应该放嘛！还有征兵征粮少做些嘛，也不要再在四川打内战，这就是为人民造福了。”

张群答应这些事 回去以后斟酌办。”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名为《元旦文告》的求和声明。

1月5日，张澜在虹桥疗养院对来访的美国合众社中国分社主任高雅雅纵论了国内国际大事。上海《申报》头版头条报道说：“此七十七岁之民盟主席称：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平，但是我以为希望很渺茫。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中，有两条特别不能接受，不要说共产党如此，一般人民也是这样。这两条关于政府的接替和国民保持原状之要求。”

张氏证实在香港活动的民盟分子数人已离港北上，与中共举行新政协，渠透露其中两人为沈钧儒及章伯钧。

李宗仁作代总统后，派邵力子、甘介侯于1月27日到上海请张澜再像过去一样出面“调解”。张澜告诉他们说：“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不能再作调人。”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5月初进抵上海近郊。

国民党当局因张澜、罗隆基在被软禁中坚持革命立场，命上海警备司令王新衡派警察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将张、罗以转移台湾为名，中途处死，抛尸海中。幸中共中央已经指示上海地下党设法营救。地下党策动对蒋介石不满的前淞沪警备司令杨虎营救。杨虎应承后，获悉王新衡系派警备第三大队副阎锦文执行，而阎系杨虎的旧下属，便嘱阎营救，并派得力亲信潘云龙、庄儒伶二人充当警备队员协助阎锦文。阎率潘、庄二人以押解张、罗为名，将他们接出疗养院，乘坐的吉普车转向北街小巷摆脱追兵，然后弃车步行，命二人分别背上张、罗，穿院越墙，到达环龙路杨虎公馆，安全脱险。

5月24日，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27日傍晚，解放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前来看望，慰问张澜、罗隆基。

30日，民盟北平总部临工会电慰主席张澜等上海脱险。31日，沈钧儒电请主席张澜来北平主持盟务。

6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致电张澜，欢迎张澜、罗隆基“准备来平”；“共同致力今后建设工作”。

14日张澜、罗隆基到达北平时，火车刚到前门车站停下，周恩来、朱德、郭沫若等便出现在车厢门前了。张澜由女儿搀扶急忙下车，周恩来迎上前来紧紧握住张澜的手，频频摇动，连声说：“你们为我们担了风险，吃苦了！吃苦了！我曾命令解放军和地下党赶快营救，总算见面了。”朱德是张澜昔日在四川南充办学时的学生，四十多年后再见老师，当即举手敬军礼，表示敬意。

张澜下榻北京饭店后，毛泽东次日亲自来看他。行前要换衣服，工作人员取出一件来，为难地说，有一个补丁。毛笑说，可以。张老先生一生清廉，衣着俭朴，和我差不多。见到张澜寒暄后，毛泽东含笑说：上海《申报》报道的，表老对合众社记者关于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谈话，我是同意的。现在不能公开讲就是了。张澜哈哈一笑。毛泽东请他次日去中南海家宴，俭朴的四菜一汤，张澜事后赞赏说：“这正是共产党伟大之处。”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张澜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在会上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开国大典。

张澜清廉公正，闻名乡里，有“川北一圣人”之美誉。任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参加开国大典，也不同意做新衣服。年近80高龄，夫人要来京照顾他的生活，周总理得悉后为他安排较宽敞的住宅，他嫌太大，谢绝了。规定的警卫和服务人员编制，他要求减少一半，被誉为“中央人民政府艰苦朴素第一老”。其清廉高洁，一以贯之。苏联送给中国5部新轿车，毛泽东亲自关怀，指示配给张澜一部，他一再推却。后来，周总理亲自上门做工作说：“表老怎么留恋一部美帝的破旧汽车，不许换苏联赠送的新车哟？”说得他哈哈一笑，这才同意换新车。

1955年2月9日张澜在北京逝世，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视含殓，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举行公祭大会，刘少奇主祭，林伯渠致悼词，表示“中国人民感谢张澜先生在爱国运动中的贡献”，盛赞“张澜先生不朽！”黄炎培致哀词，颂扬张澜“一生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由刘少奇、周恩来等执绋，护送灵柩至八室山革命公墓隆重安葬。（责任编辑 萧 徐）

李敷仁：传播百姓的声音

● 李纪阳

李敷仁先生 1899 年出生于陕西咸阳县一户贫苦人家。1937 年，他创办《老百姓》报，名扬中外。但由此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监视，不断追踪。1946 年 5 月 1 日终于在西安被秘密绑架。在狱中，他正气凛然，视死如归。后被敌特押送咸阳秘密打两枪，头部重伤，幸未击中要害，被我地下党员营救，护送至陕甘宁边区马栏，后送往延安。1946 年 8 月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同年 9 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任命李敷仁担任延安大学校长。他继续献身人民教育事业，为党培养了大批优秀青年干部。

我从 1938 年认识李敷仁先生，很喜欢看李先生编写的《老百姓》报，并专门收集。本文记述了我了解的一些事实。

三次办报

1945 年 4 月，在陕西民盟领导杨明轩（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具体指导下，成立了西北民主青年社，指定李敷仁、武伯纶、王维琪、张光远、郑竹逸组成五人小组，作为民主青年社的领导机构。1945 年秋，民青成员集体加入民盟，加强了民盟的活力。李敷仁先生还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思想的崇拜者，陕西省生活教育社的领导人。

早在抗日战争开始，李敷仁先生已是中国共产党员。在西安师范任教时，与该校著名教师郁达夫（《创造社》领导人之一）、武伯纶（历史学家）、何寓楚以及西安二中教师张寒暄（著名歌曲《松花江上》词作者）、张光远、郑竹逸、田克恭等共商创办通俗报纸《老百姓》报，宗旨是为

老百姓说话，说老百姓的事，把抗日战争、世界大事，老百姓的痛苦等等，简明扼要地告诉老百姓。

办这份报，困难很多，没经费、没房子。于是他们几位省吃俭用，自掏腰包筹集资金。西安师范校长、人民教育家石雨琴为这份报纸进行个人捐资，并为办报腾出房子，大力支持。李敷仁、武伯纶、郁达夫任编委，何寓楚任经理，田克恭任发行人。《老百姓》报于 1937 年 11 月 12 日在西安师范创刊，开始为旬刊，后改为周刊。

西师（西安师范简称）几个学生也参加了编辑、出版、发行工作。

《老百姓》报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宣传民主团结，反对独裁专制，反映老百姓的痛苦生活，从而受到广大老百姓的热爱。报纸销往 13 个省和苏、英、美、法、加、匈、瑞典等国。

在陕西，进步学生很喜欢这份报纸，组织宣传团到各地农村时，带上这份报纸，散发给广大农民；有的学生到延安去，带《老百姓》报，发到边区。当时我在三原县武字区做农村工作，常常买《老百姓》报，发给农村识字班和农民夜校，博得农民读者的喜爱。我教农民顺口溜“苜蓿牙儿拌拌汤，日本死到河岸边（日寇打到黄河边，企图进犯陕西），唱歌中有盼的是油泼辣子沾蒸馍，盼的是穷人改善生活……”，都是李先生编的词，男女老少都会说会唱了。

《老百姓》报共出刊 113 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视《老百姓》报为眼中钉、肉中刺，于 1940 年 4 月被勒令停刊。

李先生不甘心，又出刊《农村导报》，只刊出 6 期又被查封停刊。接着，李先生主办《民众导



李敷仁 (1899—1958)

报》，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有名望的人士担任“特邀兼编辑”《老百姓》报又复活了。

日本投降后，内战开始，李敷仁先生在西安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国民党特务给他的信中装了一颗子弹。《老百姓》报的发起人之一武伯纶先生被捕了。1946年4月30日蒋介石来西安视察，在陈立夫、陈果夫领导下的陕西狗腿子王宗山，禀告蒋说：“《民众导报》主编把一些青年学生都拉拢过去了……”于是大肆搜捕编辑人。《老百姓》报的编辑、西师学生常奋坐牢后生死不明，董鸿儒，共产党员，为办《老百姓》报费尽心血，1940年被捕，押在西安劳动营，他坚贞不屈，在狱中两年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出狱后就撒手人寰。

脱险进边区

1946年5月1日，李敷仁先生在西安被特务秘密逮捕。李先生被捕后，正气凛然，视死如归，在敌人淫威下，不呻吟，不求饶。随后押到咸

阳二道塬上一个壕沟里，打了两枪，还在他身上踢了两脚，认为打死，便扬长而去。李先生夜间被当地群众救出。

次日，消息传至马栏中共陕西省工委后，工委书记汪锋即派韩夏存出外营救。

原来，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区形势恶化，省工委派韩夏存到西安联络暂时中断的共产党员关系时，给在西安的李敷仁当面说，要他记住，派人来找他时，只要说他就是李云实，就是他恢复关系的联络人；还告诉李先生：“我叫韩夏存，名字已改为唐磊，以后就用这个名字直接和你联系。”李先生又惊又喜。韩是他的学生，称赞韩是后起之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后，他俩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党的重要指示，都是由唐磊传达给李先生的。

李先生被枪击后，韩夏存一路打探消息，和地下党员王维琪见面知道消息后，赶到礼泉县康家店地下党员康子安家中却被生人发现，遂转到另一个地下党员王章家中。李先生在危难中，忽然听到唐磊的名字，两人见面后悲喜交加，李万万没有想到，韩夏存来到他的面前。他挣扎着想坐起，韩箭步到炕边，按住他，不让起来。韩紧紧握住李的手说：“你受苦了！”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商定，买来一副棺材，找些知情人，举行了吊唁仪式，把棺材埋了，以示李先生已丧命九泉，敌人就不会来找了。这件事传遍关中，说这是共产党反敌特的最高艺术创造。

接着，韩夏存向李先生传达了省工委书记汪锋的问候，传达了陕西省民盟主要领导人杜斌丞和杨明轩的问候，还从西安带来云南白药、消炎散、药棉、纱布等。李先生无限感激。

韩夏存，礼泉县人，熟悉这一带的敌情和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即刻把李先生安顿在自己家中。已叫他在家的妹妹刘云购置了药品，说是他未婚妻的父亲要来。每天韩亲自洗伤换药，后来转移到赵廷芳家。赵是礼泉县国民党保警大队手枪班班长，韩的哥哥韩竞存是县保警大队队长，都是亲属，政治可靠。赵家住在往边区去的浅山小村庄，人烟稀少。省工委派来了姜医生为李治伤，静养半月，伤口愈合，体力恢复，可以行走后又转移到另一家。最后由韩夏存安排护送到边区马栏。

同年夏,蒋介石在庐山见到美国特使马歇尔,马歇尔问老蒋,说李敷仁在咸阳被暗杀已死,为何到了延安,问得老蒋张口结舌。

编写现代《诗经》

抗日战争期间,李敷仁先生在西安国立兴国中学教书,他的学生王泓,后来在北京写作出版《人生漫记》,其中记录了自己当年在兴国中学帮助李敷仁先生整理民歌、民谣,结成亲密师生的故事。

据王泓记录,李先生在校讲课、讲演、写文章,他的语言都很丰富、通俗、生动、幽默、简练、泼辣,深入浅出,极富哲理,堪称语言学家。

李先生说:我们要为老百姓说话,人民是源,官吏是流,万不可包办民意,强奸民意,人云亦云,本末倒置。报纸的读者是老百姓,老百姓是社会的基础,要办好报纸,就要牢牢依靠这个基础,与基础共鸣。报纸办得好不好,只能老百姓说了算,受老百姓的检验。要加强与读者的联系,文章、形式、语汇要读者喜闻乐见。只要读者支持,任何攻击、压制都不要畏惧,世上的事有对立面比没有对立面好。

民间文学,苏联叫“口头文学”,民间文学有散文、韵文之分。歌、谣、谚、谜、曲、歇后语都属民间韵文。老百姓多爱韵文,好听、好学、好记,这是李先生情有独钟的原因。

李先生在校讲《公民》课时,说到“公民”是贴在人身上的政治标签,使人想到封建时期的“顺民”,日寇占领区的“良民”,而民者,普通老百姓也。人,要分清善恶邪正,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说,古人把人分三等:一等是于世有益的人;二等是于世无害的人;三等是于世有害的人。这个等级,不是由地位高低,钱财多寡来决定的,而是由人格是否公正,是否善良,是否为了人类做好事谋利益来决定的。离开了这些,他的官再大,钱再多,即使是委员长,百万富翁,只要你为私,邪而不正,你也是三等货。

王泓在兴国中学上学时,就知道李先生搜集民间歌谣的事,他们那一代学生几乎人人都参与了这一活动,持续数年之久,这期间搜集民谣已达到高潮。一次作文课,题目是《论诗经》,王泓

把李先生搜集的民谣和《诗经》的国风来自采风联系起来写,语文老师看后夸他的文章写得好,他拿给李先生看,李也夸他写得好,还了解到王泓喜欢民歌民谣,李先生便要王泓课余帮自己整理他已搜集好的民谣。王泓看到李先生搜集的民谣装满了一柜子,十分惊喜。从此,师生成为忘年交,王经常在深夜和假日整理、编排,有的重抄,有的拿到老百姓家调查核实,有的剔除封建迷信糟粕。王泓从而受到很大教育和锻炼,影响了他的一生。

下面记录了一段民谣:

尖尖帽,桃红缨,娘说话来我不听,媳妇说话笑盈盈,先拨火,后点灯,再给媳妇骚个情。亲娘想吃水花梨,还没钱买灶羹,媳妇想吃水花梨,备上鞍子骑毛驴,半夜起来就上集。一连上了三回集,才得买个水花梨。捅在袖筒里,拿在绣阁里,双手递给我的妻,妻呀妻呀你快吃,老娘看见生气哩!娘呀娘呀别生气,将心比心都一理,我爸在着也爱你,清油调进苦曲菜,谁的媳妇谁不爱。

多么生动、幽默、辛辣、上口啊!

当年谈到民谣的起源时,李先生说:我国民间歌谣源远流长。《古谣谚凡例》记载,歌谣在文字产生前就有了,只是有文字后才记录下来。这种民间文学,内容极其丰富。《诗经》就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风诗主要是民间歌谣;《小雅》中也有歌谣。歌谣是《诗经》最重要的部分。民间歌谣的特点是: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愿望,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历来为人民所喜爱,常用来美化语言。先秦时代就重视收集民间歌谣,有的安排专人采风,有的设立“乐府”专门搜集民间歌谣,以了解民情、民心,因而流传下来《诗经》、《汉乐府》等多种文化瑰宝。古人云:“谣者,民口也,明镜也”,把民间歌谣看作政治的一面镜子,这在古代和现代都十分必要。特别在缺乏言论自由的国家和时代,民心、民意、民情唯有通过这种特殊形式折射,或针砭时弊、或自我解嘲,都反映出时代的风貌。民众的聪明才华,也从这些口头创作中得到展示,某些作品甚至具有永恒的价值。

李先生把整理出的民谣民歌分类集中起来,比如,儿歌、夫歌、妻歌;人生、家庭、社会、国家;农业、经济、文教、行业等等。他发表过《歌谣起

源论》、《 谚语起源论》等文章 ,还打算将收集起来的民歌民谣分册出书 ,并考虑先出一册人生方面的书 ,按人生的生老病死编辑 ,最终汇编成一部现代《 诗经》。这个美好的愿望 ,后来由于他身处逆境 ,原稿大量丢失 ,终于未能实现而遗恨千古。

继续献身教育事业

李敷仁先生到达马栏的当天 ,省工委书记汪锋、统战部长吕剑人、组织部长王俊等迎接他。他激动地说：“ 党和同志们这样关心我 ,我遇刺后 ,没想到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 ,第三天就派人来营救我 ,我终生难忘！”

敌人杀害他的子弹在身上尚未取出。党中央很快从延安派来中央医院院长徐根竹 (后担任关中警备司令部卫生部部长)专程到马栏给他动手术 ,取出身上的子弹 ,治疗枪伤。党中央还发出电报慰问他 ,嘱咐他：“ 要好好休息疗养 ,恢复健康 ,然后到延安。”

1946年6月下旬 ,省工委用两匹强壮的骡子 ,绑成架窝子 ,请李先生卧在里面 ,派人送他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 ,7月24日 ,边区政府为李敷仁先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7月31日李先生致函民盟中央 ,揭露西安反动派妄图暗杀他的罪行 ,要求审判凶犯。同时 ,他把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民主进步人士和他的学生常奋、董鸿儒等被关进监狱惨死的事件写出 ,刊登在延安《 解放日报》上。

8月的一天 ,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李敷仁先生 ,高度赞扬他 “ 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怕牺牲、为老百姓办报的精神 ” ,勉励他养好身体 ,继续为革命奋斗。他感动地说：“ 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 ,要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继续奋斗到底!”

9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他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 ,在延安大学培养了众多的优秀年青干部。他们毕业后奔赴各地 ,深入实际 ,深入群众 ,为新中国建设贡献青春活力 ,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

1958年2月19日 ,李敷仁先生病逝 ,享年59岁。
(责任编辑 吴 思)

(上接 28 页) 钱思亮和吴大猷曾先后是旧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 ,张存浩曾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等等。这项人才业绩的统计材料是纪念南开教育事业百年辉煌的最好礼物。

下面提供一个统计图表 ,记录天津、重庆南开中学院士工程的辉煌成果 ,可以说明南开的教育精神是百年传承持续发展的。

1935 年—1937、1938 年—1945、1946 年
津、渝南开中学院士工程一脉相传

天津南开中学		
1935	叶笃正 关士聪 申泮文 刘维正 (美国工程院院士)	
1936	卞学璜 (美国工程院院士)	
1937	刘东生 涂光炽 张 滂 翁心植 (工程院)	
重庆南开中学		
1938	马杏垣 林同骥	
1939	钱 宁	
1940	徐 僖 夏培肃 (女)	
1941	朱光亚 郭可信 梁思礼 (天津留守) 邹承鲁 侯虞钧	
1942	陆婉珍 (女) 楼南泉	
1944	张存浩 任继周 (工程院) 李 坪 (女,工程院)	
1945	何曼德	
	天津南开中学	重庆南开中学
1946		陆钟武
1947		周光召 周 恒 王方定 杨士莪 戴乾圃 (欧洲)
1948		章 综
1949		林华宝 (工程院)
1950	刘宝君	温诗铸 (工程院)
1951	孙大中	毛二可 (工程院)
1952		孟兆祯 (工程院)
1953	王大中	戴锦锟 (美国科学院)
1954		张仁和
1955	王静康 (女,工程院)	曾恒一 (工程院)
1967	程津培	
教师	杨石先	魏荣爵 冯元祯

(作者系中科院资深院士、南开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方 徨)

我认识的华君武

● 涂光群

人格魅力

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杂志换了领导班子,邵荃麟任主编,严文井当副主编,主持常务。他们决心改变《人民文学》的面貌,包括封面设计、装帧及增加美术作品插页,以使刊物从里到外给读者、作者以新观感。两位领导决定请一个美术顾问。这位美术顾问就是漫画家华君武,严文井在延安鲁艺和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日报社的长期同事。编辑部还需要一个经常联系华君武的人,领导让我做这个工作。但我既未学过美术,也不懂美术这门艺术,所以够不上“美编”,只能叫做为组织画稿跑腿并不时请教华君武同志的人。

我认识华君武的时候,他是《人民日报》的美术组长,与诗人袁水拍共同负责《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工作。从1953年起,他又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他是个顶忙的人,一周上班要穿梭来往于两个单位。我每回去他办公室,都见他们门庭若市。但他总是笑脸迎接八方来人,跟他们耐心说事。我这个他老同事严文井的小部下,他也是亲切相待,面带微笑,称我涂光群同志。不管怎样忙,他总能抽出时间,有条不紊地来过问我的事,从没见过他不耐烦过。或写张条子,让我去找美术单位某个人借一张他推荐的《人民文学》要登的某画家新作的底片;有时告知我,美院正在举办一个内部画展,值得一看,要我去看看。美协秘书长这一岗位,华君武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一直干到1966年;而身处这一岗位,他也是美术信息最灵通的一个。

在这之前,我与美术界从无接触,在华君武和美协工作人员推荐介绍下,我有机会去美院和美协几个宿舍区,走访了当年能见到的北京最有名的新老油画家、国画家、木刻、版画家、雕塑家,甚至美术史家和评论家;看了美院、美协举办的一些最好的中外美术佳品展。还有外地一些势头很好,常有佳作面世的画家,他也介绍我联系。他的关照周到、细致,使我得以较快地了解熟悉情况,较顺利地完成任务。他这美术顾问当了几年,除了出力《人民文学》没有登出他这位名家顾问的名字,也没给他一文钱所谓报酬。

华君武同志是个非常好接近的人,工作之外也爱开点玩笑,没有一点领导架子。记得有回我去美协,他刚从福建归来,悄悄送我一包福建龙虱,让我吃吃试试。我打开一看好像一堆堆油炸过的香喷喷的原装“知了”,吃时感觉酥而香。我带回人民文学编辑部,当众吃了一两只,伙伴们大吃一惊,说我这人真是不怕脏,竟然吃土鳖!

后来他不做美术顾问了,我便少有机会去美协了,但有时在文艺界的会议场合,还是能见着他。偶然也请他为《人民文学》的小说插图,如四川作家马识途的一篇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就是请他作的插图,效果甚佳。

“文革”初期,他遭受了造反派冲击,主要是攻击他从1961年开始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上连续发表了数年的“人民内部讽刺漫画”,他被打成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高潮时,报纸甚至用一整版篇幅来批判他这些漫画。我知道他处境艰难,因此颇惦念他。1968年秋天中国文联系统的人都去昌平一个良种场劳动。有天下午突然通知早收工,各个协会的造反

当权者将文联各协会的“牛鬼蛇神”集合起来，带到当地一个大礼堂集中示众。我是作协“牛鬼蛇神”队伍中的一员，我不太在意示众，因为这么多“牛鬼蛇神”，不会感觉孤单。倒是急切想看到美协的“牛鬼蛇神”队伍里，我阔别数年、熟识和尊敬的美协原领导人蔡若虹和华君武。我果然看见他们走过来了。我仔细观察华君武，觉得他的头发有一部分像是出现了灰白色，想到他目下的处境，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不知他是否看见了我。漫长的“文革”中，也就这样见到华君武一回。

1973年我从干校回京。大约1976年上半年，我打听到华君武住在朝阳门大街的一处普通居民楼里，我去他家看望。房子住得比较挤。值得庆幸的是，华君武和他的家人，身体都还健康。“周扬一案”自从毛主席讲了松动的话后，周扬放出来了，其他受“中央专案组”审查的文艺界人士，也陆续松动了。估计在这个背景下，华君武回到家中。那时“四人帮”还未倒台，政治气氛森严，我们未便多说。

“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君武同志恢复了工作，任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同时又是新当选的美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书记。那十多年我几乎没有去打扰华君武。1998年接近岁末，我接到华君武同志寄给我他的漫画展请柬，请柬写道：“兹定于1998年12月21日上午10时，在中国美术馆中央大厅举行《华君武漫画展》开幕式”……我真是惊喜不置。我注意到请柬一角，还写有“愚辞花篮”四个字，可见君武的作风是多么朴实。

漫画展非常了不起。131幅漫画精彩纷呈，展现了他从30年代至90年代末，半个多世纪漫画艺术的劳绩、丰硕的收获。百分之七十多的作品，是他70年代末期复出后，1980至1998这将近20年的新作。

看了漫画展后，我心里涌起许多想法。2000年农历冬至那天，我去他家看望他。这天他亲自画了一幅漫画，他1982年的佳作《老鼠吹牛》赠我，写了一段发笑的文字，最后他写道：“世上凡爱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均如此鼠。光群老友一笑”。他还赠我1955—1982，1983—1989两册汉英对照的他的漫画选，赠给我上海的学林出

版社1998年3月第二次印刷的他的文集一本。他谦虚地取名《补丁集》。本书后边还附有作者各个时期漫画一百幅，实际上囊括了作者相当一部分代表作。

三年多时间过去了，我反复读着华君武的画作及文字，回想他这个人。最近方下决心，写点我对华君武其人其作品的片断感受。

从漫画看漫画家

从40年代至50年代，华君武无疑是创作时事政治讽刺漫画的佼佼者，他创作的蒋介石脸贴一方上海流氓爱贴的黑膏药，“画龙点睛”，生动传神的系列形象，从1947年的《磨好刀再杀》到50年代后期蒋想“反攻大陆”，躺在台湾那狭小“澡盆”里狂喊时的《热昏》，海内外几乎无人不知。华君武是政治讽刺漫画的高手，这已有定评。当然他不仅仅是画政治讽刺漫画，早年也画社会风情漫画，如1934年他在上海时期发表的《江北大世界》，一张画上画了那么多活跃的小人及场景，就很有看头。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讲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残存的旧思想、习惯，尤其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主义思想和某些陋习，还在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这些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阻力。华君武及时思考了这个问题，他开始了漫画创作新征程，花了不少工夫来尝试他那时取名的“人民内部讽刺漫画”，如1957年2月创作的《风信鸡》，尖锐地讽刺了“今朝东风险朝东，明朝西风险朝西”的风派人物。1959年3月和1961年二三月创作的《疲劳过度症》（龙王、王母、嫦娥、孙悟空都累倒在病床上，护士说：“画家同志，请你画别的东西吧，他（她）们不能为你出差啦！”）、《公牛挤奶》、《无效劳动》（两个人划船各向相反的方向划）、《误人青春》（主持者离题万里的冗长发言：“我感到我的同伴们都苍老起来”，胡子巴拉，头发长，变成了老汉、老婆婆）等作品，反思并辛辣地讽刺了58年大跃进的主观冒进、浮夸等不良作风。他经过一番思索（包括自我反思）和实践，愈加明确了内部讽刺漫画的作用，正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他通过精确的手术，

不伤好的肌体,而剜去人体因不洁长出的危害身体健康的疥疮之类。然而这样的治病促健康的行为,在反右扩大化之后,“万花纷谢一时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的漫画家因其漫画被打成右派。

华君武的漫画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过了一阵子,组稿人却希望他用漫画来正面表现“形势大好”。华君武对此仍然头脑清醒。他深知,漫画如同相声,它是一门讽刺艺术,它在使人一笑之中,自觉地配合医生疗疾,或抖搂自己身上沾的灰尘。如果丢弃讽刺,那就不成其为漫画或相声了。华君武1959年曾画过一幅《听相声》,画着一对夫妇在家中苦着脸收听相声,而他们的孩子已经睡着了。这大约是讽刺当年不让人笑的失去了讽刺功能的某些“相声”吧。既然他不能勉为其难地接受组稿者的新要求,就只好暂时停止向他们寄稿。然而社会上还是有有识之士欣赏、理解华君武的内部讽刺漫画,于是1961年又在该报“东风”副刊连续登载华君武的漫画,持续数年,直到“文革”前夕。华君武这期间的漫画,可谓蔚成大观,华君武关注国情、民情,他为内部讽刺漫画或曰社会生活漫画,闯出了一条可资借鉴之路。

这些60年代的漫画,大体可以归纳成六个方面。

1、讽刺偏离实事求是,违背真理的“左”的思想行为。如1961年作的《杜甫检讨》。中国古代最关心民生疾苦的大诗人杜甫,满脸愁容地握笔思忖——《兵车行》乃和平主义思想?华君武对我讲,当年北京确有某大学忽然发起批判《兵车行》,说作者犯了分不清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和平主义思想”错误,将现代观念硬套在杜甫身上。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以来不断地搞大批判,指导思想越来越“左”,直弄得学术、文艺界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华君武非常了解当年知识分子的心境,

深刻地感受了极“左”思想对学术和文化健康发展的危害,而用漫画讽刺之。

2、讽刺、批评国人多年沿袭下来的陋习。如《好大的痰盂》(游泳池所见)、《生根》(占着公用电话亭的电话说个没完)、《公园小景》(爸爸驮着儿子去攀折树枝)、《散戏的门口》(堆满垃圾)等这类许多人司空见惯、甚至见惯不怪的情景——不讲公共卫生和公共道德,我国人群中的陋习,华君武用生动、逼真的漫画讽刺了,就是为了提醒公民们应养成良好的公共道德。

3、讽刺官僚主义作风和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如《保险走路法》(踏着别人的足迹前进)、《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如同襁褓中的婴孩)、《盲目加工》(画蛇添足)、《差不多》(打靶只在靶周围,不中靶心)、《科学分工?》(两人吹一根笛子——人浮于事)、《请抢球》(不去致力于问题的解决,而是互相扯皮打架)、《洗脸盆里学游泳》、《看操季节》、《干洗》(讽刺某些人不认真去实践)、《所以不离开疗养院》(某些人小病大养,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等。

4、社会生活中相当普遍的一些现象,人们习见无睹,而作者画之,引起治疗的注意。如《燎原》(讽刺抽烟之风扩散之势)、《大‘小家庭’》(讽刺不节制生育)等作品。

5、讽刺文艺、学术界在创作、研究中常犯的毛病。这一领域中的某些现象自然是华君武相当熟悉的,如《咏美女老调》(讽刺文艺创作中的



2004年5月,华君武(左)在家中与本文作者合影

千篇一律:描写姑娘总是长长的辫子,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银铃般的笑声之类)、《过誉的评论》(给稀发的老头儿喷洒香水——“不管作品质量如何,而一味吹捧”)、《滥竽充数》(不仅讽刺上操)。

6、多义的,哲理性漫画。如《决心》(没有恒心戒烟的人)、《不必去害怕不认真的人》(兔子指着吊儿郎当的猎人对它的伙伴们说:别怕,他平时不练枪的!)、《熟视无睹》(明明写着“此站暂不停车”,还有不少人在那儿排队等待),都是这类佳作。这样的漫画耐咀嚼。

总之,60年代,是建国后华君武创作漫画的第一个高潮。

80年代以来,作者的视野更加扩大了,佳作迭出。《一言堂造主像》、《不称职的理发师》、《拖到没有》等,尖锐地讽刺封建残余思想、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讽刺不顾中国国情,盲目崇洋媚外;“引进”国外“洋垃圾”等社会现象;“疑难杂症系列”、“生活拾趣系列”、“猪八戒系列”更是漫画家与时俱进、独一无二的创造。很多作品让人过目难忘,如《某文人弄潮图》、《人留名,狗留尿》、《皇后的新衣》、《曹雪芹提抗议》等,难以细列。

我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建国后华君武第二次漫画创作高潮期。

人品和画风

华君武幼年时父亲去世,家庭景况不好。他有绘画天分,上初中就喜欢漫画,并且向当地报纸投稿,投寄了两百多幅漫画后终于被选中一幅,这对于一个15岁孩子是极大的鼓励。但是他没有条件去美术专门学校深造。他成为漫画家是靠自学成才。1933年他去了上海,仍在中学上学,在这里,投稿和钻研漫画艺术的条件好多了,有登幽默文章和漫画的杂志,还有两份漫画刊物。他从阅读中开阔了眼界,提高了绘画修养。因为投稿,他渐渐认识了前辈漫画家,著名的有丰子恺、叶浅予、张光宇、鲁少飞等人。尤其是丰子恺先生,平易亲切、谦逊待人;他漫画的简朴易懂,深入人心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对青年华君武产生无形的影响。此外,外文书店还有些外文

报刊登的一些外国漫画家的作品,华君武也不放过机会去学习借鉴。据他自己讲:“我最喜欢两位未见过面的老师,一位是上海《字林西报》的萨巴乔,他以创作国际时事漫画为主。他的漫画线条之流利、造型之夸张,都令我倾倒。另一位是德国漫画家卜劳恩,他的《父与子》构思极妙,幽默感强,构图和人物造型简练,对我影响也很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激起了少年华君武对侵略者的仇恨,学校成立了学生义勇军,他和同学们拿着军棍操练,表达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决心。1933年他在上海求学,更是在报刊上发表《报告!我何时失踪?》等讽刺漫画,揭露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他深感民族危机深重,要找寻一条抗日救国的新路。正在这时,他的好友黄嘉音给他看斯诺的《西行漫记》,书中用大量事实真实地介绍了红星照耀的西北一片新天地,空气新鲜,人和人的关系平等,呼吸是自由的,而共产党和红军是一贯主张抗日的,澄清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动宣传长期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他引动了华君武对新天地的向往。

一年多后,上海沦陷。华君武瞒着家庭亲友,在黄嘉音支持下,秘密乘船离开上海,到香港。又从陆路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中国抗日堡垒、陕北的延安。从此开始了他既富有理想又脚踏实地的战斗学习生活。有一回他和一位作家、几个画家应邀到毛主席那儿作客,当面聆听毛主席对讽刺艺术的见解。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文艺家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深入群众生活,艺术要有民族风格,要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等,都深深地启示了他。延安时期,限于当时物质条件,漫画的创作和发表不多。1946年至1949年,他在东北日报社工作,他的时事讽刺漫画一发不可收。尤其画反动头子蒋介石的形象,更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海内外影响很大。

华君武很有个性。我觉得他从小到大到老,始终童心未泯,喜欢找乐,活得自在。在《补丁集》“往事琐忆”里,他极坦率地写了延安“鲁艺”时期,他用干马粪取代近似马粪的一种旱烟逗同事的小“恶作剧”,然后告知被逗的人,以“挨一顿骂”而化解之。还有篇写“文革”时期干校生活的《烧鸟华》,题目就是逗趣的。北京小吃

的品牌,很多人都知道有个“馄饨侯”,而华君武自我解嘲接受别人给他取的外号“烧鸟华”。原来这是他干校后期的苦中作乐,与人合作逮知了”,串起来烤着吃,后来还“得寸进尺”地逮麻雀,用作料腌了做成红烧雀肉,成了人们争来品尝的美味。“烧鸟华”从此名声大震。老华那时已经接近花甲之年了吧,可是还保留着这样的童心。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漫画家。

在华君武看来,漫画家要提供笑料,又不失冷峻、深刻;在击中要害又逗人发笑之中,使人们认同画家批评的严肃性和他的苦心、善心。漫画这样的讽刺艺术,就是用作者眼中的光芒,来照射那些阴暗的角落,使人们看到那些黑暗、阴暗,而引起警觉。

华君武虽然性格开朗、风趣,但他律己甚严,很实事求是,有两个事情让我很感动。一是《天津日报》一位作者写的《华君武谈“农村三部曲”》一文,其中一句话讲华君武“经常和钱钟书老先生见面”。华说:此句“不确。一年也仅三四次。钱先生和杨绛都是学者,不希望别人去扰,故亦只在院子里散步时巧遇谈话。现说“经常”,顿时想起30年代流行的“我的朋友胡适之”,所以我也很怕报纸加油添醋。我倒想画一幅钱先生被“热攻”状的画。”这幅《先生耐寒不耐热》的漫画真精彩,画钱先生在澡盆旁难耐头顶上的“钱钟书热”水蒸汽。同时也澄清了那位作者对读者的误导。二是华君武对一个作者一稿多投登在某传记和某喜剧杂志上“胡编乱捧”华君武的文章,做了公开的彻底的更正,并配漫画《何方尊神?》《我就是自传里的你》。这位作者的“西洋景”,在人们一笑之间被漫画家戳穿了。

作为一个漫画家的华君武,他还有两点是我欣赏的。他在《漫画要有感而画》短文中说:“漫画和其他文艺一样,要有感而发。”请读者注意他接下来的一段话,我用黑体字将它抄录:“但这些感触并不只有作者才有,他必须和多数人共感,漫画才起作用,否则就是无病呻吟。漫画作者并非天生特别善感或敏感,他需要从读者群众那里得到支持和启发。我的许多作品就是从读者(包括领导人和群众)的意见中得到启发的。”这是对艺术的真知灼见,我很赞成。不仅华君武成

功的漫画艺术作品。我认为一切伟大、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都要源自许多人的共感。

第二点,他谈到漫画的普及,仍是说“首先是作者和读者有一种共同思想和感情,否则就无从普及”。

拥有最多读者群的漫画家

2004年5月14日,我与老伴应约去看了华君武同志,89岁的老人,虽说腿脚有点不大方便,但头脑依然清晰,眼睛能看字,笔下仍能写作。他告诉我,一天要给人写三四封信,读者寄给他的信不少。他一般每信必复。他觉得这对健康有益。

君武送给我2003年5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华君武集》共十卷,其中五卷是漫画作品,四卷是文集,还有最后一卷是影集。这是一份珍贵厚礼。他听说我老伴学画自娱,还送她画册。

回到家,我爱不释手地翻阅《华君武集》。我统计一下,五卷本漫画集共收漫画1426幅。这样多产,是勤奋创作的果实。华君武可能是现仍健在的艺术生命最长的一位画家。从1930年他在《浙江日报》发表第一幅漫画起始,到五卷漫画集所收最后一幅他2003年1月画的彩色漫画《一览众山小》,他的艺术生命长达73年仍未衰竭。影集后面有一《华君武漫画展统计》引起我兴趣。上世纪90年代起,全国许多地方陆续举办华君武个人漫画展。这时华君武已近八旬高龄,仍然应邀参加。最让我感动的是君武关心着不容易看到他画展的工农兵大众。在城市展出后,他总是设法将画展直接送到这些人生产、战斗的地方去,如在上海,去了上钢三厂;在天津,去了塘沽盐场;在黑龙江,展览除在哈尔滨,还去了大庆油田,漫画在一个食堂展出,职工们端着饭碗,高兴地一边吃饭一边欣赏华君武漫画;在大连,华君武将漫画送到北海舰队,给海军官兵们观看;在成都,他将画展送到德阳县太阳村,开幕式时农民们以舞狮来欢迎他。

华君武爱他的观众、读者,读者、观众们也爱看他的漫画。我认为他是继丰子恺先生之后,作品最普及,最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中国漫画家。(责任编辑 吴思)

华人在古巴

● 孙光英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距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条长 300 多米叫“桑哈”的街道。街道两旁挤满了大大小小的中餐馆和各种各样的中国店铺，周围居住着近万名华侨、华人和华裔，这就是哈瓦那华人区，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都称之为“唐人街”。我曾经于 1997-2001 年作为新华社记者的古巴工作过 4 年，期间多次踏访。

中国人移民古巴史

首批中国移民 206 人是 1847 年 6 月 4 日作为“契约华工”从厦门乘船抵达哈瓦那港的。1492 年 10 月，哥伦布发现了古巴，于是这个美丽的加勒比岛国从 16 世纪起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盛产蔗糖。在 16-17 世纪，西班牙庄园主都是靠从非洲买进黑奴来从事甘蔗园和糖厂劳动的。19 世纪初，英国率先发起废奴行动，西班牙在英国的压力下只好停止买卖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弥补劳动力的空缺，西班牙人接受英国的建议，开始从亚洲移民，这些中国移民都是受骗被人贩子转卖到古巴和其他加勒比国家的。在哈瓦那的博物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当年华工的卖身契，“契约”的期限为 8 年。由于华工都是给庄园主卖苦力，因此，后来在西班牙语中就有了“苦力”这个词，表示早期中国移民的意思。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来古巴的华工不断增多，1870 年，古巴政府宣布废除华工的“契约”，在古巴的“苦力”都成了自由人。勤劳的中国人在古巴的境况日益改善，成了餐馆、旅店、咖啡馆等行业的主人。19 世纪中叶，由于美国歧视移民的政策，大批华人从芝加哥移民古巴，1874 年，在古巴的华人达到 10 多万人，哈瓦那华人区成了美洲最大，最繁荣的华人区。当时的桑哈街上除了各种中餐馆和中国商店，还有好几家电影院、戏院和麻将馆；华人区建立了中文学校、医院和养老院，并且在哈瓦那的国家公墓里买下了自己的墓地——中华

总义山。广大华侨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于 1893 年 5 月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中华总会馆，它是拉美国家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侨团之一。20 世纪初古巴独立，在中华总会馆的影响下，各类华侨组织纷纷出现。

1959 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胜利后，以私营业主为主的华人华侨大批离开古巴，前往美国和其他拉美国家，只有少数人留下。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侨逐渐死去，又没有新的中国移民到来，古巴华人的数量越来越少，华人社会日趋衰落，目前全古巴的华侨华人总共才有 1000 多人，华人区现在的居民大多数是华裔。

华人记功碑

在古巴，只要你走到街上，老远就会听到有人对着你高喊“契诺”、“契纳”！（中国人的意思）热情地与你打招呼。有的人甚至走上前来主动和你说话。古巴可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对华人没有歧视的国家，不仅如此，在那里处处都可以感觉到人们对中国的友好。古巴人对中国的良好印象，固然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古关系日益改善，越来越好，中国在古巴困难时期给予古巴无私的援助有关，但同时也是因为中国人在那里历来就有良好的口碑，在古巴革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华人的贡献。

在哈瓦那贝达多区利内亚街和“L”街交汇处的一个小广场上，矗立着一个高 8 米，粗 2 米多的黑色圆柱形大理石纪念碑，这就是有名的旅古华侨参加古巴独立战争记功碑。凡是中国重要代表团到访，一项重要的活动日程就是去那里敬献花圈，悼念那些为了古巴的独立而牺牲的中华亡灵。在 19 世纪古巴进行的两次独立战争中，广大华工踊跃参战，为了反对殖民统治，在战场上舍生忘死，英勇杀敌。不少华工智勇双全，战功卓著，成为起义军的中坚力量和指挥官。为了缅怀华侨

在古巴独立战争中的卓越贡献,根据著名的爱国者盖萨达的提议,在哈瓦那市区树立了一个华人记功碑。纪念碑正面刻着“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记功碑”13个大字。碑的背面底座上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用西班牙文刻着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战友盖萨达将军的名言:“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

中华总会馆

旅古华侨的最大社团组织是中华总会馆,它成立于1893年,是美洲国家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侨团之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旅居古巴的爱国侨胞就在中华总会馆的领导之下,积极捐钱捐物和购买爱国公债,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古巴后,中华总会馆同其他侨团一道,举行盛大庆祝活动,舞狮舞龙,广大侨胞敲锣打鼓,手持彩旗,参加游行,整个华区一片欢腾。

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美国的傀儡政府巴蒂斯塔独裁政权,1960年,古巴与新中国建交,旅古华侨社团的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华总会馆先后承办了侨胞向国内亲属的侨汇工作,开设了“中华药店”,扩建了赡养老侨的“中华颐侨院”,整修了华侨公墓“中华总义山”,等等,促进了华侨福利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经济上严重依赖苏联的古巴失去了其主要产品糖的出口市场和绝大部分必需品的进口来源,加上美国又加强了对古巴的封锁,古巴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国家进入了直到现在尚未摆脱的“特殊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尤其是最初阶段,生产几乎瘫痪,物资奇缺,尤其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十分困难。中华总会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开展工作,为帮助华人区居民解决生活困难,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桑哈”街上还有好几家电影院,中华总会馆经常从使馆文化处借来国内的电影片和录像带,免费向侨胞放映。

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总会馆还开办了汉语普通话学习班、学习太极拳和其他拳类的武术班,每当中国的重大节日或者国内有重要代表团来华人区参观时,会馆都要举行舞龙舞狮和武术表演;“桑哈”街上热闹非凡。华人区每年都要举行武术比赛,参加者从中小学生到白发苍苍的老人,比赛的内容有各种拳

类和擒拿格斗,也有老人参加的“导引养生功”。

邵黄将军

在古巴华人社会乃至当今中古两国的关系中,莫伊赛斯·邵·黄是不能不提的人物。他是古巴国家物资储备局长,革命武装部队少将,又是古中友协主席。他的中文名字叫邵正和。他的父亲姓邵,母亲姓黄,在古巴,人们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都称他邵黄将军。

邵黄将军的祖籍是广东省增城,父亲1895年与前妻关氏离乡背井来到古巴。关氏病故后他父亲与黄氏结婚,生有5男4女,邵黄是其中之一。连同关氏生的4个孩子在内,邵家共有13个孩子,邵黄排行第十二。

邵黄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青年组织的革命活动,参加了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斗争。1957年7月,邵黄离开首都哈瓦那前往马埃斯特拉山,跟随卡斯特罗在山上打游击,在起义军总部负责后勤给养工作。在山上,他结识了著名的游击英雄格瓦拉,后来参加了格瓦拉领导的解放中部城市圣克拉拉的战役,并且荣立战功。1959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后,邵黄在古巴革命武装部队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担任国家物资储备局长,负责国家的物资储备和军队的后勤保障,并被授予少将军衔。1992年他开始担任古中友协主席至今。

邵黄将军生在古巴,根却在中国。他热爱中国,为加强古中友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不辞辛劳地工作着。他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赞叹不已。在古巴,他除了接待来访的中国重要代表团外,还经常接见前去考察和经商的中国贸易团组和经商人士。在古巴的中国人凡是有了难以解决的困难都会去找他,他都会热情地想办法帮助解决。他还学习中国的样子,利用家中房前屋后的空地,搞了一个菜园子,自己动手种植蔬菜,在城镇居民历来没有自种蔬菜习惯的古巴创立了开辟家庭菜园的成功先例,在哈瓦那,几乎无人不知“邵黄菜园”。

在他的推动下,成立了华区促进会。这是一个隶属哈瓦那市,由华裔青年组成的政府机构,旨在推动古巴华人区的复兴和发展。邵黄将军说:“作为炎黄子孙,我的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对中国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理应为古中友谊而努力。”在他的努力下,古巴华人区的形势在逐渐好转,各项工作开展得生气勃勃。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历史上真实的和珅

● 冯佐哲

编者按：近年来有关和珅的影视作品颇多。但是同一个和珅，却是“一人千面”，“脸谱各异”，很多读者想知道和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本刊特请历史学家冯佐哲先生撰写此文，供读者了解和珅其人其事的一些真实情况。

一 家庭、出身与学历

“和珅”是他的“满语”名字的音译，如果译成汉文应为“三纲之纲”之意，其乳名叫“善宝”。他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二甲喇人。祖籍在长白山英额峪（今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地区）。和珅的先祖叫噶哈察鸾，很早就归顺了努尔哈赤（后金），过着平时狩猎、耕作，战时出征作战的生活。其五世祖尼牙哈纳，因作战英勇，为他家挣得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他的父亲名叫常保，也是八旗军武官出身，除了继承“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外，还因为他的堂弟阿哈硕色，在跟随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的战争中，在西北地区阵亡，追叙军功，他家又获赠了个“一等云骑尉”的官职，后来也由其承接下来了。常保一生最高做到“福建副都统”（正二品）的官位，相当于今天的军队中的“中将”级别的军官，这在当时也可以算是个“高级武官”了。常保的妻子（即和珅的亲生母亲）是河道总督嘉谟的女儿，其继妻是吏部尚书伍弥泰之女，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和珅的妻子冯氏是清乾隆朝名臣大学士英廉的亲孙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史（如《清史稿》等）、野史和传说中说和珅家庭出身“低微”、“贫贱”、“少贫无籍”……是不准确的。

和珅全家于顺治元年（1644年）随龙入关，住居在京师（今北京）内城；按照严格的八旗旗分制度，他家住在正红旗领地西直门内的驴肉胡同（民国后改为“礼路胡同”，今“西四头条”，离“广济寺”和“历代帝王庙”很近）。

和珅与比他小三岁的胞弟和琳（1753—1796）一起，开始在家塾中接受启蒙教育。在十二三岁左右，他们就一同进入了咸安宫官学。当时这是一座重点学校，坐落在皇宫西华门内，与武英殿比邻，它最初由雍正帝提议，内务府负责筹建，创立于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的一座官办学校。在乾隆年间，大约在校学生90人左右，学生全部是内务府官员和八旗官员的优秀子弟；教师则多由翰林院翰林充任。学生在校期间，主要学习满文（清文）、骑射和儒家的“四书”、“五经”等，此外，也还学习一些诗文、书法、绘画、蒙古文和藏文等等。在校学生由政府发给一定钱粮，作为学习补助。他们的前途无量，除了参加科举考试作官外，修业期满后，还可以充当“笔帖式”（满语为“巴克什”，即今天的“文秘”、“翻译”之意）、“库使”等工作，也是一条入仕的捷径。在此期间和珅由于聪明伶俐，才思敏捷，刻苦用功，经“童生试”被录取为文生员（即秀才），成为官学生中的佼佼者，他除了精通满文、汉文外，还掌握了蒙古文和藏文等多种语言文字；诗词、绘画也算不错。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又参加了戊子科顺天乡试，可惜没有考中。

二 君臣相遇，官运亨通

乾隆三十四年（1769），刚刚20岁的和珅承袭了他家“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不久就入宫当差，先后在“尚（上）虞备用处”和“銮仪卫”充当“执事人”（皇帝出行时的服务人员）和侍卫（亦称校尉，负责皇帝在皇宫、行宫等处以及出行时的警卫）。乾隆三十七年（1772）提升为三等侍卫；在此期间，虽然工作、生活比较艰苦一些，但可以不时接近皇帝，有讨得君主青睞的机会。这正如他自己在一首诗中所说：“莫嗟行役苦，时接圣人欢”。

在经过三年小心翼翼的“三等侍卫”生活后，到了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珅终于等到了在乾隆皇帝面

前一展才华的机会。关于乾隆帝发现和珅，传说有几种。有一种说法是说：有一天，乾隆帝“大驾将出”，仓促中怎么也找不到“黄盖”（皇帝出行时仪仗队用的一种“伞”），于是皇上生气问道：“这是谁的过错呀？！”只见底下的人都个个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地相互对望，一下子都傻了眼。这时和珅赶忙跑上前去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抬头一看，好一个“仪度俊雅”的美小伙，不觉怒气顿消。于是问道：“是何出身？”答对：“生员”。又问：“你参加过乡试吗？”答曰：“戊子（一说庚子）曾赴举。”又问：“何题？”对曰：“孟公绰一节。”乾隆帝说：“你能把你的文章背下来吗？”于是和珅便滔滔不绝地背诵起来，且声音洪亮，字字清晰，乾隆帝听后，龙心大悦。说道：“可以呀，完全能够中举啊！”于是君臣知遇便由此开始，遂派和珅总管仪仗，不久便升迁为乾清门御前侍卫，此后官位节节高升。另一种说法，与此大同小异：一日，乾隆帝“警蹕出宫”，在轿中翻阅“边报”，当他看到一篇奏文中提及有一个重要犯人逃脱，十分生气，便顺口说出《论语》中“虎兕出于柙”一语。当时扈从的侍卫和羽林军们听后，个个都惊呆了，不知皇上说的是什么？彼此交头接耳，相互询问。只见和珅独对曰：“爷（当时宫内人称乾隆皇上为‘老佛爷’或‘老爷子’）谓‘典守不得辞其咎耳’”。乾隆帝听后，非常高兴，一看身边站着一位翩翩美青年，便问道：“你读过《论语》吗？”和珅答曰：“读过”。接着乾隆帝又问了和珅的家世、年龄等等，亦对答如流，颇得上意。于是“恩礼日隆”，官运亨通。此外，关于和珅得宠的原因，还有一些离奇，而且荒诞不经的传说，大都不可信。

总之，和珅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得到乾隆帝的青睐、恩遇。再加上他聪明伶俐，眼勤手勤，善于逢迎，更善于揣摩乾隆帝意，日久天长，掌握了乾隆帝“喜谀而恶直”的心理，毕恭毕敬，哪怕听到乾隆帝咳嗽一声，他便能立刻把痰盂送上……这怎能不讨得皇上欢心！于是“恩礼日隆”，名冠朝列。从乾隆四十年（1775）和珅被任命为御前侍卫，兼满洲正蓝旗副都统开始，他的官位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乾隆四十一年一月，任户部右侍郎；同年三月，入军机处办事，授其为军机处行走；次月，又升为内务府总管大臣；同年八月，兼任镶黄旗副都统；同年十一月，又兼任国史馆副总裁，戴一品顶戴；同年十二月，赐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权，并兼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同时他家的旗籍也从正红旗抬入正黄旗，进入了上三旗。接着他家也由驴肉胡同

搬到德胜门内什刹湖畔（即今恭王府）。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把最心爱的第十女和孝公主许配给了和珅的长子丰绅殷德，从此乾隆帝与和珅成为了儿女“亲家”，两家结为了椒房懿亲，和家变成了皇亲国戚。也就是在这一年初，和珅奉乾隆帝命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获得成功；并提出了有关“设关”、“盐务”和“钱法”等改革建议；同时还对“清缅关系”、“清与安南（今越南）的贸易”的改善都提出了看法，深得乾隆帝赞赏。他在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与接待周边各朝贡国家使节上，显示了其才干，成为了“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的行家里手。乾隆五十八年（1793），夏秋之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庞大代表团访华，中英双方在觐见皇帝礼仪，以及英方要求派使臣常驻中国、开放港口、减轻关税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分歧。和珅禀承乾隆帝的旨意，与英国特使进行了艰苦而长期的谈判交涉，结果使英国人同意按清廷礼仪进行觐见。事后，连英国使节也不得不承认和珅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认为他在谈判中，“保持了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和珅的官位几乎是年年升迁，可以说高官作遍，风光享尽；他所管的范围越来越广，所辖的部门越来越



和
珅

多,权力也越来越大。他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起,至嘉庆四年(1799)初,前后担任23年军机大臣;以军机大臣又兼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卫戍司令”)22年;以军机大臣、步军统领,又兼户部尚书长达15年之久。他从承袭三等轻车都尉晋封为一等男爵,再晋封为三等忠襄伯,最后晋封为一等嘉勇公。他从宫内普通的“执事人”、侍卫,擢升为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掌管吏、户、刑、兵四部及三库、理藩院、内务府、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驷院、太医院与御药房等等事务。在经济上,他除了任户部尚书外,还控制着国家重要的进财口——崇文门税务监督这个要职。在军事上,他除了担任过兵部尚书外,还长期担任京师的步军统领等要职,并控制着火器营和健锐营等清军中执掌新式兵器的特种部队。在文化上,他除了曾担任《四库全书》正总裁外,还担任过《钦定大清一统志》、《钦定日下旧闻考》、清《三通》、《石经》、《清字经》和《热河志》等书的正总裁、总裁,以及经筵讲官、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殿试读卷官和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要职。这一切就意味着和珅当时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与文化等方面的大权独揽于一身,并对清朝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现象在整个清王朝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三 巧于经营,善于搜刮

治前半期,国力强盛,国库充裕,可谓“盛世”时期;但抵不住他中晚年以后毫无节制地挥霍和穷兵黩武,眼看着国库日见支绌,入不敷出。为了满足他好大喜功和粉饰太平的欲望,他非常需要一个善于理财,又能广开财路的人,而此时和珅正是适应其需要应运而生的。

和珅生性贪婪,擅于敛财。为了扩大财源,他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地进行盘剥与搜刮。他除了经营好皇室正常的收入项目(如,皇庄、内务府所开当铺和发放的高利贷等),对内务府的一些成规旧例,进行变革,减少开支,扩大内帑生息银两的数额外,就是想方设法增加皇室的额外收

入。首先他把眼睛盯在了各级官吏和富商的腰包,让他们多为皇帝作些贡献。例如,(1)鼓励、奖掖百官、臣民多多“进贡”、“报效”,特别是每年皇太后、皇上和皇后过生日的时候,借着为其作寿的机会,和珅便乘机或明说,或暗示让各级官吏、富商大贾们多作“贡献”,以博得皇上欢心;(2)借着“惩贪”的名义(所谓“宰肥鸭”),扩大抄家面,尤其是对那些经管钱物的大户(如,盐政、盐商、皇商、“织造”和海关监督,以及地方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等),动不动就找茬进行“抄家”,轻而易举地把这些贪官污吏和奸商们多年搜刮的民脂民膏没收、“充公”;(3)实行“议罪银”(亦称“罚项”、“自行议罪银”和“认罪银”等)制度。这是一种非公开秘密进行的罚银制度,是皇上让臣子自行认罪,自动拿出银子,“破财免灾”的措施。在这期间,当然和珅在极力聚财、敛财的过程中,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从中捞到好处,于是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户部银库和内务府广储司,同时也有一部分装进了和珅的私囊。

当时,上至清政府中央各部、各衙门的官员,下至地方的封疆大吏(总督、巡抚)、知府、知县和盐政,以至皇商、盐商、行商和票号商们,每年都纷纷把他们搜刮来的大量钱财与稀世珍宝自觉或不自觉地拿出来一些献给乾隆皇帝,以讨其欢心和青睐。于是和珅在不动用国库库存的情况下,满足了乾隆帝奢华享乐的需要,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使其十分自得、高兴。并且不



和珅宅第(后为恭王府)大门(今北京西城前海西街)

出几年的工夫,和珅就扭转了内务府的亏空,而且还有多余的银两补充户部银库。因此乾隆帝越发觉得和珅聪颖、能干,是他得力的助手,更是值得他信赖的人。因为乾隆帝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只会吹拍,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而是要那种“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的干练之才。总之,乾隆帝把和珅看成是招财进宝的财神爷,缺钱用钱就向他要;和珅则打着乾隆帝的旗号,发号施令,改革成法,尽量捞钱取物,不但满足了皇上的欲望,也肥了自家。

和珅不但善于为乾隆皇帝广为招财进宝,而且同时他也是一个善于理家、善于经营、发财致富的能手。他敛财的方法和途径主要有三种:(1)窃取。和珅不但是一个“贪官”,而且还是个“盗官”。他利用主管政府和皇家财政、物资的大权;利用乾隆帝的信任和重用,大肆向各级官吏、富商要钱、要物,确实增加了皇帝的个人收入,而且也更方便了他从中渔利和窃取。例如,每年全国有大量“贡品”进入宫禁,可是皇帝只收取其中一部分,其余部分或退回,或由和珅处理。于是他便上下动其手脚,从中渔利,进行窃取。只要他看上眼的、喜欢的物件,哪怕是已进入了皇宫,他也能千方百计把它弄出来,盗为己有。因此,在查抄和珅家的物品中,有许多东西(如,宝珠、念珠和珍稀器物)甚至比皇宫中的还要好。(2)纳贿。和珅经常利用职权任用私人,把一些有实权、好捞钱的差事分配给他的党羽和亲信,然后再让他们以各种名义,采用不同形式向自己报效,有时一次就纳贿几万两、十几万两,甚至几十万两白银。(3)营私。和珅在给乾隆帝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对自己个人的财富积累更加用心,千方百计到处捞钱。平日他十分注意“开源节流”,即广开财源,减少开支。除了他的妻妾儿女直系亲属等少数人,过着锦衣玉食,豪华奢侈的生活外,他对家中的佣人、使女和奴仆却十分苛刻,平日全无赏给,且经常是以稀饭充饥,还不容吃饱。他家进出的银两,除了委派亲信管家经管外,有时他还要“持筹握算”,亲自称量、过目。他家的账本由四个不识字的使女保管,而现金另设专人保存,钱账分开,不时核对。他家的许多开支花费,也“皆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次,他家兴建土木以及许多劳务工作,也尽量找不用花钱的人来承担。例如,他家修新宅第时,仅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就有一千多人在他家无偿服役。和珅敛财的方法很多,路子更广。他不但大量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而且还在京城内外广置房产(特别是铺面房),用于出租收取房租;此外,他还利用发放高利

贷,进行盘剥,收取高额利息。同时他还深知要想发大财、快发财,“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道理,从事工商业活动。他家经营的商铺、厂矿范围颇广,只要能赚钱几乎什么都干。一般是或以他本人,或利用管家、仆人的名义开当铺、钱铺(银号)、印局、煤窑、药铺、古玩字画铺、瓷器铺、弓箭铺、柜箱铺、鞍马铺、粮店、酒店、客棧、杠房、灰瓦店,并在京西一带开办煤窑、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栓养着80馀大马车,常年从事运输业。

四 扶植亲信,排斥异己

和珅一人当道,全家沾光,亲朋好友乃至个别家人、奴仆也都鸡犬升天。其子丰绅殷德与乾隆帝爱女和孝十公主结为连理,此外,他家还有多人与皇室联姻;其弟和琳曾为驻藏大臣、四川总督,晋封公爵;他家的亲属,有的做了总督,有的当了巡抚,甚至连他的管家们也成了拥有10万、20万两银子的富户。与此同时,和珅深知要想地位巩固、长久,必须具有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要得到当朝有势力集团的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拉帮结伙,网罗死党;因此,他一朝权在手,便把帮来拉。他四处拉拢亲信,组织私人班底,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在这个关系网中,他培植了一批亲信,其主要骨干人物有以下几人:(1)和琳,字致斋,也是官学生出身。他最初以满洲文生员补为吏部笔帖式,后又升迁为郎中、巡漕御史、杭州织造、湖广道御史、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镶白旗汉军都统、工部尚书、驻藏大臣、光禄大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察史、四川总督等,并赏用黄带、紫缰和三眼花翎,封一等宣勇公,授予云骑尉世职。嘉庆元年(1796)八月,在镇压湘黔苗民起义过程中死于湖南平陇。死后乾隆帝亲自到其家灵堂吊唁,并赐白银5000两和陀罗经被祭葬,命配飨太庙,祀昭忠祠与贤良祠,并特准其家建专祠祭奠。和琳是和珅最亲信的人之一,他是和珅一手培植和提拔起来的。兄弟配合,沆瀣一气,特别是在清军中掌握一定权力。(2)福长安,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帝孝贤皇后的亲侄儿,大学士、军机大臣傅恒的第四子。乾隆帝对他比较喜欢,曾任正红旗副都统、武备院卿、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被封为侯爵。在与和珅共事中,福长安深受其扶植和关照,彼此结为知己。福长安甘愿做和珅的附庸和走狗,亦步亦趋的跟随和珅。他们二人在朝中拉拢帮派,结成死党,排斥、打击以阿桂为首的朝臣。(3)伊江阿,拜都氏,满洲正白

旗人。大学士永贵之子，曾在军机处行走，是和珅的亲信之一。他平时与和珅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彼此经常以诗唱和，沟通情感。伊江阿巴结和珅，和珅也极力培植伊江阿，推举他做了山东巡抚。(4)苏凌阿，他塔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举人出身，曾任户部尚书、两江总督、刑部尚书和东阁大学士等职。因为他与和珅是儿女亲家，又巴结、顺从和珅，故受到和珅特别关照。他虽然年迈体弱，两耳重听，且昏庸无能，只知爱财，营私舞弊、贪污受贿、诬良为盗，无所不为，声名狼藉（他曾大言不惭地说：“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但和珅还是千方百计推举他，使其官位步步高升。(5)景安，钮祜禄氏，官学生出身，曾任内阁中书、户部郎中、山西河东道台、甘肃按察使、河南按察使和山西、甘肃布政使、河南巡抚等职。他一向依附和珅，办事无能，只知欺压百姓，贪污中饱。(6)明保，和珅的舅父。由于和珅的保荐，曾任湖北汉阳知府。此人一生庸庸碌碌，花天酒地，依附和珅作威作福。他的儿女亲家倭什布同在湖北作官，与和珅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在和珅的庇护下，胡作非为，鱼肉百姓。(7)吴省兰、吴省钦，两人为同胞兄弟，吴省钦为兄，吴省兰为弟，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兄弟皆进士出身，他们曾在翰林院任职，是和珅的老师；又“系和珅私人”，彼此之间关系密切，他们情愿作和珅的党羽，为其奔走效劳，通风报信。因此，由于和珅的推荐、保举官位步步上升，曾多次任乡试主考官。嘉庆初年，吴省兰还被和珅安排在嘉庆帝身边，名为帮助皇上整理诗文，实则监视皇上的一举一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文武大员投靠和珅，向其献媚取宠，卑躬屈膝，送钱送物；有的人还恬不知耻地称和珅为“老师”。例如，征瑞、孙士毅、秦承恩、孙绶、湛露、李潢、李光云、胡长龄和蒋赐棨等，其中不乏总督、巡抚、盐政和知府等高官。

和珅满以为有这么多人向其靠拢，他的关系网从中央到地方，遍布全国各地，构成了“和家铺子”的班底，一旦有风吹草动，总可抵挡一阵子。可是他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其实这些人聚集在他周围，并不都出于真心，而他们与和珅是彼此相互利用的关系。因为当时和珅身处高位，不少人为了向上爬，屈服于和珅的淫威，心甘情愿者寥寥无几。一旦和珅垮台，这些人便树倒猢猻散了。

与此同时，凡是不依附和珅，不愿意做他的党羽，进而反对他的人，他便想尽办法进行排斥、打击、陷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现举几例：(1)阿桂，章佳氏，字广

庭，原为满洲正蓝旗人，后抬旗为满洲正白旗。其父阿克敦曾为大学士。阿桂于乾隆三年（1738）考中举人，并以“父荫”授大理寺丞，官至内阁大臣、工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军机大臣、伊犁将军、四川总督、太子太保、翰林院掌院学士，封一等诚谋英勇公，并授予骑都尉世职。阿桂以“首辅”身份，多年来其官位都排在和珅前面，虽然实际上构不成对和珅的威胁，但和珅心里委实不舒服，可又无可奈何。因为阿桂出身显贵，办事认真，政绩、战绩都很卓著，颇得人心，可以说“德高望重”，连乾隆帝也不得不尊重他。于是多派阿桂出差在外，让其出征、治河、办案……，而把和珅留在自己身边。和珅与阿桂之间矛盾重重，阿桂瞧不起和珅，对和珅贪婪和骄横非常痛恨、鄙视，故不屑与其为伍；他们俩人虽同为军机大臣，却很少在一处办公，就是每次上朝，阿桂也要离和珅数步之远，平时很少理他。和珅时时不忘排斥、打击阿桂，一找到机会就要搞小动作。阿桂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于是在嘉庆元年（1796），以养病为由，请求“致仕”，后在家休养，第二年去逝，享年81岁，谥文成，祀贤良祠。(2)福康安，字瑶林，号敬斋，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福康安的姑母是乾隆帝的孝贤皇后。曾任云贵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成都将军、御前大臣、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和协办大学士等，并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嘉勇忠锐公和郡王贝子。嘉庆元年（1796）夏，在镇压湖南、贵州苗民起义中，身染瘴疾而亡，死后谥文襄。福康安虽然一生高傲跋扈，生活奢靡，但颇擅长领兵作战。因此乾隆帝对他的“军功”是十分欣赏的，对他非常钟爱（传闻福康安是乾隆帝的私生子，从小养育宫中）。可是他与和珅长期不和，矛盾重重，史载两人“宠权相埒，势不两立”。乾隆帝只好也采取对付阿桂的办法，于是经常派福康安出差在外，或领兵征战，或处理其他事务；把和珅留在自己身边。(3)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历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东阁大学士等官，并加封为太子太保。王杰在军机处前后十几年，此时正是和珅把持军机处，声势显赫之时，每当他看到和珅办事擅自独断，飞扬跋扈之时，除了忍让之外，有时也与和珅争一争；或者向乾隆帝“委屈陈奏”。因此和珅非常讨厌他，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茬把他从军机处排挤出去，造谣诽谤无所不用其极；无奈乾隆帝喜欢王杰学识渊博，长相俊秀，为人正派，始终不肯让王杰离开军机处。嘉

庆元年(1796),王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以足疾为借口,自己请求退出军机处,并辞去了上书房和礼部的事务。直到嘉庆四年(1799),和珅事败,他才重新出山,担任首辅。(4)董诰,字蔗林,浙江富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著名书画家。历任庶吉士、内阁学士,以及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四库全书》副总裁、上书房总师傅,并加封太子太保和太子太师。他在军机处先后四十余年,办事勤勉、认真,熟于朝章故事,深得乾隆帝赏识。他同情王杰在军机处的处境,与和珅之间也不时发生矛盾。和珅为此非常嫉恨他,曾多次找机会陷害他。

除以上数人外,受和珅排挤、打击和陷害的朝臣还有许多,如大学士、嘉庆帝的老师朱珪和协办大学士元瑞等人。

五 多行不义,必有反者

和珅当权之际,气焰熏灼,甚至连嘉庆帝也要让他三分,一般官员就更不敢多说什么了。可是就在此时也居然有一部分人不买他的账,非要捅一捅他的老虎屁股。他们明里暗里跟他作对,不敢公开干,就旁敲侧击,

冷嘲热讽,进而则弹劾他的党羽、爪牙。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1)曹锡宝,字鸿书,一字剑亭,南汇(今属上海市)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军机处章京、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和监察御史等职。他生性刚直不阿,办事认真,尽职尽责。当他看到和珅招权纳贿,结党营私,中饱私囊,贪污腐败时,十分气愤,总想找机会弹劾和珅。但他深知和珅树大根深,身后又有乾隆皇帝这个大保护伞,因此一时还不敢轻易触动他;于是便想拿和珅的忠实奴仆、大管家刘全开刀,拉开“倒和”的序幕。乾隆五十一年(1786)六月初,曹锡宝以监察御史的身分,上奏弹劾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请求严惩刘全。刘全是和家的世仆,从小就在和家赶车、跑腿,跟着和珅受了不少苦,从而也得到了和的信任。和珅得势后,他便成了和家的大管家,主管和家的外间事务,如代理和珅掌管崇文门税关的税收,以及和家所经

营的店铺等,故人称“外刘”。平日他以和珅代理人的身份出现,结交官府、士绅、商贾,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侵冒公款,无所不为。刘全也颇善于敛财,广置房地产,经营当铺和其他各种店铺、作坊,一生积攒了二十多万两白银的家产,比一般京官富裕得多。他曾在和珅宅第附近的兴化街修建了一座豪宅,其建筑规模大大超过了一个管家的规制,还有他家使用的车马、衣物也全都逾制。曹锡宝就以这些为突破点,写了一道奏折,准备参奏刘全。奏折写好后,他首先拿给同乡好友吴省钦阅看,想让他帮助提点意见。不料,吴省钦为了讨好主子,竟不惜出卖朋友,偷偷地捅给和珅了。和珅与刘全密谋后,刘全迅速拆除了逾制的房屋,毁掉了不应该配置的车马;隐藏、转移了不应穿戴的衣物。然后和珅给乾隆帝也上了一道奏折,述说自己平时管教下人很严,不许他们在外惹是生非,且刘全是个“安分朴实”的人,不会“招摇是非”。并假惺惺地请皇上派人严查,出面干预此事,以使刘全解脱困境,并进一步使曹锡宝处于被动境地。果然乾隆帝出面为和珅、刘全解脱,并怀疑曹锡宝弹劾刘全的动机不纯,是其“假公济私”,进行报复;而更大的目的,是受人指使攻击和珅;因此指令曹锡宝必须“逐条指实”。



天香庭院,锡晋斋仿故宫乐寿堂建筑(今在北京恭王府内)

结果如所预料,查不到什么真凭实据。曹锡宝只好承认自己无中生有,认错请罪。最后落了个“革职留任”的处罚。此后他一直闷闷不乐,心情忧郁,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含冤死去。(2)钱沅,字东注,又字约甫,号南园,乳名正贵,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1740)进士,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副使、户部主事和湖广道监察御史等职。他一生以诗文、书法、绘画闻名于世,特别是他所画的马尤具特色,故有“瘦马御史”之称。他性格刚直,不畏权贵,为官清正廉洁,不贪名利,安于清贫,并惠泽桑梓,为民造福,是封建时代为数不多刚正不阿的“清官”。在政治上,他敢于向贪官污吏等恶势力斗争,特别是他以惊人的勇气和聪明的才智与和珅、勒尔谨、王亶望、毕沅、国泰、于易简等人展开了坚决斗争。和珅对于钱沅公正刚直,不屈从自己,十分嫉恨,总想找机会陷害、打击他一下;于是他唆使党羽湖南巡抚浦霖以“钱沅对生员匿丧冒考,置若罔闻”之罪,上奏弹劾,结果钱沅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但钱沅并没有因此停止对和珅的斗争,当他看到由于和珅专横跋扈,军机处分成阿桂与和珅为首的两派,以至不能同在一起办公,便向乾隆帝上奏疏,提出建议,请其恢复旧制让所有军机大臣,均应回到军机处办公地点共同办公。而更深一层的意思是钱沅就和珅对军机处以及其他一些朝政所作的一系列“变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涉及到了其核心的问题。但因事关重大,还不敢明言和珅犯罪的种种内幕,只是以此作为试探而已。此外,钱沅还另外草拟了一篇长达数千字的奏折,上列和珅二十大罪状,准备上奏皇上。仅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等的勇气向和珅开战的。在当时此举绝无二人,非常难能可贵。为此和珅更加忌恨于他,极尽打击报复、穿小鞋之能事,凡遇苦差事、难办的事全派他去作。结果他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乾隆六十年(1795)与世长辞,终年55岁。关于钱沅之死,另有一种说法,即有人怀疑和珅得知钱沅要上奏折专门弹劾自己,遂派亲信将其毒死。(3)尹壮图,字楚珍,云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历任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学士、太仆寺少卿、礼部侍郎等职。他为人正直,风骨凛然,不畏权势,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例如,他大胆地对和珅炮制的“议罪银制度”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制度是促使、怂恿地方官贪污中饱的下策;如果继续实行下去,必将会造成地方吏治废弛,银库亏空;这只会使社会经济恶性循环,从而加重人民的负担,破坏社会安定。其实这也是尹壮图对和珅损下

肥上,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种种劣迹揭示的一个尝试。乾隆帝在和珅的建议下,委派户部侍郎庆成和尹壮图一起先后到山西、直隶(今河北)、山东以及江南各省查核各处仓库。其实庆成是和珅的私党,他在查核过程中处处钳制尹壮图,每到一地都要“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在这期间地方官们早已准备妥当,往往借商家银两充实库存,待核查大员到来,已经不露任何马脚,结果一点亏空也没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尹壮图非常尴尬,只好“自承虚讹,奏请治罪”。乾隆帝认为尹壮图的奏折实乃“希荣卑鄙,饰词谎奏”。结果尹壮图被下刑部大狱,判为“比挟诈欺公安生异议律,坐斩决”。后来乾隆帝又觉得这样判罪未免太重,遂改为将其降职,改授“内阁侍郎”。尹壮图心里郁闷,最后以回乡奉养老母为名,回到云南。直到嘉庆四年(1799)初,嘉庆帝亲政,冤案才得以平反。(4)谢振定,字一斋,又字芑泉,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历任散馆编修、监察御史、给事中等;此人为官刚正不阿,平日很不满和珅的所作所为,更对和珅的眷属、爪牙借其势力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深恶痛绝。据说他在任京师巡查东城御史时,在灯市口附近痛打了和珅的小舅子,并火烧了他坐的逾制马车。和珅得知后十分恼火,但又没理由发作,只好暗气暗憋;最后“假他事,劾振定”,将其夺职。

至于“野史”、“笔记”和影视剧中刘墉(“刘罗锅”)、纪昀(纪晓岚)与和珅“斗争、抗衡”的故事与传说,多与史无征,并不可信。

历史上的刘墉(1720—1804),一生政绩平平,只是谨慎谦和,办事勤勉认真,洁身自好,注意吏治,关心民瘼,不尽趋炎附势而已。刘墉在任左都御史任内,并没有对和珅及其党羽进行过有效的监督与弹劾;而是奉行了“明哲保身”和“井水不犯河水”的政策。但是这也不能证明刘墉阿附和珅,嘉庆四年(1799)初,和珅受审前,刘墉是首先起来参劾和珅者之一,同时他后来也参加了对和珅等人的会审、抄家。

历史上的纪昀(1724—1805)字晓岚,素有“通儒”之名。他是个“风流才子”,言语诙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和珅与纪昀虽然同在乾隆朝为官,但地位不同。和珅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俗称“真宰相”,而纪昀最高只作到“协办大学士”,从未作过军机大臣,因此二人地位相差较大。在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和珅是该书的正总裁,纪昀是总纂官,两者是上下级的关系,彼此虽有过矛盾,但并未见两人有什么激烈斗争。

六 乾隆驾崩,和珅赐死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已经85岁的老皇帝弘历,宣布立皇十五子永琰(即位后改永琰为“颙琰”)为皇太子;并决定当年冬至进行禅位大典。翌年(1796)元旦,嗣皇帝正式登基,改元“嘉庆”。可是有一点乾隆帝很明确,这就是“退位不让权”。他规定自己虽被尊称为“太上皇帝”,但仍然称“朕”;谕旨称为“勅旨”;在宫中仍用“乾隆”年号;《乾隆起居注》照常续编;嗣皇帝的许多诏书,也要加盖“太上皇帝之宝”玉玺;臣下的“请安折”要一式两份,其他奏章也要由嗣皇帝转呈太上皇帝,由太上皇帝定夺……一句话:一切还是由乾隆帝说了算。和珅此时以出纳太上皇帝的命令者自居,常常以太上皇帝之名,贩卖自己的私货,依旧耀武扬威,有些事情就连嘉庆皇帝也要让他三分。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乾隆帝去世,享年89岁。嘉庆帝亲政,便立即将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整肃朝政的计划开始实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也为了尽快平定闹腾多年的白莲教起义,筹集大量军费,弥补国库空虚,决定首先扳倒和珅。于是他暗示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顺和大学士刘墉,于正月初五日,上奏弹劾和珅“贪鄙成性,怙势营私,僭妄专擅”等种种不法罪行;正月初八日,和珅被逮捕下刑部大狱,接着抄家籍产。正月十一日,嘉庆帝亲下谕旨,宣布其20大罪状,决定将其“凌迟处死”。可嘉庆帝考虑到皇妹和孝公主多次请求:乞望保和珅全尸,遂决定赐其自尽。正月十八日,和珅用御赐的白练自裁身亡,终年50岁。

关于和珅家产到底有多少?在他当政的二十多年中总计贪污了多少钱财?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人搞清楚,一直说法不一,仍然还是个“谜”。有的说是“八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十多年的国库收入;有的说是“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三年的国库收入;有的说是几千万两白银……在档案与正史中记载,除珍宝、珠玉和各种器物难于估价者外,在京财产尚有:金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银三百一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自开当铺十二座,家人刘全等开当铺八座,取租房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一千二百六十六顷,合计银价二十万三千三百两,追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八十辆大车折合银九千六百两。此外,和珅在京的住宅、花园、别墅多处,仅德胜门内什刹河畔的宅第(今前海西街恭王府),就可与王府媲美,其中厅房二百五

十余座,楼台亭阁二百余处;海淀别墅(今北京大学未名湖周围)房屋一千零三间,游廊楼台共计三百五十七间;善缘庵寓所房屋八十六间,游廊楼台四十四间。其他还有和家所经营的粮店、药店、古玩店、煤窑……多处。总之和珅二十余年,聚敛钱财数额巨大(笔者估计除他所收藏的大量珠宝玉器、金银器皿和古玩书画等难于估价的宝物外,他家的财产当在二三十万两白银左右),故他被诛后,民间就流传着一句谚语:“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余 论

和珅为官首先抓权,同时最主要的还是抓钱;正因为“权”与“钱”抓的太快、太大、太多,甚至超越了嗣皇帝——颙琰,理所当然为嘉庆帝所不容,因此他刚一亲政就要收回其“权”和“钱”,以解燃眉之急,故将和珅立即诛杀。这正如嘉庆帝自己所言:“和珅罪之大者,盖由其事权过重”。同时他也是为了给其父乾隆帝为政的各种失误开脱责任,缓解社会矛盾,拿和珅作替罪羊罢了。平心而论,和珅除了贪、横、骄、奢、狠一面外,确实也为大清朝、为乾隆帝做了些实实在在的事;因此乾隆帝才会如此倚重他,成为其左膀右臂;因为乾隆帝也是一位有才干、有作为的君主。这一点就连嘉庆帝也不得不承认:和珅“精明敏捷,原有微劳足录,是以皇考高宗纯皇帝加以厚恩”。

和珅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主张要对清初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进行改革;在其掌政期间,他鼓动乾隆帝对清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系列所谓“祖宗成例”进行了某些“变革”。如,臣工的奏折,必须一式两份,一份正本呈皇上,一份副本交军机处;再有,必须在六十五岁老臣中选御史,以及制定议罪银制度等等。

他长期担任理藩院尚书,负责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特别是他多次帮助乾隆帝在处理对蒙古、西藏、新疆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从而巩固了祖国统一与边疆的巩固。尤其是每年在热河避暑山庄,乾隆帝在接见各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王公贵族和宗教领袖时,不论大事小事和珅都安排的妥妥当当,使各方面均很满意,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向心力。此外,在处理周边各进贡国家的关系上,和珅也忠实地贯彻乾隆帝的旨意。特别是在前文提及的处理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一行访华问题上,更是不卑不亢,坚持了原则,已如前述,此不赘言。

(责任编辑 致 中)

什么都要

——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九

●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孟夫子教人选择 鱼 我所欲也 熊掌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怎么办？孟夫子的办法是选一样。大概熊掌难得 所以他没有选鱼。但是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有势力的人或正期望成为有势力的人）的秉性不爱选择 而求兼得。福要五福 功要十全 不肯有一丝欠缺。就是讨老婆 看看中国的说部 也都是五美图、九美图、十美图 恨不得天下美女都入吾囊中。

这毛病，虽说过了两千多年，却丝毫不曾变得。

就说官员吧，当了官，执掌了权力，按说就应该临渊履冰，好好治国，替百姓多办些正事。但不，纱帽若是熊掌，一旦到手，眼里就盯着了鱼——当个学者好不神气。于是千方百计要弄个博士头衔。认真读点书，弄顶方帽子戴戴，过把瘾，本也无妨，但他并不读书，只是要那头衔。待到弄到，可以收手了吧？又不，他就一本正经当起了“专家”，放着政事不理，走穴讲课，独揽课题，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接受各界咨询，比教授还要教授。如果官再大一些，说不定又觊觎两院院士呢。官员乌纱博士衔，该称心了吧？不，毕竟经商来钱更快。于是，他还想当老板。好在企业巴不得与权力挂钩，于是，明的、暗的，一个个又兼起了董事长、总经理，次一等也要参股分红。中国某些行政效率不高，同一些官员贪多务得，不务正业，大有干系。

学者如何？心态一样。当了学者、教授，精力却不在治学、授课，又想往官堆里扎，又要往商海里挤，教学质量下降，学术水准滑坡，同亦官亦商的学界现状难脱关系。教授从政或从商，天下多有，并不稀奇。但既然选择了从政生涯，就应该一心一意去从政。如果以官位来提高学术地位，靠权



力来博取学术权威，学术腐败难于避免。有人写文章说，北京大学当初有规定，政府官员若在学校兼课，教职不能为教授，所以鲁迅只是讲师，因为他是教育部佥事。此事若确，倒是一个不坏的制度。同样，一面以专家身份参加评审、评标，一面自己明里暗里开着相关的公司或事务所，他的学术公正性就不能不受质疑。

七十多年前，鲁迅写过一篇《小杂感》，其中一则道：“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这话我一直未曾读懂。近年来憬然有悟。盖和尚、尼姑、回教徒、耶教徒，都有信仰、有戒律，因而必有所为，有所不为。唯道士，不记得有什么戒律。荤是不必戒的，酒是可以喝的，女人是可以睡的，而且醉酒可以度人，纵欲可以成仙。要钱，有点金术，要寿有长生术，不但享尽人间诸福，而且得道之后，羽化登仙，继续享福，永无尽期。这固然都是痴想，但也确是有势力的中国人的梦想：什么都要，什么都不拉下，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要约束限制，也只是对人而不对己。人之所以不憎道士，莫非就是这个缘由？”懂得中国大半”，莫非也是指此？质诸高明，不知以为然否。诗曰：

求罢官衔弄学衔，乌纱方帽两相掺。
人间好景方收尽，忽见仙山眼又馋。

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 书画展在京举行

为纪念世纪伟人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河南、天津、广东、上海、江苏、陕西、湖北、安徽、珠海等省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和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合办，青岛鑫基房地产(集团)公司、珠海市民基发展有限公司协办，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办公室承办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书画展》于2004年8月16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隆重开幕。出席开幕式的嘉宾有文化部原部长刘忠德，老将军胥光义、王定烈及我会顾问贾若瑜，常务顾问冯征、吴塘，常务副会长张文彬等，还有湖北、江苏、安徽、四川、河南、陕西、珠海市等兄弟单位的领导和代表：王峻峰、陈根兴、徐则浩、陈军民、曹土生、麦华、吕致远、潘进武、徐亚鸽，知名书画家黄正襄、王庆云、徐湛等。开幕式由我会常务副会长鲁淳主持，常务副会长曲润海致辞。最后由刘忠德、王定烈、贾若瑜、冯征、张文彬、王峻峰、黄正襄等为开幕剪彩。

书画展共展出书画作品二百二十余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每一位作者都是以自己的真挚感情和不同方式表达对伟人邓小平的崇敬和缅怀。



前排左起：曹土生、吕志远、王峻峰、王定烈、贾若瑜、刘忠德、冯征、张文彬。后排左起：徐则浩、陈军民、鲁淳、陈根兴、曲润海、常文光。



左起：鲁淳、曲润海、刘忠德、贾若瑜、常文光



常务副会长鲁淳主持开幕式



左起(剪彩者)：王峻峰、黄正襄、刘忠德、贾若瑜、王定烈、冯征、张文彬。



工作人员介绍书画展品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4年第**10**期

陈云主持的两次调查会

中西历史比较再谈“秦家店”

抗战前期的外交战场

蒋介石对军事失败的检讨

张澜：追求民主的“川北圣人”

文革中的《伯达文选》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

炎黄春秋

2004/10(总第151期)

社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徐孔(常务)

执行主编 李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渊

秘书长 徐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长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271606)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电话 (010)68522852(办公室) (010)68534879(编辑室) (010)68532048(发行部)

传真 (010)68532569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J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eq@sina.com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 4.80元